**首届“童画廉心”青少年廉洁画**

**征集活动信息登记表**

|  |  |
| --- | --- |
| 作品题目 |  |
| 作者姓名 |  | 联系手机 |  |
| 作者学校、班级 | （学校名称务必填写全称） |
| 所在地市 |  |
| 辅导教师姓名 |  | 联系手机 |  |
| 辅导教师单位名称 |  |
| 作品创意说明（500字左右） |  |

注意事项

1.参与人员应自觉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公序良俗，与此相违背者，主办方有权取消相关作品评奖资格。因参与人员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政策而造成的后果由其本人负责，主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作品需为参与人员本人或本单位原创，参与人员应确认拥有作品的著作权。如出现纠纷，主办方保留取消参与人员或单位获奖资格及追回所获奖项的权利。

3.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凡投稿作品无论采用与否，概不退还，请自留备份。

4.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参考主题：**

一、革命领袖留在浙江的清廉故事

1、毛泽东的清廉故事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毛泽东生前非常喜爱浙江。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曾 50 多次亲临浙江，在西子湖畔工作、生活了近 800 个日日夜夜。他曾动情地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

“不接不送，不叫不到”

1958年，毛泽东来到杭州。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偕同省委领导霍土廉、吴宪等已在站台等候他。见到省委领导迎候，毛泽东风趣地说：“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到杭州就像到了家，以后就不要再搞接送了，好不好?”

“主席到杭州来，哪有不接的道理。”一位省委领导说。

毛泽东微笑着说：“延安时，有一次我到马列学院作报告，张启龙、范文澜派邓力群、安平生、马洪、韩世福到杨家岭来接我。路上碰到了，我说，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我对他们说，那是官僚的作风，我们共产党人不信也不搞那一套。”

省委领导听着，都默默不语。“过去帝王出朝，乘龙车凤辇，前簇后拥，浩浩荡荡，威风凛凛。我们共产党人可不能沾染官僚习气。”毛泽东继续说，“以后，来不迎，走不送，大家自由，好吗? ”

从此，“不接不送，不叫不到”便成了浙江省委不成文的规定。在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又数十次到杭州，省委领导再没有出来迎送。每次，毛泽东一到杭州，警卫就给省委挂个电话报个到，走时给省委打声招呼，收拾行装就走了。

毛泽东早期到杭州，一般都居住在刘庄。1959年秋天，因刘庄改建，毛泽东住进了汪庄（浙江西子宾馆，当时也称“二所”，刘庄是“一所”）。因汪庄招待所是1958年扩建的新房子。毛泽东不愿住新房子，就问省公安厅厅长王芳：“为什么不住刘庄?”王芳解释：“刘庄年久失修，白蚁蛀损严重，而且西湖挖深又使地基下沉，房漏墙裂，只好于今年年初进行改建。现在改建的房子已基本完工，但油漆气味较重，暂时还不能住。过几天我陪您去转转。”

过了一天，毛泽东到刘庄散步，顺便看看改建后的新房子。他在室内走了一圈，发现古色古香的老刘庄已变成了豪华的高级别墅。特别是用铝合金窗条与金丝绒装饰起整个墙面的多功能厅，更是气派不凡。毛泽东停住脚步环顾四周，说了4个字：“富丽堂皇”。对改建后的刘庄表示不满。

第二年，毛泽东来杭之前，刘庄和汪庄同时都做好了接待准备工作，大家倾向于让毛泽东住刘庄，因为刘庄已安排不做其他接待。在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时，毛泽东表示不愿住刘庄：“招待所嘛，谁都可以住，为什么让我一个人住呢?”因此，以后毛泽东来杭州的住处，也会接待其他客人住宿。

以前毛泽东每次来杭时，接待人员都在他住所的通道两旁摆放鲜花，室内陈设名贵盆景。开始几次，毛泽东尊重地方的安排，也没说什么。但时间长了，次次如此，他就不乐意了，便提出“不要到处放那么多花”。工作人员没有领会他话的意思，只是减少了一点，沿途通道两旁不放，但水竹居、大门两旁还是照放。

一次，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我住这里时，室内外都不要放花。花要人来养护，你们每天端进端出，要浪费多少劳力?当然，事情也要区别对待，接待外宾摆些花是必要的。因为外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我们不一样，你每天送他一束鲜花他就很高兴。接待国内客人，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在延安那么多年，没有放过一盆鲜花，还不照样过来了嘛!我在北京，室内外就不让放花。”这下，工作人员终于明白了主席的意思。此后，就再也不为毛泽东来杭而特意摆设花木盆景了。

2、周恩来的清廉故事

周恩来（1898-1976），祖籍浙江绍兴。1921年加入旅欧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浙江人民的衷心爱戴。

周恩来生前曾30多次回到浙江，在浙江度过了140余天。他严于律己，两袖清气，从不让乡亲们为他搞丝毫的特殊，坚持为国家用好每一分钱；他一身正气，严以律己，是克己奉公的典范。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

**“**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到杭州后基本上都住在杭州饭店，而且坚持同随行工作人员一起住普通的内宾客房，与接待外宾的贵宾楼分开。他每次到杭州来，总是自带铺盖和洗漱用品。虽然他住的饭店都配备了这些东西，但他从来不用。他对杭州饭店的领导说：我们要为国家用好每一分钱。周恩来在杭州时，一般都不单独用膳，总是坚持与随行人员一起吃。会议期间，坚持与会议人员同吃同住。除了宴请外宾外，他从不吃盛筵美酒，从不对下榻的饭店提任何要求，而且还再三嘱咐他们菜要搞得少一点，“不要超支，多了浪费。”他自己点菜，只要霉干菜蒸肉、芋艿、臭豆腐等就行了。

周恩来公私分明，严以律己，在浙江留下许多美谈。周恩来是有名的大胡子，每天早上都要刮胡子。杭州饭店内设有理发室，周恩来刮胡子，每次都自己付费。理发师傅告诉他：经理吩咐了不收费。他不同意。经理又对他说：这是两位省委书记说的不要收费。他还是不同意，说：“就是省委定的，我也要付钱。”他认为在公私关系上，不能“不拘小节”。他每次离开饭店前，总是再三嘱咐卫士长把这里住的、吃的、洗衣、理发等一切费用按规定结算清楚，不能少算了。1957年，周恩来陪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到杭州，正值新茶上市，他关照送伏老两斤茶叶，并坚持要自己付钱，说：“以我名义送的茶叶，钱一定要我自己付，不能由公家报销。”周恩来还曾对省委领导说：“以后哪个中央领导同志来也不要送土特产，如本人需要，你们可以代买，钱照付，送礼不是好风气。”

1962年春天，周恩来到杭州开会。当时南方的青菜正上市。返回北京时，杭州交际处的同志把两筐蔬菜送到了飞机上，并再三向周恩来的卫士长解释，这两筐菜不是送给总理的，是带给中央首长吃的，而且也不是白送，发票都已经开好了。卫士长只好付了钱，把菜带回了北京，转给了供应处。供应处给每位领导人家中都分了一份，也是收钱的。卫士长把周恩来的那一份拿了回来。周恩来看到这些蔬菜时，很生气。卫士长向周恩来讲明情况，并告诉他已经付了款。周恩来一听更生气了，说：“付了钱也不行！我问你，北京的老百姓能不能吃到这样的菜？”周恩来十分严肃地教育说：“这样做，会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你们想想，总理和市民都是一样的人，我要不当总理就没有这个优越条件，就享受不到这种特权。”在周恩来的心目中，他和市民应当平等，不可特殊，这是多么高贵的品德！

新中国成立后，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对故乡绍兴一直非常关心，对绍兴乡亲始终念念不忘。1956年，一位周家族叔独自到北京找周恩来。想叫周恩来给他在北京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岗位。周恩来教育他说：“工作要到绍兴自己去找，北京不能安排。共产党干革命，不能搞裙带关系。”之后，周恩来出钱，给他买了回程车票和招待所的几天餐券，要他好好回原地参加劳动。为这件事，周恩来专门写了《告亲戚朋友书》的10条家规。

3、刘少奇的清廉故事

刘少奇（1898－1969），湖南宁乡人。1920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就曾对在浙江开辟抗日根据地作出过多次重要指示。新中国建立后，他又十几次对有关浙江的问题作重要批示和指导；他关心着浙江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群众的生产、生活，至少10次亲临浙江，他结合调研并利用开会、休养的间隙，深入学校、部队、海防前线等基层；他还先后邀请过16个国家的重要外宾到杭州参观访问，充分展示了一代伟人的钱塘情怀。

心系群众 人民利益至上

刘少奇对于人民群众总是满腔热情，首先想到的是人民群众的方便问题，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利益幸福为重。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以来，刘少奇出去视察的次数特别多，差不多一年当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下到基层去考察研究。每次外出，行前他总是找身边工作人员谈一次话，除了告诉他们准备去的地方、去的目的任务和去后要找什么人调查等事情外，就是嘱咐他们到外面不准向人家提要求、接受礼物，还特别强调不要让人家接送。他说：“地方上的同志都很忙，不要让人家到车站接送；在那里的活动，一切都听人家的安排。”

1958年11月，刘少奇到舟山视察，特意到驻螺门的“许昌连”看望官兵。他仔细参观了墙报和黑板上的“战士园地”后，充分肯定了连队浓郁的政治气氛，同时嘱咐驻军领导，既要抓好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也要帮助官兵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让大家吃得好，睡得好，安排好文体活动，把岛上部队的文化生活搞得丰富多彩，使战士的生活不枯燥，确保连队官兵安心长期守岛。在“许昌连”施工现场，刘少奇不顾劝阻，戴上安全帽，走进了正在施工的坑道。他一边观看战士们的“手拉滑锤”作业操作，一边说：“部队要守卫海岛、以岛为家，就必须紧紧依靠群众。部队不但要把自己的工事修好，而且也要把人民群众战时需要的工事修好。”

离开部队施工工地，车队途经“沈蝉”公路时，要开过一座年久失修且已不牢固木桥“茅洋桥”，警卫人员为安全起见要求首长下车徒步过桥。刘少奇走到桥边，仔细察看后对时任舟山地委代书记王裕民说：“这一带是舟山军事布防的重要区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有战事，调兵遣将都需经过此桥，应把木桥改掉，修筑一座牢固的钢筋水泥战备桥。”1959年上半年，一座新的花岗岩基石、钢筋水泥路面的新型拱型“战备桥”——茅洋桥建成。

在返回宁波驶过蚂蚁岛附近海域时，王裕民等同志站在甲板上向刘少奇介绍了蚂蚁岛乡和蚂蚁岛渔民的近洋张网作业情况。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蚂蚁岛乡，是全国渔业战线的一面红旗。1958年9月，蚂蚁岛建立起全国渔区第一个人民公社——蚂蚁岛人民公社，成为全国渔村艰苦创业的典范，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扬和肯定。

听了王裕民的介绍后，刘少奇来了兴趣，马上在舰艇会客厅内会见了一起上舰的蚂蚁岛人民公社党委书记陈阿毛、社长陆渭川。当听到陈阿毛汇报蚂蚁岛渔民群众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自力更生、互帮互助、艰苦创业，开展生产自救，从渔业生产互助组到渔业生产合作社，人民收入逐步提高时，刘少奇不时地点头赞许，其间还提了几个问题，“你们那里吃水困不困难？有没有水稻田？”陈阿毛回答：“如果只是2个月不下雨吃水问题还不大，若是超过2个月就要到外面去装水了。蚂蚁岛上只有旱地，没有水稻田。”刘少奇听了他们的介绍后，对舟山地委的领导明确提出，要重视水利工作，多修一些水库，解决好全岛百姓的用水问题，并且反复要求舟山军地负责人“要下决心”。

4、朱德的清廉故事

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人。1922年11月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成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崇敬。毛泽东同志称赞朱德同志是“人民的光荣”，周恩来同志称赞朱德同志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朱德生前至少17次到过浙江，指导了浙江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出台，并对浙江的建设发展进行了许多极具针对性的指导，他的真情付出给浙江人民留下许多珍贵而难忘的记忆。

拒兰、赠兰

空谷移根出草莱，寻得幽兰报知己。朱德酷爱兰花，众人皆知，但他采集、繁育兰花，不是孤芳独赏，而是与各地调剂余缺，繁殖推广，供人民群众观赏。朱德把广大人民当作知己，常常趁视察、疗养之机，携带名种兰花，送给各省市的园林部门，供他们繁殖或展览用。

1955年2月，朱德从广东抵达杭州视察。他在省委副书记霍士廉的陪同下，来到孤山脚下的西泠印社。走过台阶，来到一个走廊。这时，朱德看见廊下摆着数盆兰花，便快步走了过去。

朱德走进花盆，凝视片刻，只见那含苞欲放的兰花芯，在晨风中轻轻摇曳，不胜婀娜，朱德脸上浮起了笑容。

霍士廉问道：“听说朱老总精于兰花，故乡四川也产兰花，不知川兰与浙江兰花有何不同？”

朱德笑道：“我喜爱兰花，家中也栽有十几盆，多是川兰。要说川兰与浙江兰花，确有高下之分。四川产剑兰，以素心为优。我家中栽有一盆碧绿素心，一盆隆昌素，也是名品，但与浙江春兰比较，又逊一筹。就兰花香气而论，以春兰最醇，蕙兰、剑兰次之，建兰、琴兰又次之，墨兰香气最差。”

霍士廉听了频频点头，并说道：“既然老总讲到浙江春兰这么好，要不就带几盆回家，可以慢慢欣赏……”

朱德当即摆摆手，严肃地拒绝道：“此事坚决不可”。

朱德接着道：“这几盆春兰，均是名品，为梅瓣、荷瓣、水仙瓣和蝶瓣，四吕之中，尤以梅瓣为贵，名为‘集贺’，与‘宋梅’‘汪字’‘龙字’并列为美兰‘四大天王’”。

在场的人无不为朱德广博的兰花知识所折服。

接着，朱德还兴致勃勃地登临孤山，到广化寺观赏兰花。他一边细细观赏，一边赞不绝品。他对陪同的霍士廉说：“浙江兰花的基地要扩大，千万不要让名贵兰花品种失传。”

1958年4月4日，朱德再次来到花圃兰苑，徜徉期间，看到杭州兰花品种少，就对花圃的工人说“品种太少了，至少要培育一万盆，要多搞一点，好好管理，增加出口，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4月11日，朱德离开杭州回到北京，仍牵挂着杭州兰花。当听到杭州花圃的兰花患病，他十分焦急，几次打电话要求科研部门帮助根治病虫害。直到兰花的病虫害除干净了，他才放心下来。

他还给杭州园林部门写了介绍信，让杭州花圃工人到四川引进兰花新品种。

1960年，朱德又赠送给杭州兰苑十余盆外地兰花品种。他说：“各地的兰花要互相交流，种在一个地方，遇上什么灾害，容易失传。”他还特地将《兰花谱》的中文译本，赠予杭州花圃兰苑的养兰工人。以后，朱德每每到杭州视察和生活，总要带些名贵的兰花赠给杭州的花圃。

据杭州花圃工人说：朱德送给的兰花有广东、四川、江西各地的名兰，如“绿云点珠”“雪兰”“朱砂”和“玉沉大贡”“井冈兰”等。

朱德还与杭州花圃工人褚友仁成为了兰友。俩人经常一起砌磋种兰技术，他对褚友仁说：“杭州解放了，兰花不能像过去那样只供少数人玩赏，要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你有精湛的技术，你的专长一定可以很好地发挥，希望你多培养一些徒弟，总结经验，加以推广，为发展兰花事业多作贡献。”自20世纪50年代初在杭州结识褚友仁后，他每次到杭州，都尽可能抽空去看望这位专家，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观赏他培育的新品种。

在朱德的关心下，浙江兰花工人精心培育了许多名贵的兰花，在国内外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5、邓小平的清廉故事

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邓小平生前非常关心、重视浙江的建设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18次到浙江，足迹遍布之江两岸。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耄耋之年的他5次亲临浙江，对浙江工作的许多重要指示闪耀着理论和智慧的光芒，指引和推动了浙江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快步发展。

“一定要保护好西湖名胜”

1983年的早春时节，邓小平到江、浙、沪视察。2月9日来到杭州。这是邓小平新中国成立后第11次来浙江。当时时值年根岁尾，西子湖畔弥漫着春节的气息，大街小巷不时响起一阵阵爆竹声。

邓小平外出视察参观，和普通游客一样，不清场、不封道、不讲排场。2月11日，小平乘坐面包车，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出现在灵隐寺时，不少游客认出了他，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邓小平向人们挥手致意，并不时握握游客的手。当他看见一位小女孩在大人的怀抱中拍着可爱的小手欢迎他时，就笑着用手摸摸孩子的小脸说：“这娃娃长得好胖啊！叫什么名字”。从南京来杭探亲的孩子父母激动地满脸通红，一个劲地教孩子快叫“邓爷爷好”。两岁的孩子乖巧地叫了声“邓爷爷好！”邓小平高兴地笑着说：“好！好！”第二天，邓小平在三潭印月又碰到了这位小女孩。他直呼只有一面之交的小女孩。小女孩大声地叫“邓爷爷好！”并展开双手扑向邓小平的怀抱。邓小平用温暖的手抚摸着孩子，亲昵地说：“来，跟爷爷亲亲！”孩子高兴地在他的脸上亲着，邓小平亲热地搂着她，和孩子的小脸紧贴在一起。在场的摄影记者拍下这珍贵的镜头。不久，在《浙江日报》上以“亲亲邓爷爷”为题刊登了其中的一幅照片。

在三潭印月，还留下了邓小平让一位青年工作者拍照的故事。当时，一位来自宁波的青年工人正在三潭印月游玩，当他看到邓小平一行人向他缓步走来时，便端起相机对着他们按下快门。见到有人拍照，邓小平赶忙停下脚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非常和蔼地与这位青年攀谈起来，问他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是不是坐火车来的，等等。当得知这位青年是宁波人时，邓小平风趣地说：“宁波不错，很大嘛”。这位青年拍摄的照片，后来在上海出版的《青年报》上发表。在我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由于正值农历新年，浙江省委准备宴请邓小平。他听了省委的建议后，连忙摆摆手，他嘱咐浙江省委领导：“不要宴请，吃顿年夜饭可以。”这天晚上，邓小平在刘庄和省委领导、卫士、服务员一起，度过了愉快的除夕之夜。

一天早上，厨师在锅里煮好稀粥后，又盛了几勺进锅里，继续在灶上用火熬，想让邓小平吃得更可口一点，但服务员在为他盛第二小碗时，发现由于熬的时间过长，粥底有些粘锅了，便想着给他换一碗。邓小平忙摆手：“不用，不用，糊了，可以助消化嘛。”看着邓小平津津有味地喝着稀粥，服务员心里暖暖的。

邓小平对西湖情有独钟，他的足迹几乎踏遍西湖的山山水水，岳庙、灵隐、孤山、平湖秋月、苏堤、白堤、花港、龙井、九溪、六和塔……都留下过他的音容笑貌。他反复嘱咐浙江省委领导：“杭州绿化不错，给美丽的西湖风景添色，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西湖名胜，发展旅游业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真是个好地方。要把西湖保护好，建设好！”

6、陈云的清廉故事

陈云（1905－1995），上海青浦人。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为民族的独立解放、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奉献了毕生精力，深受人民群众敬仰。

陈云对浙江有着深厚的感情，曾先后在嘉善、余姚等地领导开展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40余次到浙江调研和指导工作，并写下“杭州是个好地方”的题词。

不搞特殊，与群众一起听评弹

陈云爱听评弹，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杭州，经常要到市区的三元、大华和吴山书场去听（看）评弹演出。

警卫处长伍一回忆说：那个时候，陈云在杭州每天从报上了解各书场的评弹演出海报。有选择地到书场去听书。而听书又总是自己掏钱叫身边工作人员买戏票，从不依仗权势听白书，也从不用公家一分钱。

大华书场坐落在杭州青年路的一条小巷子里。由于建造有些年代了，地基逐渐下陷，房梁柱子遭白蚁蛀蚀等。为防止房子倒榻而发生意外，每次陈云去书场前，从安全警卫出发，省警卫处都事先派人去检查一遍，待没有问题时，才同意陈云去书场听书。

以后，省委考虑到陈云的安全，也便于中央领导在杭州听书，瞒着他在延龄路3号建造了一座小会堂，准备把评弹演员请到这里专为中央领导同志演出。

会堂建造好后，当省委领导把这事对陈云说了，他顿时双眉紧蹙，说：“你们这样做，不是为我提供方便，而是要把我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

以后，虽然省委几次在延龄路3号安排小型文艺演出，请陈云去，都被他婉言谢绝了。最后，省委只好把小会堂辟作其它用途。

书场是群众出入比较多的地方，每当警卫人员为安全问题犯难的时候，陈云总是对警卫员说：“我不像毛主席、周总理、少奇、朱德同志那样容易被群众注意和围观。他们进不能过早，也不能太晚。”

陈云为了不惊扰群众观赏和演员的正常演出，每次由秘书事先买好旁边位置的票。

“去书场，只要一二个随行就可以了。”出发前，陈云对卫士交待好后又对驾驶员交待：“我们乘车去，车子停的离书场远一点地方。不要在书场门前下车。”

这样，陈云每次去书场，或是乘车或是步行，只有一两个随员，车子也是停在远离书场的地方。下车后，悄悄走进书场找位置坐下，演出完退场后，又静静地从旁门出走。从不影响群众听书。又由于小书场光线暗，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人认出来。

1957年3月，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到中国访问，送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每人一台录音机。有了这台录音机，陈云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录制了一些评弹节目，在寓所听录音，便很少再去书场了。

以后，陈云凡是请人录制新的节目，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按市场上的价格付钱。他强调，“小小的几盒磁带，值不了几个钱，但购物付钱，天经地义。”并总要一本正经地说，“钱物不在多少，一定要收讫两清。”

到了20世纪70年代，那台录音机用久了，录音带经常要断。这时，有人提议去买台新的录音机。陈云淡淡一笑，说：“这台录音机虽然笨重些，但还是灵光的。”婉言拒绝了人们的好意。以后，这台录音机又经过多次维修，一直伴随着老人去逝。

陈云心里想着群众，一点一滴，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

二、浙江革命先烈的清廉故事

7、陈寿昌的清廉故事

陈寿昌（1906—1934），浙江镇海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和红十六师政委。1934年11月22日，陈寿昌率红十六师在湖北崇阳县老虎洞与敌遭遇，在战斗中，他腿部不幸中弹，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亦留忠胆在人间”

1906年10月，陈寿昌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是清朝时的举人，曾被有钱人家聘为“清馆”先生（合伙聘请的家庭教师），在武汉教书。

陈寿昌16岁时离开家乡，来到祖父所在的武汉。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电报局，被分配到郑州电报局工作。不久，陈寿昌从郑州调到武汉电报局工作，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一起，积极发动工人组织工会，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参与组织收回英租界的斗争。1927年6月20日，他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执委。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公开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武汉三镇。陈寿昌一时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一些好心人都劝他不要再冒风险。连电报局的上司也劝他说：“年轻人，又有家室，何必去冒这个风险。电报局待遇优厚，还是安分守己，保牢铁饭碗吧。”为此，特意把他调到离家乡不远的又比较安全的浙江定海电报局工作。但是，这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他去定海不满一个月就辞职了。同年冬天，他辗转到了上海，决心找到党组织。

一天，陈寿昌在街上与李立三邂逅相遇，使他重新开始了革命生涯。旋即担任中央秘书。陈寿昌在担任中央秘书期间，湖南农民打土豪没收了一批金银财宝，秘密运到武汉，要设法转送到上海，作为党中央的活动经费。党把这一重任交给陈寿昌去完成。陈寿昌身着长袍马褂，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阔老板，偕同夫人胡友娣和随员（党组织派来的警卫员）到了武汉。他迅速接上了关系，接收了这一批足足可装半个枕套的金银财宝。为了避人耳目，他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今天上这个银楼兑一点，明天上那个银楼兑一点，把兑换来的钱钞陆陆续续汇给上海党中央秘密机关。

有一次，夫人胡友娣看到这堆金银中有一只小小的金响铃，就说：“这只响铃就给女儿戴吧！”平时很爱说笑话的陈寿昌，这时却十分严肃地说：“这是同志们流血牺牲得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拿呢。”隔了几天，他却对胡友娣笑嘻嘻地说：“这只响铃就给女儿戴吧！”原来那只响铃不是真金，是镀金的铜制品。这件小事情，充分反映了他廉洁奉公的高贵品质，也一直清晰地留存在胡友娣的记忆中。

1934年夏天，陈寿昌和战友们转战在深山密林之中，经常以草根树皮充饥，他饿得口吐黄水，双脚浮肿，身体非常虚弱。为了防止敌人的袭击，每天还得多次转移驻地。保卫局长邓洪看了实在不忍心，就用自己过去修钟表积攒的钱买来一碗面条给陈寿昌，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吃一口，一定要让给伤员吃。

陈寿昌生前曾写下一首铭志诗：“身许马列安等闲，报效工农岂知艰。壮志未酬身若死，亦留忠胆照人间。”他牺牲后，红十六师仍然在湘鄂赣根据地坚持斗争。抗战爆发，这支部队由陈毅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成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之一。新中国诞生以后，人民政府为了表彰陈寿昌的特殊功勋，将他牺牲的地方湖北省崇阳县命名为寿昌县。

8、罗学瓒的清廉故事

罗学瓒（1894—1930），湖南湘潭人。192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曾就读于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学。1929年1月，奉派赴浙江工作，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1930年8月27日，被杀害于浙江陆军监狱刑场。

“不知今日乐，不顾后来身”

1913年，罗学瓒冲破家庭的阻挠，考入湖南第四师范。不久转入第一师范第八班，在这期间，他和毛泽东、蔡和森同学志同道合，互相切磋，积极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曾写诗明志说：“伤心国家事，勇猛直前行；不知今日乐，不顾后来身。”他的勤学好问、笃于友谊的精神，深为学友所尊重。

罗学瓒很注重交友，但所交的朋友又必须志同道合，绝不随便。他给自己定了“三不交”的原则：第一，势利的人不交；第二，品行卑污、无远大志向的人不交；第三，好谄媚逢迎的人不交。对那些有才能有志气、救世救民的朋友，主张要敬仰他，同他和衷共济，而切不要嫉妒他。正是本着这个宗旨，罗学瓒与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李维汉等有志之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8年8月，罗学瓒同毛泽东等二十余人来到北京学习法文，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八人住在景山东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院的一间民房里。据罗章龙回忆：“住在三眼井，生活上所有的事，罗学瓒总是带头干，本来这些工作是轮流值日，可是，他看蔡和森等几个人身体不好，常常生病，就主动替他们干。我们几个自己办了伙食，上街买菜，买煤球，这些跑腿出力的事，罗学瓒总是积极干。我们劝他轮着来，他笑着说：‘我身体好，应该多干一点。’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他一方面是愿意为大家多出力，一方面是让别人省时间来学习。”

1929年初，罗学瓒被派往浙江参加中共浙江省委领导工作。1月中旬，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改组省委，罗学瓒任宣传部长，4月，任浙江省委代理书记。4月30日下午，罗学瓒因叛徒告密在杭州被捕。

罗学瓒被关押在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期间，在一次绝食斗争中，由于一天一夜滴水未进，大家喉干唇裂，坐卧不宁。到了午夜，一名同志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查看平时盛水的小木桶，发现桶内还剩有少许水脚。他把水倒在杯里滤清后，先递给受刑后身体虚弱的罗学瓒，但罗学瓒把水推给了其他同志。推来推去，谁都不愿先喝，依旧推到了罗学瓒的面前。他盛情难却，只好将嘴唇在水里浸一浸。其他同志也学着他的样，滴水不喝。末了，仍旧还有半杯水。这虽是在绝食斗争中的一个小插曲，但表现了同志之间同甘共苦的真情，也表现了在关键时刻，共产党人先人后己、坦荡无私的博大胸怀。

1930年8月27日凌晨，罗学瓒等一批民族精英被杀害于监狱内刑场。据同狱的战友回忆：那日先烈们是被分批杀害的。当敌人罪恶的枪声响起之后，罗学瓒知道已经开始屠杀了。同时也知道自己不免于难，他从容地穿好衣服，着好鞋，视死如归。同牢的战友们，眼见到日夜相处，一同学习，一同战斗的战友即将被敌人杀害，都流露出愤怒和痛楚之情。罗学瓒见状，反而安慰同志们说：“死，有什么可怕，革命者只要死得其所。大家不要为我和其他死去的同志难过，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说罢，与战友一一握手告别，然后昂首步往刑场，英勇就义。

9、李临光的清廉故事

李临光（1907—1930），福建厦门人。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团浙江省委委员，1929年4月改任共青团杭州中心市委书记。同年7月24日因叛徒出卖第二次被捕，1930年8月27日，在敌人大屠杀时英勇牺牲。

“人类解放不成，何以家为”

李临光出生在华侨富商家庭。上大学后，他不贪恋安逸生活，而是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李临光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3月，参加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在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离开学校，投身党的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李临光坚持地下革命活动。李临光的父亲见他处境危险，极力劝其去南洋经商。他以革命为己任，坚决不同意去南洋。1927年11月，李临光在上海被捕入狱，经党组织及其家庭重金营救获释。家庭再次苦劝他放弃革命，到南洋去，并为他备了行装，择了行期买好了船票。

在起程的前一天，李临光给母亲留下了一封信，表示“人类解放不成，何以家为”之后，偕同妻子离开家庭，双双致力于革命斗争。1929年6月，任共青团杭州中心市委书记。7月24日，李临光陪同团市委组织部长周善去浙江大学工学院取密件时，因叛徒出卖，两人一起被捕。被囚禁于浙江反省院时，李临光因秘密领导难友斗争被发觉，转囚于浙江陆军监狱。1930年8月27日，与裘古怀等19位同志一起英勇就义。

以下是李临光夫妇离家出走时留给母亲的信。

母亲：

我的身体好了，谢谢你老人家对我的照顾。为了革命，我和婉贞（李临光烈士的妻子）又走了。我们知道这次走了以后，家人将不知如何的牵挂，你的老泪将重新纵横，弟妹们的怀念将重新绵延，家人的寻觅又将重新开始了。我们离开家，并不是不要母亲，而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我们实在不能做家庭的奴隶，更不能做金钱的奴隶，我们怎能抛弃自己的意志去锱铢必较，做那孳孳为利的事情呢？私心自测，人类解放不成，何以家为。我们这次出走后，将重新过我们革命者清苦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不十分安逸，但在精神上却十二万分的快乐。在革命队伍中，我们虽粗茶淡饭，但我们觉得这比家中的山珍海味好吃得多。我们离家后虽得不到你的爱抚，但可以得到千千万万工人们的爱抚与照顾。一切请你放心。

仲怀 婉贞 留

（一九二八年）二月三十日

10、朱镜我的清廉故事

朱镜我（1901—1941），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192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宁波临时特别支部书记。1937年11月受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的委托，在杭州主持建立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1938年2月后，调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和新四军军部工作。1941年1月13日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我要是为了做官，十年前就不会走这条路了”

1901年，朱镜我出生于鄞县朱家峰村。10岁左右，父母相继去世，只剩下他和二哥朱德和，一起寄养在奉化吴江泾的外祖母家里。

为使兄弟俩能互相照顾，已经考取浙江留日公费生的朱德和于1918年7月趁回国度假之机，把朱镜我带去日本，靠他二哥在公费中节省下来的钱维持生活和学习。1924年，朱镜我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毕业，为了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舍弃了一般学生都热衷于考理、工、商、医科的志向，毅然选择并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专攻社会科学。

1927年，朱镜我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获“文学士”学位。10月，他毅然回国，参加了创造社，并在上海“艺大”等学院兼任教授。朱镜我本可以安稳生活，但他看到了当时的形势，国共两党的为民态度，更促使他坚定了革命的思想，为了国家的前途，执意追随共产党进行革命实践。

1937年10月间，朱镜我受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委托，筹建浙江省党组织，在杭州皮市巷正式成立了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很困难，朱镜我因没有社会职业，生活也很拮据，他回到鄞县老家，将家里几十亩土地和家产抵押了，用作交党费和革命活动经费，其余的分给穷人家。当地乡亲们评论他：穿的粗布衫，吃的青菜淡饭，待人和气态度好，无论和谁都能相处。朱镜我的一个表兄叫吴嵎，曾任国民党中山舰舰长，他见朱镜我穿一件旧长衫，瘦骨伶仃，不无惋惜地说：“你有学问、有才能，何苦再做共产党的冒险事！图什么？还是跟我去稳做国民党的官吧！”朱镜我淡淡一笑答道：“我要是为了做官，十年前就不会走这条路了。”朱镜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心里装着的全是人民的利益、党的事业。

1938年11月，朱镜我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担任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长时，让妻子赵独步（赵迨今）及年幼的长子长女参加了新四军。他身为著名的学者，军内高级干部，但一身士兵服装，与大家同吃同住在一起，常常亲自为干部战士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皖南事变突围中，朱镜我等在敌人追逼下，警卫员与战士们要背身患重病的他突围时，为了不连累战士，保存革命力量，他要战士们尽快突围出去。当战士们不肯离去时，他命令战士：“不必为我多送几条命”，“你们自己快打出去”，他自己却为共产主义事业壮烈牺牲。

11、金维映的清廉故事

金维映（1904—1941），女，浙江岱山人。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赴岱山、衢山领导盐民运动，在定海城区领导工人运动。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是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30位女战士之一。1938年赴苏联养病，1941年6月，在战乱中牺牲。

餐餐吃的精光

金维映1904年出生于浙江舟山群岛的岱山高亭镇，原名金爱卿，参加革命后，同志们爱称她阿金或阿金姐。

1926年，宁波党组织派人到定海发展党员。同年10月，金维映由邬凤英和王士宏（声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她成为舟山群岛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定海独立支部的领导成员之一。这时，正是大革命高潮时期，金维映按照党的指示，参与了国民党定海县党部的筹建工作，并担任县党部宣传部长。

1933年秋冬，金维映被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次年改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动员部副部长。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里，她总是穿一身蓝色列宁装，腰间系着一条皮带，扎绑腿，着草鞋。那时，她已和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结婚，他们的家除了一张兼作办公桌的大床外，没有任何别的摆设。他们的家是个温暖的革命之家，同志们都非常喜欢到阿金姐家吃饭。所谓“到阿金姐家吃饭”，这指的是：因为他家离伙房近，开饭时，各人从伙房打来一份饭菜，坐在她家的床沿上或蹲在她家院子里的树荫下边吃边谈。大家吃着同样的糙米饭、酸菜和南瓜汤，中央领导同志也不例外。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金维映小时候缠过脚，走起路来比较困雄。但行军中当有的同志走不动时，她总是抢着帮助这些同志背东西，或扶着他们赶路。到了宿营地，要安顿同志们的吃住，还要做群众工作。同志们一致夸她，说她这个从城里来的女同志，又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能这样坚强，真是难得。

1938年春，金维映调任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可惜，由于长期处于紧张的战斗环境中，生活又十分艰苦，她的健康遭到严重的损害。于是，组织上决定送她去苏联治病。

金维映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初期，在生活上有很大改善，但她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发什么就用什么，从来没有特殊要求。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国内物资供应紧张，影响到学校，发的东西少了，伙食也差了，有少数学员不满意，发牢骚。对此，金维映对他们进行了劝说和批评，还带领大家唱起《餐餐吃的精光》这首在中央苏区经常唱的红军歌谣：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的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歌儿一唱，大家又回忆起当年的情况。精神振奋了，情绪活跃了，牢骚、怪话也少多了。

去苏联治病，本来是一件好事，不料它却给金维映带来了极大的不幸。1941年，战火很快燃烧到莫斯科。这时金维映正住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家医院里，因该院未及时撤退，她不幸牺牲在战乱中。

12、王文祥的清廉故事

王文祥（1906—1945），浙江绍兴人。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员。曾任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四明工委书记，四明地委书记，杭甬沿线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1945年12月22日病逝于上海。

一件旧棉袍一年穿三季

1906年，王文祥出生在绍兴。祖父是做丝茶生意的商人，常往来于上海、广州等地。父亲是地主，靠收租生活。他幼年丧母，和继母关系不好，由祖母抚养长大。继母生有一个弟弟，和他感情很好，大革命期间由他动员参加北伐军，不幸在作战中牺牲。从此，他怕继母吵闹，再未回过老家。

王文祥曾经在白色恐怖下蹲过多年的监狱，身体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当时环境恶劣，生活艰苦，王文祥又身患严重的肺结核，既无医药，又缺乏营养，加上工作繁重，他的体质越来越差。即使这样，王文祥同志也能够始终坚持刻苦耐劳、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一天步行几十公里，不怕疲劳，到了一些老同志家里吃饭，也只吃碗面条或青菜淡饭，从不搞特殊化，更不会在路上花钱吃饭。

王文祥对身边工作人员既是一个严师，又似一个密友。据当时的秘书陈明华回忆：转入秘密机关，一度我很不安心，感到不习惯，认为机关掩护工作实际是当个家庭妇女，不及基层受锻炼、进步快。于是，他似兄长般地谆谆引导、说服我。他详细地分析形势，指出：“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必须要有少数同志转入职业的秘密工作，还要有人做革命的家庭妇女，以保护机关的安全。”他要我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说：“有的同志二十来岁参加革命，被捕入狱，释放时已三十多岁了。有谁愿意坐牢受刑？谁习惯于监狱生活？但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坐穿牢底，准备英勇牺牲，这是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在他的耐心教育和忘我工作的影响下，我终于安心工作了。

王文祥同志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特别是在政治上自觉接受党的考察和监督。他曾经跟秘书说过，一个独当一面的领导干部，上级和他经常不在一起，无法考察他，他的秘书、警卫人员，甚至他的妻子，都有监督、考察的责任。假如发现他有问题，对党不忠诚的时候，应该及时地向他的上级反映。

在生活上，王文祥非常克己。在宁属期间，他虽然重疾在身，但生活上从没有特殊要求。一件旧棉袍，一件毛衣，一直穿到他在上海逝世。这件棉袍，每年要穿三个季度，春天把棉花抽出改成夹袍，度过春、秋两季，冬天又套上棉花继续穿。

1943年7月，浙东区党委决定王文祥到三北休养，谭启龙政委亲自写信给王仲良同志的介绍信，写明王文祥的生活费，按他自己的预算发给。但实际上每周有一只鸡蛋算是特别营养，其他都和一般同志的标准一样。休养期间，浙东区党委曾两次派通讯员去照顾他的生活，他都动员战士回部队去了。吃饭也是一直在群众家里搭伙，不要组织特殊照顾。

13、邵飘萍的清廉故事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1925年春，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地下党员，英勇无畏的反帝反封建斗士，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中国新闻战线的先驱者。1926年4月26日被北洋军阀枪杀于北京。1949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文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钱可丢，名可抛，性命也可不要，骂人的自由决不放掉！”

邵飘萍于1925年春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报坛上有重要影响的著名记者，他仇恨军阀统治，以犀利幽默的文笔，对大小军阀进行了笔伐，尤其对张作霖的揭露和抨击最为厉害，称这位大帅是“马贼”、“强盗王”。

1926年春，在直奉战争中占了上风的奉系军阀开进北京城，奉系头子、安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张作霖下令将邵飘萍抓进了监狱，并派北京守备师师长陆长镇来狱中劝降。

陆长镇强作欢笑，说：“我是张大帅亲自派来的，只要先生归顺我们大帅，大帅说了，要官给官，要钱给钱！”

“谢谢张作霖的好意！我只有一个要求，要……”

“要办报也可以，张大帅愿意出资，以您的名义办一张全国大报，一切由您安排。”陆长镇急切地说出了张作霖的打算。

“哈哈……”邵飘萍大笑道：“我要骂人，可以吗？”

陆长镇一愣。“我要骂那些祸国殃民的军阀，骂他的祖宗三代、四姨八姑。别人不敢骂的，我姓邵的要骂，你们大帅能容下这样一个‘骂客’吗？”

陆长镇沉思一会，说：“邵先生，能不能给张大帅一点面子。骂其他人都可以，只给大帅……说点好话，钱和名位……”

“不，”邵飘萍突然厉声打断他的话，“钱可丢，名可抛，性命也可不要，骂人的自由决不放掉！”

陆长镇无话可说了，他做了个手势，让狱警将“夜狐张三”张翰举放进来。

张翰举是北京《大陆报》社社长，在同行中以品行不端闻名，因经常夜入妓馆娼楼，被人们称作“夜狐张三”。

“夜狐张三”缩着头来到邵飘萍面前，劝说道：“飘萍老兄，张大帅愿意出30万大洋，买你的一句话，这可是大价钱哟！当年袁世凯为收买梁启超，也只答应20万大洋，你的身价可是民国以来最高最高的。飘萍老兄，还摆什么架子哪。”

邵飘萍讥刺地说：“可惜呀！值钱的不肯卖，不值钱的又卖不出，可惜，可惜，翰举老弟卖不掉啦！”

陆长镇目视张翰举。张翰举只好硬着头皮再劝：“识时务者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

邵飘萍不再理睬他们。他面朝天花板，吟诵文天祥的著名诗篇《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陆长镇与张翰祥面面相觑，无可奈何。

过了一会，陆长镇打起精神，作最后的一搏。他把一张由张作霖亲自签发的30万元支票递到邵飘萍面前。

“邵先生，我们大帅是真心实意要倚重先生啊，您先收下这点见面礼，以后怎么干，可以慢慢商量嘛。”

邵飘萍接过支票，斜眼一瞥，轻轻地折起来，然后迅速将它撕个粉碎，继续背诵：“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陆长镇与张翰举狼狈地退出牢房。

张作霖听说自己的妙计不灵，大发雷霆，把陆长镇和张翰举臭骂了一顿，然后恶狠狠地下令将邵飘萍枪毙。

1926年4月26日早晨，邵飘萍慷慨地走上天桥刑场。他朝周围的群众和奉军士兵拱手说：“免送，免送！”含笑饮弹，英勇就义。

14、俞秀松的清廉故事

俞秀松（1899—1939），浙江诸暨人。1920年，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6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党员之一。曾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书记。曾两度去苏联工作学习，后被派回新疆工作。1938年因受王明、康生等人的诬陷，屈死于苏联。

“做官？我不曾有过这种念头！”

1899年6月25日，俞秀松出生于诸暨大桥乡溪埭村。他的父亲是清朝末年最后一代秀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俞秀松是家中长子。

1908年，俞秀松入本村行余小学，后弼临浦高等小学读书。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深重，他深“痛祖国之沦亡”，在幼小的心灵里就萌发了反帝救国的志向。

1920年夏，俞秀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由杨明斋陪同来到中国时，俞秀松曾给维金斯基当过一段时间的助手。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由于俞秀松在当时党的发起人中年纪最轻，陈独秀派他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青年团成立以后，俞秀松日日夜夜为青年团工作奔波操劳。当时李达曾对王会悟说：“秀松这个人正直、谦虚、很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革命者的性格。”

1935年6月，联共中央派俞秀松等25人进入新疆。为了做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工作，俞秀松到新疆后，化名王寿成，担任新疆全省反帝联合总会秘书长。此外，他还担任新疆学院院长、省立一中校长、督办公署边防处副处长、航空学校政治教官等职。繁重的工作，累得他两眼布满血丝，身体日渐消瘦，但他为了一个目的——为革命、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类的解放而辛勤工作。

俞秀松不争名，不为利。1937年新疆省主席李溶送来委任状，任命俞秀松为省教育厅厅长。他于次日便把委任状退回了。他说：“我要是想做官，我早已回浙江当教育厅厅长了。”俞秀松对做官一向是深恶痛绝的，早在1923年的几封家信中便说：“我现在不曾帮助父亲负担多少责任，心中颇为不安；但我不能如那班醉迷做官发财的人同流合污与敲诈民财。”“做官？我不曾有过这个念头！”

俞秀松的生活是简朴的。所有接触过他的同志都称赞他这一美德。他在反帝总会工作期间，公私分明。在他担任秘书长时，新疆当局曾经要为他买小汽车，被他拒绝了。他说：“我还是走走路，骑骑马好！”

俞秀松一向认为：“吾国是工业落后之国家。但将来使国家臻于富强之域，则工业自不能不使之大大发展。”因此，他对大弟俞寿乔的要求是：“你是务农的一个工人，这是何等神圣而且光荣的职业，比那班什么阔佬大人先生们都可尊敬万倍！但是你要尽你这个农人的责任，发挥你们劳动者的伟大能力，毋自暴自弃！”“做工要勤奋，待人要厚道”，“希望吾弟妹等皆有独立谋生的能力，不要依靠家产。谚云：家产千金，不如薄技在身。”

俞秀松在新疆坚持党的原则，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这就不能不引起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暗中嫉恨。1937年12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延安，途经新疆，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诬陷俞秀松是“托派”，盛世才便借机将他逮捕入狱。他爱人安志浩前去探监时，他对爱人说：“坐牢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要革命就不怕杀头。革命者是杀不完的。为革命献身是光荣的。”

1938年6月，俞秀松被押往苏联。不久，他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被害，终年39岁。

15、卓恺泽的清廉故事

卓恺泽（1905—1928），浙江奉化人。192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江浙区委委员，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团浙江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3月，任团中央特派员兼团湖北省委书记，赴武汉工作。4月，因叛徒出卖在武昌被捕，并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毁家成国，不亦宜乎”

1905年10月23日，卓恺泽生于奉化县松岙村。家境原先比较富裕，后来逐渐破落，在恺泽成年时，尚有土地十多亩，楼屋四间。

1919年，卓恺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宁波省立第四中学。他受五四运动的熏陶，常去学校图书馆阅读课外书刊，吸收新思想、新文化，还参加学生会的工作，带领同学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后来，他和在宁波第四师范读书的同乡好友裘古怀等一起，筹募经费，购买一批进步书刊，在家乡创办了一所“松溪图书馆”，为群众学习新思想、新文化提供条件。

1923年8月，卓恺泽考入北京的华北大学预科不久，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他和陈毅，乐天宇等二十多名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卓恺泽入党后，以主要精力从事革命工作。1924年，他给裘古怀先后写了十三封信，议论国事，交流思想。并经常寄《向导》、《政治生活》等进步刊物，使裘古怀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6年7月，卓恺泽受中央派遣，到江浙两省指导工作。到宁波、奉化后，他指导和帮助当地的党、团组织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农会，进行减租减息，抗捐抗税斗争。他首先在家乡松岙，和卓兰芳一起，发展党员，动员农民参加农会。在自己家的后宅堂前召开了第一次农民大会。经过动员，有近百人报名加入农会。以后参加农会的人数越来越多，整个忠义区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斗豪绅，烧田契，破迷信，敲菩萨，打盐局，闹县府声势浩大。他还动员父母，把家里的田契交给农会。他舅父庄世民（辛亥革命时曾任浙军参议，后沦为政客）曾“规劝”他：“年纪轻轻，正当求学深造之时，应继续努力读书，岂可跟共产胡闹，若落得生命不保，后悔莫及！”并以资助去日本留学为诱饵，企图阻止他进行革命活动。他毅然拒绝这份“好意”，同其断绝往来。在一次曹王庙演说时，他公开揭露舅父的反动本质，号召农民起来，把这些豪绅、官僚统统打倒。

1927年8月，中共浙江省委遭破坏，中央派遣夏曦和卓恺泽等到浙江重建省委，并把省委从杭州迁到宁波，卓恺泽任团省委书记。当时，我党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突然袭击，经费困难。为协助党解决经费，他以“毁家成国，不亦宜乎”动员其父亲变卖家产，资助了革命。为了搞松岙暴动，再次动员父母、姐夫、外婆等亲属，支助出1700多银元，加卓兰芳等筹集的资金，共达2000余元。由他去上海买了十二支驳壳枪、十二支手枪及两千余发子弹，武装了奉东的农民、渔民。

1928年3月，湖北省党团机关被破坏，卓恺泽被委任为团中央特派员兼团湖北省委书记。到武汉不久，由于湖北省委的一个内部交通投敌叛变，卓恺泽不幸被捕。当晚，他的爱人和孩子也被捕。

在狱中，有一天卓恺泽乘狱卒不在的机会，对爱人说：“我决心一死，你不要难过，要坚强地生活下去。”4月20日晚上，他又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人总不免一死，死是最寻常的事。死于枪弹之下，其更比死于床褥之间的痛快而有意义。……我生时，因奔走各地，不曾对我亲爱的父母有很好的物质与精神的安慰。但我想，明白的父母决不会以此责恨我。‘为公忘私’‘为国忘家’，是古有名训的。……父母你们乐天知命的等着光明的来到吧”。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视死如归的伟大胸怀。

1928年4月26日晨，卓恺泽被敌人从牢狱里带出来，押往刑场，英勇就义。

16、徐玮的清廉故事

徐玮（1903—1928），江苏海门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8月，奉派到杭州，以共青团中央巡视员身份主持团浙江省委工作。11月9日，在杭州团省委机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28年5月3日，在杭州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牺牲。

“但愿此生有意义”

1903年10月8日，徐玮出生在江苏海门县瑞祥乡路东村。少年时代的徐玮勤劳纯朴，富有正义感。白天他父亲忙于教书，母亲种地做家务，晚上稍有空闲就给孩子们讲岳飞、文天祥的故事。徐玮就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中成长起来。他每天放学回到家里，总是积极地帮助父母干活儿。当时农村经常闹灾荒，每到青黄不接之时，大批穷苦农民外出讨饭。徐玮看到妇孺老幼上门来乞讨，总要想法从家中拿点吃的给他们。

1926年夏，徐玮从国民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后，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徐玮自参加革命以来，为了党的事业，到处奔波，无暇顾及家事，也未为双亲稍尽孝心。相反，家里因他参加革命，欠下一笔债务，母亲则为他日夜担惊受怕。还有他同未婚妻俞女的关系一直未明确。为了安慰亲人和避免他的死使家庭经济受影响，尤其是为了避免他的死连累未婚妻，或未婚妻因他而终身守寡，他在狱中给家里写了一封遗书，主要内容如下。

我的家庭：

在我的血流尚未停止时，得有机会遗书于你们，这是一件差强人意的事。我要告诉你们的有下列几件事：

（一）你们应当看我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员，而不是一个家庭的子弟，更绝对不是孝顺的子弟。我一生尽力革命，未尝稍懈，对于你们既没有丝毫补助，又缺少经常关系，所以我死后你们不应视我为家庭的一份子而为我悲伤，你们应继续我志而奋斗。

（二）我求学做事颇得友朋资助，债是我个人所借，当不能由你们代偿，我的友朋也不会索偿，请放心。

（三）我并未有异性的结合，请免挂念，未婚妻俞女与我概无关系，当听其自由。

（四）我以天下为家，我的遗骸随处可放，由它腐败，不必运回，也不要花钱在杭营墓，这都是无意义的。

（五）一切诵经拜忏道场祭奠等等无聊举动，为我所坚决反对者，当不宜有，即追悼会发讣文等等亦属无谓，不应举行。

（六）我友周赞明与我相知较深，大哥、石弟应与之来往，可以解决许多困难问题。

（七）我现在心平如镜，并不痛苦，人生莫不有死，枪毙死得最痛快，况我死得有意义，请勿念。

 祝康健。

除此，临刑前几天，他还写下了一首诗：

前人去后后人到，生死寻常何足道；

但愿此生有意义，哪管死得迟和早。

灰色马儿门外叫，我的使命已尽了；

出门横跨马归去，蹄声响处人已遥。

徐玮牺牲时年仅25岁。他的革命业绩永远使人怀念。

17、赵刚的清廉故事

赵刚(1887-1930)，浙江瑞安人。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沪杭铁路任职，曾任中共艮山门火车站支部书记中共杭州县委书记。1929年3月在杭州艮山门被捕。1930年8月27日牺牲于浙江陆军监狱。

使全国人民都能过幸福生活

1887年1月25日，赵刚出生在瑞安县嘉义乡龙川一户农民家里。青年时代的赵刚，关心家乡群众，热心于公众事业。为了消除山洪暴发的隐患，造福于家乡人民，他主动担任山林管理员，发动群众到方圆十几里的“大众山”，遍植各种树木，使家乡四周到处是一片郁郁葱葱。

1917年，赵刚经朋友介绍，参加了交通部主办的货运业务短训班学习，结业后，被派刘津浦铁路的天津站工作。五四运动后不久，他被调到沪杭甬铁路的上海南站工作。

1925年8月，在中共上海区委的直接领导下，沪杭甬铁路开始了建党工作。不久，赵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当时住在艮山门外距火车站半里路的竹林深处，那里有一座临近大水塘的矮屋（位于今艮山门站外流水桥以西焦家村一带），这里既是他的家，也是他和同志们进行革命活动的秘密交通点。他经常把微薄的工资节省下来，用作组织武装斗争的活动经费，和接济有困难的同志，有时还把自己新制的衣服供给同志们作改装用。这样一来他的生活就更加简朴。

1927年11月，在杭州的浙江省委机关遭到大破坏，省委十一个委员中有七人被捕被杀。赵刚的一位至亲好友更加担心赵刚的安全，婉转地劝他说：“你在铁路工作，收入够吃够用，何苦一定要干革命？”赵刚率直地回答说：“现在社会不平等，苦的人苦死，享福的人享福死，我干革命是想实现共产主义，使全国所有的人都能过幸福生活。”那人听了又对赵刚说：“貌似也觉得那个理想是好的，就是太危险了，你应当留一手。”这时，赵刚为了做好在场的妻子林莲花的思想工作，高声说道；“那怕什么，我不死，你不死，革命怎么成！人死留名虎死留威，死有什么关系，人总有一死，就看死得有没有意义，只要将来全国人民都能过幸福生活，我即使死了也是甘愿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理想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

赵刚被捕后，其妻林莲花拖着怀孕足月之身，手拉一双儿女前去探监。她看到身陷囹圄的赵刚被敌人折磨得面黄肌瘦，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泣不成声。赵刚却面带微笑地安慰亲人，嘱咐妻子要坚强些，并说。“判十五年没关系，迟早会出来的。”他还嘱咐林莲花，回去熬一罐猪油，多放些盐，送来给难友们当菜吃。1929年9月，赵刚的次子出生了。婴儿满月后，林莲花抱着他去探监，隔着铁窗让赵刚同自己的孩子见上一面。此时，赵刚非常高兴，从铁窗里伸出手抚摸着孩子的胎发，沉思片刻，想到长子名叫“天富”，当为次子取名为“天德”。他就这两个名字对妻子解释说，“天富”就是要让天下的劳动人民都富起来，“天德”就是愿天下的人都有道德。

赵刚在狱中积极地开展斗争。他通过同志联络，准备策动国民党保安团兵变劫狱，不幸事露。国民党浙江省高等法院立即提审赵刚，改判死刑。1930年8月27日凌晨，赵刚等十九人壮烈殉难，同时遇害的有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徐英和杨子华、裘古怀、王屏周、曹素民等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

1938年春，有一位刘英、粟裕领导的闽浙边抗日游击队队长专门来看望赵刚的家属，并代表组织把银洋十元赠送给林莲花，表示慰问，说：“赵刚同志为革命牺牲，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林莲花感动万分，一定不肯接受银元，要求那位队长带回去作军费，为她的丈夫赵刚报仇。

18、曹素民的清廉故事

曹素民(1901-1930),浙江绍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1929年担任中共绍兴县委书记时被捕，次年8月牺牲于杭州狱中。

“我要办的事比结婚重要得多”

1901年10月6日，曹素民生于绍兴县青坛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全家五口人，没有一分田地，仅有一间破旧的土屋，生活极为贫困。曹素民从六七岁开始就跟着父母、长兄上山拾柴禾，下地捡野菜，深知受地主豪绅盘剥压榨的痛苦。

1924年初，曹素民认识了在上海书店工作的共产党员王承纬，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1925年春，王承纬写信告诉曹素民，说上海党组织推荐他到广州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他母亲以为是曹素民的女友来信，要他去结婚，就高高兴兴地把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七十块银元交给他办喜事。曹索民接过了钱，连声向母亲道谢说：“讨老婆是为自家，干革命是为大家，我要办的事比结婚重要得多。”他又同母亲开玩笑说：“现在我正要东奔西走，有了老婆，像懒母鸡拖尊鞋，跟着走不动。”第二天清早，他就出发奔赴广州黄埔军校。

在黄埔军校，曹素民刻苦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并于1925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第二次东征。

军校结业后，曹素民被分配到以林伯渠为党代表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工作，任第十九师五十六团三营教导员。他很关心和爱护战士，亲自为患病的战士煎药送药，把母亲给他结婚的钱送给经济困难的同志；还经常与战士们一起揭露和控诉反动派的罪恶，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所以，当时三营是六军中觉悟较高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在随军北伐中打出了威风。

1928年10月初，中共浙江省委为了加强绍兴党组织的建设和对革命活动的领导，决定派曹素民回绍兴，赋予他的主要任务是：一、务必在“双十”节前给绍兴反动政府一个回击，以鼓舞群众的斗争信心，二、迅速恢复和发展绍兴地区的党组织，掀起群众革命斗争的新高潮。曹素民到绍兴后，开始时没有同联络人楼子学接上关系。由于时间紧迫，他就自己赶写“双十”节的标语和告工人农友书；并把自己仅有的一条棉被送进当铺当掉，买了钢板、铁笔、蜡纸和纸张，到离绍兴城四十多里路的大哥家里刻写、印刷，然后连夜进城散发。

1928年冬季，敌人更疯狂地搜捕共产党员。为了不暴露目标，党的交通站和活动中心转移到离城十里的东浦热诚小学。曹素民白天进城，晚上回东浦，披星戴月，迎风斗雪，为革命事业奔波不息。他经常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并亲自介绍俞祖炎（现名俞仲武）等人加入共产党。他还利用担任绍兴《国民日报》访事员的公开身份，做调查，写文章，揭露反动派的罪恶，歌颂工人、农民的革命精神，启发群众觉悟。为了解决县委的活动经费问题，他还与搞工运的同志在斗门镇上开设了中医院。

1929年11月14日，曹素民派县委成员、交通员张阿才到省委汇报工作。不料，设在杭州的浙江省委通讯机关已被敌人破坏，张阿才被特务逮捕，他随身所带的《关于绍兴党组织活动情况报告》和工作计划、党员名册，都落入敌人手里。国民党省政府秘书处连夜派大批军警赴绍兴，会同县长、警察局长宣布全城戒严，搜捕共产党人，曹素民不幸被捕，1930年8月27日在狱中遇难。

19、杨贤江的清廉故事

杨贤江(1895-1931)，浙江余姚人。1922年5月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大革命时期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31年8月，在日本病逝。

按月缴纳党费，从未间断

1895年4月11日，杨贤江出生在余姚县一个手工业者的家庭。自杨贤江8岁起，父母节衣缩食送他进学堂读书，从村塾，到溪山初等小学和县立诚意高等小学，再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他处处学习勤奋，成绩优异。

1921年2月初，受商务印书馆（时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之聘，杨贤江来到上海，担任《学生杂志》编辑。

1922年5月，经沈雁冰和董亦湘介绍，杨贤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教育万能论者、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主义者，完成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大革命失败后，杨贤江从武汉秘密返回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一度参加过大革命的知识分子，有的失意，悲观消沉，有的悲愤暴躁，有的离开了革命甚至变节叛党，出卖自己的同志。但杨贤江的革命信念却更加坚定了。他认为：“中国革命这样伟大的变革事业，并非一蹴而就，它要经过多次的涨潮与退潮，然后才能达到最后胜利。”一次，他与张秋人等同志隐蔽在上海绍敦电气公司楼上。性格刚烈的张秋人拿着一张登满脱党声明的报纸，怒气冲冲地对杨贤江说：“这几个人，我早就看出他们是投机分子。可是，这个人我把他看作好人，现在也做出这种事来！”杨贤江听了只淡淡一笑，然后低声说：“让所有的投机分子离开，有什么坏处？”夏衍后来回忆说：“在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的时候，我从他的这种安详镇定的态度中，深切地感到了一个作为共产党员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气概与庄严。”

大革命失败后的这段日子，杨贤江过着隐蔽地下、卖文为生的贫困而又极不安定的生活，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组织性纪律性极强，党有什么任务交给他，他从来不讲价钱，不避风险，尽力按时完成。他所写的《新教育大纲》这本书，就是党中央地下文委为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计划出版的一套新兴社会科学通俗读物中的一种。杨贤江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党交他的这个任务，此书是这套读物中交稿最早的一本。在国民党进行文化“围剿”的严重白色恐怖下，即使用了化名，书店出版杨贤江的著作也要冒极大的风险，因而，杨贤江依靠卖文为生是极为困难的。在贫困的生活中，他还是按月缴纳党费，从未间断。

杨贤江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个人生活极为节俭。他没有嗜好，饮食简单。菜汤里加一点“味之素”（味精），周末喝一小杯五加皮酒，已经算是奢侈了。这固然是他的穷学生出身所养成的习惯，也因为他的家庭负担较重有关。在经济上如此拮据的情况下，他还和沈雁冰、候绍裘等同志一道捐助中共江苏省党部大洋各100元，以帮助解决他们的经费困难。

紧张而又艰苦的生活的折磨和长期工作的劳累，严重地损坏了杨贤江本来很健康的身体，1931年7月，他终于病倒了，患的是肾结核。他是被反动派通缉的知名人物，国内没有条件治疗，在党组织和朋友的帮助下，只好出国去日本医治。8月9日，不幸在日本长崎一家医院逝世，年仅36岁。

20、谢用卿的清廉故事

谢用卿（1898-1944），浙江永嘉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同年8月被捕入狱。1931年春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永嘉县西楠溪中心区委、鄞奉县委、樟村区委担负领导工作。1944年被捕，壮烈牺牲。他的两个儿子——谢裕陆、谢裕九，都是共产党员，也先后为革命壮烈牺牲。

“我还只怕自己够不上做一个共产党员呢！”

1898年，谢用卿出生在永嘉县岩头区蓬溪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

谢用卿高等小学毕业后，留在当地教书。他热心教育工作，为了帮助山乡贫苦农家子弟读书识字，用乐清方言改编了《因音求字》一书，后又编写了《国语因音求字反切法》，广泛流传于永嘉、乐清、瑞安等地，影响很大。

1930年春，谢用卿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6月，谢用卿在乐清被捕。国民党政府将他作为“要犯”押送到杭州浙江陆军监狱。在狱中，难友问他为何吃官司？他说：“我被国民党控为共产党，因此被捕。其实，我还只怕自己够不上做一个共产党员呢！”他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对待狱中难友，则亲如同胞手足。他经常安慰难友说：“为了真理，不怕入狱．现在我们入地狱，将来一定要摧毁地狱"。由于他在狱中表现得很坚强，尽管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也被反动派判处十二年徒刑。经过多次狱中斗争的严峻考验，由监狱地下党支部批准，他于1931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被迫停止内战。1937年8月，谢用卿获释回家。

因为革命工作，谢用卿终年在外，家里全靠妻子李碎花以卖豆腐、养母猪的收入维持生活。有一年年关将到，全家老幼眼巴巴地盼着他带点钱回家来买米、还债。大年三十，他回家了，却身无分文。因为他教书的薪水收入，都用于革命活动以及接济穷苦农民和学生了。跟他一起回家的，还有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李碎花虽然揭不开锅，但对革命同志还是十分热情。她忙把家里一条比较像样的棉被拿去当了，买了些细粮和菜蔬招待客人。他们夫妻俩，还经常教育儿子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40年，谢用卿的长子谢裕陆，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12月，谢用卿再次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反动专员亲自提审他时，他除了痛斥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外，严守党的机密。反动专员一无所得，把他关押在黑牢里。不久，因日寇侵占温州，国民党顽固派乱作一团，谢用卿和难友们得以乘机破牢而出，脱离虎口。出狱后，谢用卿在潘坑等地教书，尽管自己生活艰苦，却把菲薄的薪金供作党的活动经费和用来接济同志。

1944年3月下旬，谢用卿正在溪东联络站接待刚从浙南来到浙东不久的郑九芝、陈禹铭（吴明）同志，不料国民党顽军突然闯进村来。他因转移文件耽误了时间，同郑、陈二人一起被顽军追捕关押。每次审问，他都一人挺身承担，任凭棍打、坐“老虎凳”“忍受酷刑，坚不吐实，并极力掩护郑、陈二人，为他们喊冤叫屈，把生的希望留给年轻的战友和同志。顽军得不到需要的口供，就把谢用卿、郑九芝二人同时刺杀。临刑前，谢用卿高呼革命口号，慷慨就义，连刽子手都不得不佩服地说他是“虎倒威不倒。”

21、朱洪山的清廉故事

朱洪山(1917-1946)，浙江慈溪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慈溪县委委员、鄞慈县特派员、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后勤部副部长、新四军浙东留守处副主任等职。1946年12月31日在鄞西潘岙壮烈牺牲。

虽苦犹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朱洪山热血沸腾，一心向往到延安去，渴望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共产党员竺扬等的支持帮助下，他同陈享炯、王孝丰一起，启程奔赴延安。路经武汉时，他们由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介绍，改到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学习。同年12月，朱洪山在学兵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3月，八路军学兵队结业。朱洪山、邵明、金如山、傅志评等80余人，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回到浙江，在松阳县古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种工作团”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不久，朱洪山和邵明等被调到慈溪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5月，朱洪山到奉化县的壶潭，在壶潭小学任教。他以教书作掩护，负责奉西地区党的工作，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挨户访问，了解学生的家庭境况，同情农民们的疾苦。用自己微薄的薪金，为贫穷的学生代交学费；曾把一件夹袍剪下一半，给衣不蔽体的一个穷孩子御寒。当地的小学教师按规定由学生的家长轮流供给吃“派饭”，到学生家里吃饭时，他坚持不肯吃特地为他煮的大米饭，而要和学生家里的人一起吃玉米糊糠菜。他把全村的青年男女组织起来，成立夜校，教他们读书认字，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深受当地广大青年的拥戴。同时，他还担任了当地中共组织支持成立的壶潭自卫队的指导员，积极带领队员们开展宣传抗日的活动和锄奸斗争。在此期间，他和周梦生一起，在当地发展了十多名共产党员，并介绍不少进步青年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

1942年冬天，朱洪山奉命调到四明山，在鄞县慈溪一带工作。

1944年5月，我党为了加强慈南、古林、武陵等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工作，成立了鄞慈县办事处，由朱洪山任办事处主任。

1945年春，朱洪山根据党中央关于在根据地要掀起一个大生产运动的指示，在鄞慈地区开展了一场“二分红”运动（每个劳动力多垦种二分地的马铃薯等粮食作物）。为此，他到慈南山区向群众动员，并带头在芝岭孔岙一带开荒种地。他赤着脚，同群众一起，荷锄垦荒，挑水担肥，样样农活做在前面。有次在芝岭劳动，他正挑着粪桶，沈金和老伯伯望着他的背影，激动地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好的县长啊！

1945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向四明山区“进剿”，我后方医院被破坏，许多伤病员惨遭杀害。在极其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里，朱洪山始终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领导大家顽强地坚持对敌斗争。他同孔岙地下党员林山取得了联系，在山上用柴草搭起了“公馆”（草棚），还为“公馆”写了一首快板诗：“深山密林小公馆，金毯铺顶金条围四边。不动椅子自动桌，滑轮眠床沙发垫。长年不断自来水，烧饭做菜不冒烟。不是无聊享清福，甘为革命做神仙。”这时朱洪山还经常写日记，有次林山问他：“朱部长，你在写什么？”朱洪山说：“将来写本书，好给人民群众看看，反动派是怎样反共反人民的，我们党又是怎样领导人民作斗争的。”“什么时候出版？”“全国解放。”“什么书名？”“叫‘地下之火’好不好?”讲得大家都欢笑起来。同志们说：“同朱部长在一起虽苦犹甜。”

22、汪寿华的清廉故事

汪寿华（1901-1927），浙江诸暨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等职。1927年4月初，针对黄金荣、杜月笙等破坏工人纠察队的阴谋，领导工人进行坚决反击。4月11日，被蒋介石唆使杜月笙暗杀。

“如果牺牲了，以后的路自会有人来继续走下去的”

1917年秋，汪寿华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该校免收学杂费，而且供给半膳，这是家境贫困学生理想的学习场所。

当时有志于革命的青年，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都十分向往苏俄。1920年初，汪寿华趁寒假回乡的机会，在家乡亲友中宣传苏维埃革命，讲苏俄人民在列宁领导下，生活过得怎样好，并表示自己也要到俄国去学习。有些亲友劝他说，你在师范学校毕业后，可以到乡下来教书，一个月挣几十元钱，不愁吃穿，为什么要去俄国吃苦呢？汪寿华回答说，我一定要去，像中国现在这样的社会，靠一张文凭有什么用？他的母亲很有见识，也赞同他去苏俄。以后他真要去苏俄时，母亲特地筹措了100元银洋给他作路费。他每次假期回到家乡，总是帮助乡亲干农活，组织青年农民学文化，讲革命故事。不少青年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从1925年8月起，汪寿华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区委（又称江浙区委）委员、区委工农部主任、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上海总工会党团负责人等职。由于形势的逼迫，李立三、刘少奇相继离沪，刘华又遭敌人杀害。此时，汪寿华挑起了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的重任。敌人几次查封总工会，并到处搜捕他。他不得不时常化装成学生、小职员或绅士，改名换姓，出去活动。在这段时间里，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即使患病发高烧，也坚持工作，吃饭也无法按时。过度的操劳使他的身体渐渐衰弱下去。他的妻子赵兰花特地从乡下赶到上海去照顾他，劝他按时回家吃饭，不要劳累过度。但他总是笑嘻嘻地说：“吃饭迟点不要紧，不能因吃饭而耽误工作。”当外面风声紧张时，赵兰花十分担心。他对妻子说：“不要害怕，即使我被害，望你靠做针线过活，好好照顾母亲。千万不要哭，哭了会使反动派得志，革命群众丧气。”

1927年3月，正当上海人民欢庆工人武装起义胜利的日子里，帝国主义调集军队，炫耀武力，狂妄地叫器“决不放弃上海。”大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也向白崇禧表示：“工人手中一有枪械，闻者心寒，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这时，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蒋介石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勾结，紧张地策划反革命政变。

形势日渐紧张，上海总工会有一名财务人员是汪寿华的同乡，他对汪寿华说：“今亮（汪寿华的化名），现在形势这样紧张，我们发点财，拎几箱银洋走掉算啦！”汪寿华大怒说：“你这样是来革命的吗？你把箱子留下，马上给我滚！”此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1927年4月11日，杜月笙邀请汪寿华赴“晚宴”。不料，他一走进杜月笙住宅，就被张啸林及杜月笙手下的“四大金刚”捂住口鼻，装进麻袋，押上汽车，送到枫林桥给残酷地活埋了。牺牲时年仅26岁。

汪寿华生前曾对周围的同志说过：“革命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我们应尽力地走我们现在应走的路。如果牺牲了，以后的路自会有人来继续走下去的。”烈士牺牲后的22年中，有千千万万的后继者投入了中国革命，终于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23、雷高升的清廉故事

雷高升（1901—1932),浙江瑞安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瑞安县委书记，中共永嘉中心县委委员，浙南红军游击队支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团长、师长等职，是红十三军后期斗争的主要领导人。1932年5月在永嘉岩头不幸被敌诱捕，在温州壮烈牺牲。

“家庭重要，楠溪的革命大家庭更重要”

1931年年初，由于执行错误路线，到处组织暴动，在敌大军“围剿”之下，“西楠溪红军根据地”受到了重创，当地的革命运动也陷入了低潮。时任温州临时中心县委军委委员雷高升和书记王国桢悲愤不已，他俩认为重建西楠溪红军井非一朝一夕之事，便决定一起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5月17日，他俩到达上海后，以王国桢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

报告中，尽管他俩对过去执行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给浙南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感到十分痛心，甚至有些沮丧情绪，但是他俩对浙南革命斗争的前途仍充满信心。报告的最后部分说：“我们认为浙南革命的失败，是暂时受着挫折，”“需要我们百倍努力，更甚需要运用正确策略，经了相当组织时间，必然的会引起更扩大、更剧烈的斗争。”

1931年6月，雷高升和王国桢奉中央军委指示，肩负着重振浙南革命武装的重任返回浙南。当时雷高升的妻子还留在上海养病。为了不使妻子悬念悲伤，他瞒过妻子，秘密地潜回西楠溪。妻子发觉后，托人捎信去责备他。他回信说：“家庭重要，楠溪的革命大家庭更重要。自己既挑起了这副担子，就放不下了，既然干起来了，岂能半途而废呢。”

雷高升在近五年的戎马生涯中，身经百战，历尽艰险，人们传说他在枪林弹雨之中从未中弹受过伤，好象有天上的神仙保佑着他。其实并没有什么神仙保佑，而是他以自己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赢得了部下的拥戴和群众的支持。

雷高升个子中等，壮实，说话态度和蔼，平常爱开玩笑，和部下相处融洽。在紧张艰苦的游击生活中，总是和战士们同吃同住，餐风宿露，没有什么特殊。

雷高升很清廉，自参加革命以来，身无积蓄，妻儿一度住在上海的生活费，也是靠同志们接济的。他常年在外为人民征战，无法顾及家里。他的老家多次被敌人捣毁，养父施士绸曾被国民党当作人质，关押在南京监狱，妻儿三人经常东躲西藏，有时在荒山野岭甚至坟穴里栖身。但是，这些都没有使他的革命意志消减。

雷高升爱护部下，并极力维护部队的团结。在西楠溪创建革命武装时，部下中有些官兵是从土匪部队中争取过来的，他们对我党的政策和革命纪律了解甚少，常各行其是，不易指挥。在这情况下，雷高升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坚持耐心的说服教育，因此指挥部队打了不少胜仗。

另一方面，雷高升又对部队约束较严，深恶部下有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有一战士因偷拿群众一条裤子，被那群众当场指认属实后，他立即下令予以处决。虽然处罚苛严，但由于他自己在各方面都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所以部下也都敬服，听从他指挥，部队一直保持较强的战斗力。这也是雷部屡蹶屡起，久久不为敌人所剿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雷高升部队在温（州）台（州）边界频繁地活动，1932年1月，国民党省保安处成立“温台剿匪指挥部”，以第一三五旅旅长李杰三兼任指挥官，纠集浙保第四，五两团和当地民团约2000多人“协力兜剿”，并下令“在未肃清以前，不得擅离匪区”。同时还悬赏1000块大洋缉拿雷高升。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下，雷部的活动范围日渐缩小，最后被围困在人烟稀少且极度贫穷的少横坑一带山林中，靠食野菜野果度日。在此严重危急的情祝下，雷高升仍率部英勇地抗击敌军。

24、柔石的清廉故事

柔石（1902-1931），浙江宁海人。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左联五烈士之一，对繁荣我国的革命文艺创作，推进新文化运动和扶植新生的木刻艺术有着不朽的功绩。

勇敢而明白的斗士

青年柔石认为，一个志在匡世济国的人，必得要有渊博的学问，作为学生，则更应刻苦学习。那时，他拼命读书，弄得两眼非常近视。目下，从故居中陈列着柔石当年在校所作的部分作业簿上，还能令人强烈地感受到当年他那一丝不苟、认真学习的精神。

1927年秋，柔石应家乡亲友的邀约，返里担任宁海中学的教员。

柔石素性沉默寡言，不喜应酬，也不喜敷衍。因此，他到校之初，大家对他并不怎样满意，觉得他冷淡、孤僻、傲慢，不能跟大家打成一片。正当此时，柔石得到国民党政府要逮捕在宁海中学担任训育主任的老同学邬逸民的消息。虽然他并不了解邬逸民是中共宁海临时县委书记，但深信他是个向往进步的正人君子，就把他引到家里隐藏，使他安然脱险离开宁海。这一承担巨大风险的行动，不但消除了往日的隔膜，而且赢得了大家对他的信任和尊敬。那年寒假，学校由于资金短缺而发不出薪水，柔石向哥哥店里借了一笔钱来济急，自己却分文未取。这进一步博得了教师同仁的一致赞扬。

当时，宁海地下党为了更有利地开展秘密工作，非常关注国民党县政府中教育局长的人选。秋冬之际，党组织有心把柔石这个出身微寒、诚实厚笃，貌似埋头教育、没有党派色彩，其实却颇有革命倾向、且又同情共产党的人物，抬上去做教育局长。结果，通过发动教职员联合会集体上书并运动地方绅士作舆论上的支持，终于迫使反动政府就范。

柔石一上任，就利用职权尽量为宁海中学集资募款筹建校舍，并为使它成为一所公立学校而到处奔忙。同时，他还不顾一切阻挠，毅然对全县小学人事作一次较大的调整，“把新鲜血液注入腐败的教育里，使它蜕变、新生。”他廉洁奉公，事必躬亲，倾心为开启宁海教育事业历尽艰辛的种种故事，至令犹在家乡传为佳话。

1928年5月，在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中共宁海县委发动了著名的亭旁暴动。这次暴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土豪劣绅，但最后悲壮地失败了。反动当局发现宁海中学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就勒令解散学校，对革命师生进行血腥镇压。这时，柔石正为学校的立案从杭州回来，对暴动虽不曾预闻其事，却明白了党与宁海中学的关系。当他发现宁海中学教员、县委成员杨毅卿还逗留在城时，就不顾个人安危，将他护送到西乡岳父家暂避，并资助他返抵临海。

亭旁暴动的失败，粉碎了柔石“开展宁地文化”的理想，反动派的凶残，惊破了他教育救国的迷梦。6月2日，柔石怀着痛苦、伤感和眷恋之情离开家乡，赴沪谋生。

到沪不久，柔石经友人的引荐，终得拜会了他所景慕已久的鲁迅先生。从此，他结束了风萍浪迹的生涯，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为追求崇高的理想，不避锋镝地向前进击，成为鲁迅所说的一个“勇敢而明白的斗士”。

柔石与鲁迅、周建人两位长者日夕相处，不仅只身离乡背井、生活困顿所产生的凄凉感在胜似家人的温暖中得以消融，重要的是在于从经常的交谈、质疑中，得到了哲人智慧的启迪和革命家气魄的熏陶，明确了前进的道路。在柔石心目中，鲁迅先生简直就是他的一个慈爱的塾师，或甚至是一个慈爱的父亲，而鲁迅也是像一个父亲似地对待他的。柔石原来甘苦自守的文学创作的积极性，在经常接触鲁迅和他周围众多的文化界知名人士中得到进一步的激发与升华，他把专心从事革命文学工作视为自己“为了救人，为了社会光明，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选择的毕生为之献身的事业。

25、卢子敬的清廉故事

卢子敬（1884-1935），浙江松阳人。193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松、遂、龙游击队副总指挥，玉岩区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1935年10月被捕，22日被杀害于玉岩村。

“难忘的人”

1884年11月，卢子敬出生在松阳县玉岩区枫坪乡斗潭村的一个开明地主家庭。

子敬七岁入斗潭私塾，10岁就读于离家五华里的枫坪村小学，每天需自带中饭。他的一个同村同学，因家贫无饭可带，时常饿着肚子读书。子敬看到后，就每天将自己带的饭分给这同学吃。不料这事后来被他母亲知道了。母亲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夸他做得对，并且每天特意给他多做些饭菜，让他带去上学。此事在学校里和村民中一时传为佳话。

五四运动后，各种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潮在一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开始传播。卢子敬也开始朦胧地感觉到人类社会的这一必然发展趋势，他对学生傅高曼说：“中国将来也要走共产主义这条路。你如有钱，就办学校，搭桥修路，做些公益事业，田地、山场不要买了。”

1935年5月9日，刘英和粟裕率领的红军由闽西入浙，不久到达安岱后村宿营，受到陈凤山、陈丹山的热烈欢迎。10月，红军挺进师到达枫坪。卢子敬得到消息，立即组织人员前往迎接。一个学生劝他说：先生，民国19年你组织青帮暴动，敌人烧了你家房子，如果当时你被捕，不是坐牢就是杀头，现在你怎么还去迎接红军？”卢子敬说：“坐牢杀头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我不怕。我要迎接红军。”他牵着一匹白马，带领30多名青年学生和农民，手执红绿纸旗，步行到枫坪去迎接红军。刘英和栗裕热情亲切地接见了卢子敬、陈凤山、陈丹山等，并陪同他们共进晚餐。卢子敬等向刘、粟首长详细地介绍了当地青帮组织的斗争活动情况，主动地提出参加红军的要求。刘、粟首长当即表示热烈欢迎。

经过斗争考验，1935年6月，卢子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27日，中共玉岩区委成立，他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

卢子敬入党后，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他努力学习红军的政策，身体力行地带头执行。在打土豪、分田地、分青苗的斗争中，他们逮捕了一个土豪。这土豪家里立即送来了300块银圆、50匹布、400支梭镖、400双军鞋等物，说是送给红军；同时还私下托卢子敬的母舅转送给子敬100块银圆，想以此赎人。卢子敬秉公办事，将这些钱物悉数交公，并将这土豪交给组织上处理。由于这个土豪民愤极大，最后仍被苏维埃政权镇压。分田地、分青苗斗争开始后，许多贫苦农民喜忧参半，喜的是有田可分，忧的是怕分来的田地不牢靠。卢子敬了解这一情况后，在大会上，就带头将自己家的全部田契拿出来当众烧毁。这些他祖上传下来的田产被分掉了，他毫不惋惜。

卢子敬为人热情正直，谦恭有礼，不慕虚荣，没有领导或旧知识分子的架子。后来他兼任松遂龙三县游击副总指挥，仍是这样。他虽年过半百，平常坚持与战士同吃同住，不要特殊照顾。他关心、爱护战士胜过自己，凡是好吃的总让给伤病员吃。在百姓家宿夜时，如有空床铺，他总让给队员睡，自己睡简易的门板床。他给自己立下三条规矩：开饭时，替哨兵站岗；宿营时，亲自检查岗哨；部队开拔时，要检查群众纪律。有一次，他发现两个游击队员归还百姓东西时送错了物主，就非要等他们改送以后才放心离开村子。由于他严于律己，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办事一丝不苟，因此深得挺进师首长和同志们的尊重。他在根据地享有崇高的威望。

1935年10月19日，卢子敬在敌人的围剿中因负伤不幸被捕。10月22日下午在玉岩村油车桥头稻田里被枪杀。

刘亨云将军在1984年所写的《山高志更高》一文中，深情地回忆起当年老房东卢子敬如何想方设法为他治好腿伤的感人经过。他说：“这位知识分子（指卢子敬）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是很发人深思的。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是经常想起他，深深地怀念他。”1985年，原挺进师参谋长王蕴瑞为纪念卢子敬遇难50周年题词，他称卢子敬是“难忘的人”。

26、陈洪的清廉故事

陈洪（1906-1943），浙江浦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宁波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京沪特委代理书记、四明地委书记等职。1943年11月，在浙东抗日根据地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中牺牲。

先人后己

1906年6月23日，陈洪出生于浙江浦江县岩头陈镇的一户殷实家庭。陈洪在省立宁波第四中学上学时，由谢传茂、赵济猛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投入爱国青年学生运动。他参加演讲会，宣传进步思想，因善言能讲，富有鼓动力，人们称他为“小钢炮”。

经过“五卅”运动的锻炼，陈洪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提高。1925年8月，他转为中共党员。9月间，中共宁波支联成立，陈洪负责宣传工作。次年6月，陈洪任地委委员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开始专职从事工人运动。为了便于接触工人，他在宁波江北岸租赁了简陋住房，与赵济猛、王小曼（王嘉谟）、王鲲等在白沙一带开展地下活动，向铁路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帮助组织工会，发展党员等。

在积极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的基础上，陈洪与王小曼、王鲲等着手筹备建立宁波总工会。当时，各业工会经费不足，陈洪等几个从事工人运动的同志，就去当铺当了衣服、被褥来解决经费问题。经多方努力，1926年10月21日，在江北岸马拦河桥公开成立了宁波总工会。

1929年7月15日，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八一”行动委员会，陈洪为委员。1930年4月29日晚，沪中区委在上海英租界三友煤炭公司开会，因叛徒告密，陈洪被捕。

在狱中，敌人对陈洪威逼利诱，他不为所动。当敌人要杀害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恽代英时，陈洪、张阿昌（张炽）首先高呼：“恽代英同志精神不死！打倒国民党！”全监难友同呼响应，监狱反动当局大为震惊。为了团结全监难友同敌人作斗争，1933年，陈洪和杨泽、张阿昌在狱中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互济会”，领导各监房难友进行绝食斗争，提出反对克扣囚粮，要求改善给养，要求放风、理发、洗澡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经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交涉，陈洪等政治犯获释出狱。

1938年12月，陈洪任中共苏南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这期间，他在丹阳县延陵一带以原丹阳第二区为中心开展民运工作，日夜奔波于镇江、句容、丹阳、金坛边境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这一地区偏僻，山道崎岖，陈洪因长期的狱中生活和敌人刑罚的摧残，双腿受伤严重，组织上分配给他一头小毛驴代步，可他时常让给体弱或有病的同志骑行。

1943年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陈洪等一批干部到浙东地区工作，陈洪被任命为中共四明地委书记。面对新的斗争形势和环境，陈洪坚决贯彻执行浙东区党委的“坚持三北，开辟四明”的方针，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当时生活很艰苦，陈洪视力差，体质虚弱，他仍然与大家同甘共苦，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但他对同志却是关怀备至。一次，他到梁弄，看到朱之光因患肺结核病，身体瘦弱，便牢记在心上，过了几天，特地从外地买来四盒药品，送给朱之光治病。

1943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调兵遣将，积极部署反共战争，在天台设立“前敌指挥部”，调集2万多兵力，向浙东地区全面进攻，妄图歼灭我军。11月26日，陈洪率后方指挥部人员及武装途经姚南紫龙庙，在下岭时与顽军挺进第四纵队田岫山部遭遇。在战斗中，陈洪不幸中弹牺牲。当地群众闻讯，十分痛惜，将他的遗体入殓，就地安葬。1954年移冢于余姚烈士公墓。

27、关榕的清廉故事

关榕（1924-1946），浙江永嘉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永（嘉）、青（田）、仙（居）边区负责人。1946年12月，被敌人秘密杀害。

“国家胜于家庭”

1940年10月，关榕和姐姐关少娴为了摆脱当局对他们的监控，相约一起离开了家乡。姐弟俩就像出笼的小鸟，怀着喜悦的心情，投入到了革命大家庭中。

后来关少娴回忆那次离家出走时说：我和关榕是家里弟妹的大姐和大哥，我们都反复想过，出家容易回家难，此次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见亲人。所以，临走前我俩都留下了自己的照片，我在照片背面上写的是“我把这小照留给你们做永远的纪念！”关榕在照片背面上写的是“国家胜于家庭。”当时我俩已有了为革命献身的思想准备。

1940年冬，党组织安排关榕到郑庄小学教书。那时候，党的经费很困难，关榕靠任教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活，还要接待来联系工作的同志，时常入不敷出。他的衣着十分朴素，每天吃得也很差，营养不良，身体越来越虚弱。

春节后的一个夜晚，母亲看到忽然出现在她面前的关榕是这个样子，心疼极了，说：“榕儿！别人说你走错了路，妈知道你不会干不正当的事，我就怕你太苦，太危险了！”关榕说：“妈，不赶走日本佬，那我们要做亡国奴，得世世代代苦下去，这才真危险呢！”

关榕白天教书，夜里常常要跑很多路，到各个支部去部署工作。他不怕苦，工作起来有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头。在外黄洋村教书时，一天，他吃完晚饭后，叫陈鸣皆同他一起，先后去三个联系点开会，上岭下坡，东奔西走，一夜走了50余公里的山路，等赶回黄样村时，已有人起床来挑水做饭了。因为跑得太累太急，加上他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所以一回到村里就接连吐血。陈鸣皆很为他担心。但他自己却不把重病放在心上，也没有休息，仍坚持同往常一样，认真地给学生上课。

这时，关榕又得了痔疮，因无钱医治，更由于他常走夜路，荆棘刺，露水沾，原来浮肿的脚烂得越来越厉害，浓血常沾满了裤子。同志们劝他一定要保养身体，他却说：共产党员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要准备吃尽天下苦，走尽世上不平路。

1946年2月，县委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次定派永（嘉）青（田）仙（居）谱（云）武工队除掉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国民党乡长兼乡自卫队队长金天锡。这项任务由关榕、李振华和潘田波带领武工队执行。在战斗中，关榕的左腿负伤，不幸被俘。

金天锡抓到关榕以后，将他打得遍体鳞伤，几度昏死过去。这年3月，敌人将关榕解送到温州第四监狱。这时他的伤口已经糜烂，生了蛆，但敌人仍不给医治，想以肉体上的折磨，来消磨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顽强的斗争意志。后来，关榕被打伤的一段小腿骨竟烂断了，他强忍着剧痛，没有流过一滴泪，没有叫过一声痛。为了让家里的亲人知道敌人的残忍，牢记这个仇恨，他把这段小腿骨用旧报纸包了起来，送给探监的弟弟关策，说：“哥哥一身清白，无物相送，请收下这节白骨作纪念吧。”他还叮嘱弟弟回去不要告诉母亲，以免母亲悲伤。

敌人用遍刑具，也没有从关榕口中得到我党的任何秘密，便叫一个叛徒来劝降。这个叛徒装着关怀体贴的样子，劝诱关榕说好汉不吃眼前亏，遭到关榕的痛斥。关榕回答说：“古来只有断头的将军，没有投降的好汉。你们死了这个心吧！”敌人见关榕软硬不吃，就于1946年12月将他秘密杀害。

关榕被害时年仅22岁。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那为公忘私、为国忘家的奉献精神和铁骨铮铮的革命气节，将永远铭刻在浙江人民的心里。

三、浙江党政军领导的清廉故事

28、刘英的清廉故事

刘英（1905—1942），江西瑞金人。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7月，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委员，率部转战闽东、闽北、浙西南、浙西和皖南等地。1935年11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成立，任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1938年5月起，历任中共浙江临时省委书记、省委书记。1939年7月，在平阳主持召开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书记兼统战部长、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1941年5月任华中局委员。1942年2月8日，因叛徒出卖在温州被捕。5月18日，在永康县方岩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

“群众利益侵犯不得”

从董家坪翻过十二盘岭，便是峰文的西山村。1936年8月，刘英带着一小队红军来到这里，住在一个叫卢声招的老乡家里。

老乡当时已是79岁高龄了，胸前垂着一绺银白胡须，精气神十足。对于红军的到来，他非常热情。当天夜里，卢声招就拿出一点米粉干，招待刘英。这时，刘英的小警卫员倒是很机灵，他看到烧米面，就哗地一下跑出去，搞了4只辣椒、3根小葱来。

刘英是江西人，很喜欢辣椒、葱、蒜。可刘英只吃上几口，就眉头微蹙停住了筷子。他问旁边的警卫员：“这辣椒是老乡给我放的吗？”

“是我放的。”小警卫员得意地回答道，“我刚才特地出去给你搞来的。”

刘英一听，更加疑心了，追问说：“我们初进西山，人地生疏，群众说话你又听不懂，你是怎么弄来的？”

“是从一老乡家的园子里摘来的。”

刘英把筷子往桌上一放，脸色一沉，“你知道不知道，群众利益侵犯不得……”

小警卫员的脸“唰”地涨得绯红，不等首长说完就抢着说：“报告刘政委，我知道红军战士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因为我说话乡亲们听不懂，一时又找不到主人，我就在辣椒底下和小葱地里都放上了3个铜板。”

“是这样的吗？”刘英好像还不放心，亲自到菜园里检查，确认无误后，才回来继续吃米粉干。

卢声招开始以为刘英吃不惯米粉干，等到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后，就笑着对刘英说：“哎呀，吃点辣椒、小葱算得了啥，不必这样认真！”刘英说：“老人家，我们不是国民党的军队，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劳动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怎么好随便侵犯群众的利益呢？”

在西山村的日子，刘英每天都很忙，工作到很晚。卢声招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一天夜里，老人家烧了一碗“红糖鸡蛋冲陈酒”给他，刘英不肯，坚持让老人家自己吃。卢声招开始没有听懂刘英的话，还以为刘英怀疑他这碗酒里有问题，于是他就倒了一小杯，当着刘英的面一口喝了下去，说：“刘政委，你一天到晚都为我们大家操心，你需要滋补滋补，只要你身体好，我们大家就放心了。”刘英激动地握着老人家的手，说：“老人家，我年轻力壮，身体很好；你年纪大，体质虚，倒很需要滋补。”卢声招也不肯让步，说：“刘政委，你常说红军就是人民群众的子弟兵，今夜你连一点酒也不肯喝，这还算什么自家人呀？”两人推来推去，最后还是分着喝了。

没过几天，红军部队又要转移了。临走前，刘英亲自挨家挨户去告别，同时看看战士们住过的地方打扫干净了没有，借用的东西是否完好无损地归还了原主。在村东头的一家，刘英发现战士们原先向房东借用的5捆稻草，只归还了4捆。他就问是怎么回事。红军战士报告说：“我们刚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收拾时每捆缚多了，但总数是不少的。”刘英说：“向乡亲们借得是5捆，就要归还5捆，少了1捆要按价赔偿。”房东老太太坚决不肯接受红军的钱，说：“还我的稻草总数不少，还要赔什么钱？刘政委，你们只管放心走吧，下次再来住。”刘英说：“老妈妈，这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纪律，你不收钱，我们就不起身。”结果战士们还是把钱放在房东的桌子上才离开。

队伍开出西山村后，刘英走在最后面，频频向乡亲们挥手道别。卢声招依依不舍地拉着刘英的手，一直送到村口。他告诉刘英：“我生在前清，也见过民国，活了这么大的年纪，像你们这样纪律严明的军队，还是第一次看见哩！”

乡亲们对刘英的言行敬佩不止。

29、粟裕的清廉故事

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苏浙区党委书记。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1934年7月，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率部转战闽浙赣皖四省边界地区。1935年初至1937年秋，历任挺进师师长、闽浙边临时军区司令员、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副指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浙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1984年2月5日，在北京逝世。

“不换我就不睡”

1961年冬天，粟裕因身体不好，在上海养病。当时中国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粟裕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能写出一些有份量的报告，好使党中央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更切合实际的政策，在上海期间，他除了看病、治疗外，不是下部队，就是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调查研究。面对一幕幕困难景象，粟裕不由地再次牵挂起曾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一起战斗过的泰顺人民来。

泰顺地处浙闽两省交界处，山高岭峻，交通十分闭塞，国民党势力相对薄弱，是红军进行游击战争最理想的地方。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粟裕曾率红军挺进师在这一带打过游击，创建了以泰顺为中心的红色根据地，同泰顺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1938年3月，粟裕奉命率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主力离开浙南，前往皖南集中。粟裕人走了，但心没有走，泰顺的人民，仍在他心中，与泰顺人民共同战斗的情形也经常在他脑海闪现。此时又一次回到了南方，粟裕决定到泰顺进行详细地调查研究，以了解当地百姓的实际生活情况。

11月20日，经过长途跋涉，粟裕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萦、战斗过的故地。见到泰顺县委书记于奉图，粟裕第一句话便是：“我可回来了。”这句话道出了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对泰顺人民的深厚感情。

离开了20多年后，再次回来，粟裕内心十分激动，吃过午饭，他顾不得休息就要出去走走。天下着雨，路面泥泞，他坚持自己打伞上街，全然忘了带病之躯。解放十多年了，他看到街上和当年几乎没什么大的变化，当地老百姓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心情十分沉重。

忙碌了一天，晚上，粟裕回房休息。一进那间用办公室临时布置的卧室，他看到里面全换上了崭新的用品，桌子上铺的桌布是新的，床上被褥、枕头、毛巾、床单是新的，桌椅、板凳也全换成新的了，他明白这些是特意为他准备的，不由地眉头紧蹙。他马上把县委的同志叫来，说：“这都是为我特意准备的吧。泰顺还那么困难，怎么能给我这么特殊照顾呢？”他要求把新的床上用品和家具全都换掉。

县委的同志为难地说：“首长，您看都这么晚了，要不今晚就算了吧？”

粟裕严肃地说：“不换我就不睡！泰顺人民在战争年代为革命作出了多少贡献，他们现在生活还这么苦，我躺在这样的床上怎么能睡得着呢？心里有多不安呢！”

听到粟裕的一番话，大家赶紧撤掉了特地布置的崭新用品，全都换成了普通百姓家中的东西。粟裕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一心为民的品质深深地感动了老区人民。

30、谭震林的清廉故事

谭震林（1902—1983），湖南攸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参加了井冈山斗争，历任茶陵县委书记、县工农兵政府主席，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福建军区司令员、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一副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前后，1949年5月至1952年1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届协商委员会主席等职。1950年4月至1955年3月，任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其间：曾兼任浙江军区政治委员。1951年11月，调离浙江，到华东局工作。1954年4月，到中央工作，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逝世。

“我不是谭家祠堂的主席”

1949年4月，作为渡江战役总前委5个成员之一的谭震林，指挥中集团最先渡过长江天堑。部队以摧枯拉朽之势，一路南下，5月3日，解放了杭州。“人间天堂”获得了新生。根据中央指示，谭震林留驻浙江，成了新中国第一任坐镇蒋介石老家的最高官员。5月的杭州，阳光明媚，到处春色，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刚解放的欢乐之中。此时，有个叫谭云的人内心同样非常激动，因他得知谭震林担任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和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原来此人是谭震林的四弟，解放前被抓壮丁，在国民党部队干了十多年，并当了国民党的尉官。杭州解放时，他随部队起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是封建社会几千年来都不曾变过的官场法则。怀着对美好前景的梦想，谭云兴冲冲地跑到省委机关去找谭震林，希望他能够帮自己谋得一份好的工作做。谭震林详细了解四弟的情况后，提出让他到一家工厂当工人。可谭云不愿意，他想到公安局去当干部。谭震林听弟弟说完后，严肃地对他说：“老弟，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我这个省委书记，是为全省老百姓服务的，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你在旧军队干了那么多年，难免沾染了一些坏习气，去工厂当工人，要通过劳动好好改造自己的旧思想，当干部肯定不行，当公安干部更加不行。”谭云闷闷不乐地离开了省委大院。回去以后，他和军管会的同志闹起了情绪。军管会向谭震林作了汇报。谭震林闻言拍案而起：“无法无天，你们把他给我关起来!”最后谭云还是被安排到一家工厂当了工人，并一直工作到退休。

谭震林在浙江当大官的消息同样也在他家乡湖南攸县迅速地传播开来。分别20多年后的几个兄弟个个欣喜万分，并纷纷地与谭震林取得了联系。到了春节，谭震林的六弟谭乐春凑足了路费，满怀着希望，从老家赶到杭州看望谭震林。骨肉兄弟分离多年，见面后都非常高兴。谭震林详细询问了六弟的生活情况，谭乐春趁机提出了想在家乡开个矿，请谭震林帮忙从省政府搞点钱资助他。谭震林闻言，马上严肃地说：“乐春啊，省政府的钱是公家的，我怎么能用公家的钱来办私事呢？你现在生活有困难，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想办法克服困难，不能老想着依靠别人。”接着他耐心地对谭乐春说：“你要明白，我是浙江省人民政府的主席，不是谭家祠堂的主席。我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不能只为自己的小家、自己的兄弟。现在家乡也解放了，没有了压迫和剥削，只要勤奋做事，日子肯定会一天天好起来的。”哥哥的一番话虽然浇灭了谭乐春的发财梦想，但在谭震林的耐心说服下，他也认识到哥哥的话有道理，于是，春节过完就回了老家。回去后，他照旧在商业部门当营业员，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七弟谭德生，因路费困难，没有想要到浙江谋事，只是在1950年初给兄长去了一封求助信。谭震林及时给他回了信。在信中，谭震林写道:“希望你和全家人听从当地政府的安排，积极参加减租反霸斗争，为彻底铲除农村的封建势力而努力。”按照兄长的意思，谭德生在土改中成了积极分子，后因工作出色当了乡党委书记。

31、谭启龙的清廉故事

谭启龙（1913—2003），江西永新人。192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1942年7月起，任浙东区党委书记、三北游击司令部政委、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委、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东野战军第七兵团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政委。1949年5月至1954年8月，先后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浙江军区政委。1954年调山东工作，曾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福建省委书记。1972年至1977年，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等职。2003年1月22日，在济南逝世。

一幅山水画

1949年5月，谭启龙就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为凝聚各方力量建设新浙江，他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谭启龙没有读过多少书，参加革命前大字不识一萝筐，参加革命后，逐渐学了一些文化知识，但毕竟缺乏系统的文化和自然科学基础，在战争和建设时期，他痛感自己的不足，因此特别敬重有文化、有知识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大师，与他们交上了知心朋友，其中就包括了著名国画大师黄宾虹。

当时黄老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任教，谭启龙多次过问他在杭州的住房及生活，并亲自作出安排，他们之间慢慢地成了知心朋友。作为近现代中国画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当时全国有许多书画爱好者通过各种方式向他求画，但是谭启龙从未向他求过一幅画。黄宾虹一直心存疑虑，有一天，他对家人说：“我很想为谭启龙画一幅画，但是他从来也没管我要过画，又怕他不喜欢我的画。”之后不久，这事被谭启龙知道了。

1949年初冬的一个周末，谭启龙在西湖边散着步，不知不觉走到了灵隐附近，便顺道去看看黄宾虹这位画家朋友，同时也为打消黄老心中的疑团。一进屋就是画室，一股墨香扑面而来，大画桌上堆满了书籍、画稿，桌旁黄老先生正戴着眼镜在作画。看到谭启龙，黄老先生想停下来陪同说话，谭启龙连忙表示不必，请他继续作画，自己则站在一旁静静地观摩。黄老的山水画风格浑厚，意境深遂，谭启龙边看边由衷地赞叹起来。一幅画作完，两人才坐下来攀谈。谭启龙说：“黄老的山水画让人看着真是身临其境啊，那么多人向您求画，您一定忙不过来吧，不过说到这个您可别误会，我不是不想求画而是不愿借工作之便来向你索画，党的纪律我们都要遵守啊。”黄老听后十分敬佩谭启龙的廉洁自律，同时也为自己有个这样清廉的好朋友感到十分欣慰。待谭启龙离开后，黄宾虹不停地跟夫人感慨道：“谭启龙真是我平生一大知己啊。”

由于组织安排，1954年4月谭启龙调到山东工作。期间他们也偶尔书信联络。1955年3月，黄宾虹去世时，谭启龙在山东抓农业生产，一时走不开，便让夫人去看望黄夫人。回山东的前一天，黄夫人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面装着黄宾虹专门为谭启龙作的一幅画：《拟龚贤笔意》。黄夫人说：“老黄对谭书记非常敬仰，视谭书记为知己，他这幅画是专门为谭书记作的，一直给他留着，在病床上嘱咐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他。这可是老黄的遗愿啊，还请你务必收下。”谭夫人一时不知怎么办好，收下吧，怕回去没法向谭启龙交代，她知道爱人的原则，从不收授任何礼品，不收吧，这可是黄老先生的遗愿啊。谭夫人想了又想之后，决心还是先拿回去再作定夺吧，于是再三感谢地收下画卷，第二天就告别了黄夫人回了山东。

谭启龙看夫人带回了一幅画，责问道：“你知道我的原则，怎么能收黄老的画呢？”夫人也很委屈，便把黄夫人的话说给他听。谭启龙想想也有道理，收下画作也是了却黄老的一个心愿。可是这又违反了党的纪律，他看着画沉思了很久，最后决定还是把这幅画捐献给国家吧，像黄老这么有名望的画家的作品，也是国家的一笔财富啊，放在展览馆或者博物馆里珍藏起来，不是很好吗？

于是，这幅《拟龚贤笔意》便被送进了北京一个著名的文化艺术品收藏中心珍藏了起来，供广大书画学者和爱好者欣赏和学习。

32、江华的清廉故事

江华（1907—1999），湖南江华人。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先后任茶陵县委书记、福建省委军委常委、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苏皖纵队政委兼司令员、山东纵队二旅政治委员兼滨海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安东省工委副书记、辽东省委第二书记、辽东军区第二政委、辽东分局组织部部长兼社会部部长、安东省委书记兼安东军区政委等职。1949年9月至1951年7月任杭州市委书记、杭州市市长。1951年7月至1967年1月，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1975年1月后，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等职。1999年12月24日，在杭州逝世。

五毛钱罚款

新中国成立初期，杭州市为了把西湖建设得更加美丽，出台政策由政府出树苗派出技术员，农民出力，把树种好。产权是共有的，树枝修剪下来归农民所有，农民建房等需要用树，则向政府打报告进行审批。这样一来，农民积极性很高，自发组织了护林巡逻队，在西湖周边巡逻，防止有人偷树剪枝，破坏绿化。

1955年初春的一天，真是难得的好天气，太阳终于出来了，让人忘记了春寒料峭。这个季节梅花开得正盛，远远就能闻到一股细细的清香，沁人心脾。江华陪当时的驻苏大使刘晓在灵峰探梅参观游览，漫山遍野的开得真是好看，那白里透黄、黄里透绿的腊梅，那娇艳似火、红艳满天的红梅，那洁白如雪、白净无暇的白梅，仿佛是梅花事先知道了冬天人间的寒冷，提前送来花枝，然后再长出绿叶。

大家赏着梅花，闻着花香，一路有说有笑。这时刘晓看到地上有一枝梅花，一朵朵在枝上娇艳欲滴的，很是好看，于是捡了起来，拿在手里把玩。刚巧这个时候有一队巡护的农民经过，看到他手里拿着梅花，马上把他们围了起来。

一个长得黑瘦的农民，貌似领队的，站到刘晓的面前严厉地说道：“同志，这里不允许摘花，你违反了规定，需要罚款五毛钱，而且要作检讨。”

刘晓一下懵住了，赶紧解释：“不好意思，这花不是我摘的，是地上捡的。”可巡护的农民怎么也不信，为首的说：“这种借口已经不新鲜了，摘了花被我们发现的都这样说。”

江华看到这情形，忙过来解围，但他又不好责备巡护的农民，他们只是在按照规定保护公共财产，而且这个规定原本就是他力主制定的。现在又无法证明自己是在地上拣的而不是摘的，那就只有认罚了。

于是他对农民说：“好，好，按照规定来，我们认罚。”可是摸了半天，衣服口袋里竟然没有一分钱，才想起来当天出门时换了件衣服，忘记装钱了。不巧的是刘晓也没带钱，江华只好自亮身份，而且作了检讨。农民很尴尬地给江华道了歉，赶紧让他们走了。

江华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回到办公室后，马上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去补交了五毛钱罚款。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书记，有这些真心热爱大自然、爱岗敬业的守护人员，西湖景区历经几十年不断地种植与保护，才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漂亮的风景。

33、霍士廉的清廉故事

霍士廉（1909—1996），山西忻州人。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浙江省代省长。1949年至1952年，任省民政厅长、省政府秘书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1952年10月至1958年4月，兼任浙江大学校长、浙江行政学院院长。1952年12月至1955年1月，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1月至1965年11月，任浙江省副省长，其间：1957年11月至1958年1月，任浙江省代省长。1954年8月至1955年8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1955年8月至1965年1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1996年11月17日，在北京逝世。

省长女儿坐公车

1956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杭州城里天气突变，骤然刮起大风，下起大雨来。一辆黑色小轿车在雨中行驶，车上坐的是浙江省副省长

霍士廉的大女儿霍玲和驾驶员孙普庆。这是霍玲第一次乘坐爸爸的公车。她这年8岁，长得乖巧可爱，对轿车内的一切东西都很好奇，不停地问着孙普庆各种问题。“孙叔叔，我明天早上还能坐你的车去上学么？”小霍玲问道。孙普庆笑着回答说：“玲玲，今天是因为下大雨，丁阿姨要接你和妹妹两个人，实在是顾不过来，才打电话到保卫处让我来接你的呀！明天早上如果还下雨，孙叔叔答应开车送你上学，好么？”小霍玲开心地拍着小手说：“那太好了，谢谢孙叔叔！”孙普庆开车回到霍家后，得知霍士廉还在参加会议，也就没有说起这件事。

第二天早上，天还下着小雨，霍玲背上书包拿起雨伞去上学。丁阿姨出于对孩子的关心，问孙普庆今天去省府大楼上班时，可不可以把霍玲带上。这话正好让刚走出门的霍士廉听到了。他马上严肃地对丁阿姨说：“上班也不能带，这是工作用车。”他又回过头来问孙普庆，昨天是不是他去接霍玲的。这时省委保卫处长刘邦俊正好在场，听到霍士廉批评驾驶员，发了脾气，急忙上前解释说：“霍省长，是这样的，昨天下午雨太大，是阿姨打电话给保卫处办公室，我叫人告诉孙普庆同志的，要批评，就批评我好了。”霍士廉说：“这不是批评不批评的问题。”他用手指着汽车说：“这是工作用车，刮风下雨，你们把霍玲接回家，学校里还有那么多的孩子怎么办，会对其他孩子的家长造成什么影响。已经有人反映说有的领导干部用公车接送孩子，影响很坏。此风不能长，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殊化，建议办公厅呼吁一下，予以制止。这样做对孩子的培养教育也很不利，一点风雨都经受不了，怎么还能培养她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呢？”霍士廉蹲下身子，把霍玲背着的书包带整理好，对她说：“玲玲，你是个乖孩子，是爸爸的好女儿。以后你跟着丁阿姨走路去上学，好不好？我的玲玲不是‘娇小姐’，是不是？”霍玲很乖巧地点点头，回答道：“嗯，我不是‘娇小姐’，以后不做爸爸的车了，我要自己走路去上学。”霍士廉开心地搂住女儿的小脸亲了一下，笑着说道：“这才是爸爸的好女儿！”

霍士廉对自己的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一直严格要求，从来不搞特殊化。他的妻子平时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他的3个女儿学习、工作都是靠自己努力奋斗成为各自领域的行家里手，从没有因父亲的关系受到过特殊照顾。

34、周建人的清廉故事

周建人（1888—1984），浙江绍兴人。194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浙江省省长。1932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筹备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45年12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1月至1955年1月，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8年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浙江省省长，其间：1958年3月起，任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曾兼任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院长。1968年3月至1977年12月，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其间：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1975年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84年7月29日，在北京病逝。

走马上任当省长

1958年1月，已至古稀之年的周建人调任浙江省省长。

新中国成立后，周建人一直在北京工作，所以他回到家乡出任省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搬家，把家搬到杭州。按照规定，他并非一定要这么做，完全可以在北京留一套房子，工作在一地，家在另一地，两地行走。但周建人执意要搬，否则他心里不安，认为这是占了公家的便宜。于是，他坚决退掉了北京新皮库胡同的住处，把家搬到了杭州北山街一号省委大楼一号楼内。

同时，周建人还执意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让夫人王蕴如辞职，随他前往杭州。其时，王蕴如在高教部工作，不辞职，随丈夫一起到杭州照顾他的起居，也是符合当时政策的。退一万步讲，即使政策不允，稍稍变通，或调转一下夫人的工作也是可行的，完全没必要辞职。但周建人仍然力主让夫人辞职。结果，王蕴如从此便失去了公职，成了一个家庭妇女，没有任何待遇，连退休金也没有。1984年周建人去世后，根据国家规定，王蕴如仅仅拿到每月100元的补助，聊补生活之需。

然而周建人夫妇毕竟年事已高，为方便照顾父母，周建人的大女儿周晔来到父母身边，照料二老生活。为了女儿周晔的工作问题，周建人特地写信给他的好友，著名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柯灵，请他帮忙介绍工作。柯灵收到信后，简直惊呆了，没想到堂堂一个省长，竟求助于自己。他回信说：“我无职无权，怎么能有办法解决周晔的工作，你是省长，怎么还要我帮忙？”显然，不是周建人没有能力解决，而是他不愿意，不愿意权为己用，不愿意假公济私或以权谋私。最后还是周晔自己努力调到浙江做了一个杂志的编辑。

周建人以学者入仕，而不改书生本色，他用自己的行动，在严于律己方面做出了表率。

35、铁瑛的清廉故事

铁瑛（1916—2009），河南南乐人。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60年至1977年，任舟嵊要塞区政治委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省委第一书记）兼舟嵊要塞区第一政治委员、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等职。1977年2月至1983年3月，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其间：曾任浙江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7年2月至1979年12月，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浙江省政协主席，1979年12月至1983年4月，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3年12月至1988年12月，任中共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2009年2月6日，在杭州逝世。

不一样的爸爸

“您与别人一样，一生与权为伴。但不一样的是，您年轻不唯权、不畏权，壮年不谋权、不权谋，年长不专权、不恋权，离休不扰权、不弃权。您与别人一样，关爱子女、亲友和部下。但不一样的是，您关爱的方式总是循循善诱地启发他们热爱事业和家庭，帮助他们去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这是铁瑛的子女们对他们不一样的爸爸的一个评价。

1979年底，铁瑛女儿铁滨的丈夫张海洋从安徽省军区来杭探亲休假。一天下午，母亲苏佩兰对他说：“海洋，舟嵊要塞区有人来杭开会，把你爸爸部队发的棉衣裤和棉被带来了（当时铁瑛的供给关系仍在部队），晚上宁波来的火车到城站，你到出口处去接一下吧。”

一旁的铁滨听到了，就说：“今天天气不好，外面还下着雨雪呢，是不是派辆车去啊？”谁知苏佩兰却说：“这是我们私人的东西，你乘公交车去扛一下就行啦。”

于是张海洋最后还是挤公交车去接回了一大包衣被。由于公交站台与家有一段距离，张海洋下车后冒着雨雪，扛着大包小包走了很长时间才回到了家。

后来有一天，一家人都在一起时，张海洋顺口说起了这件事：“我当时脑子里有两种想法：一是有点自豪，省委书记家就该这样；二是有点泄气，一个省委书记家，这么多东西，连个车都不派，还不如我在合肥警备区当个小科长，我要是给机关小车排说说，起码也能派辆吉普吧！”

这时有人调侃道：“可惜白费了海洋一番孝心，爸肯定不知道这暖和的棉衣棉被是女婿顶风冒雪一路扛回来的，哈哈！”

张海洋也乐了：“肯定不能让爸知道啊，因为在咱们家，早已形成了规矩：以权谋私的事儿，别找咱爸！”张海洋深深地体会到了不一样的爸爸。

1996年，铁滨和张海洋的儿子大学毕业，想进省商检局工作。这事被铁瑛的秘书知道了，秘书出于好意，向张海洋支招：“海洋，你们可以找找首长嘛，商检局局长他熟悉的。”

张海洋了解自己的爸爸，就说：“家庭、个人的事，我们从来不找他，别弄得老人家不高兴。”

秘书想了想，然后说：“你不好说我替你说，不过你最好也在场。”

没过几天，张海洋接到秘书电话，便急忙赶到铁瑛房间。秘书说：“首长，海洋有个事跟你说说。孩子大学毕业了，想到商检局去……”

铁瑛听着听着，脸色就拉下来了。张海洋一看，顿时心里七上八下。果然，只见铁瑛听完后马上质疑：“这样的事，叫我去说不好吧？不要为难人家。工作不要挑挑拣拣的，艰苦的地方更能锻炼人。”

事情最终也没办成，张海洋虽然心里有一点埋怨，但是他还是理解的：严，才是真正的爱。他深知自己有个不一样的爸爸。

36、李丰平的清廉故事

李丰平（1912—2008），四川铜梁(今属重庆市)人。1931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浙江省省长。1933年6月至1937年11月，被捕入狱。1938年至1946年，历任皖鄂边区省委书记、新四军七师除奸部部长等职。1946年至1949年，历任山东省公安局副局长、鲁中南区党委社会部部长等职。1949年5月至1955年8月，历任中共浙江省委社会部部长、杭州市军管会公安部部长、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浙江省检察署检察长、浙江省政法委员会主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1955年1月至1963年7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副省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1962年2月至1965年12月，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1965年11月，调回浙江，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务书记。1978年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省委第一书记）。1979年12月至1983年4月，任浙江省省长。1983年4月至1987年12月，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8年3月28日，在杭州逝世。

“无情”的父亲

“你爸爸普通，你更普通，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孩子有什么特殊可闹！” 李丰平经常这样教育自己的子女。

1980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北山街84号院内，时任省长李丰平的家里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告诉我一声！”李丰平生气地看着女儿，他刚听说女儿要将工作调回浙江的事。

“爸，我知道您会不高兴，所以才瞒着您，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女儿感到很无辜。

“还不算什么大事，你在安徽工作，一下子调到杭州，关键你还是通过关系调过来的，这不符合原则。”李丰平目光严厉，语气坚定。

“我在安徽的出版社工作这么多年，现在要调进的也是出版社，系统内部调动，这不也是很正常的吗？再说，您年龄慢慢也大了，这样也方便我们更好地照顾您。”李丰平1962年时到安徽任职，女儿也在安徽工作扎根，1965年李丰平调回浙江工作，女儿并未随调，一直留在安徽。

女儿说的也是人之常情，但李丰平仍坚持己见：“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正是知青和一些下放到三线的工人返城的时候，如果你调回来，我还怎么做别人的工作？要顾全大局。”

女儿感到特别的无奈：“可我把在安徽的家具都处理了，调令都下了啊！”

“那也不行，你赶紧给我回安徽，老实呆着，这是原则问题。”

谈到原则，女儿的情绪变得更加激动，她对着旁边的母亲发起牢骚：“因为原则，我们就该过这样的日子吗？我十岁才穿鞋子，刚到杭州的时候，穿着鞋子走在马路上很不舒服，头上还生疥疮，头发都很少，爸爸管过我们多少呢？读书后，我们开学时都是叫三轮车拉着行李和用品，爸爸的车我们从不敢想。现在长大了，他对我们还是这么苛刻!”

“你爸爸这人啊，就是这么‘固执’，和别人不同。你就回安徽吧，调动的事以后再说。”母亲安慰女儿说。

对父亲的“固执”，女儿毫无办法，只好重回安徽，后来等了多年才随丈夫工作的调动回到浙江工作。

李丰平原则性极强，他家对子女有约法三章：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做外国人。

“要把自己的位子摆好，千万不要摆架子，不要有干部子女的优越感。”李丰平就是这样要求子女的，他就是这样一位“无情”的父亲。

37、王芳的清廉故事

王芳（1920—2009），山东新泰人。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49年5月至1955年4月，任杭州市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等职。1955年4月至1965年8月，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1964年9月至1966年，任浙江省副省长，其间：1965年8月，任中共温州地委代理书记。1977年，任中共宁波地委书记、中共宁波市委第一书记等职。1977年10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1977年12月至1983年4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兼省委政法委书记、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83年3月至1987年3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此后曾任公安部长、国务委员。2009年11月4日，在杭州逝世。

不讲排场的书记

1985年1月的一个上午，浙南的青田县政府大楼匆匆走出一干人。

“书记，刚开过会比较辛苦，吃过午饭再走吧！”送行的人说。

“不了，天还早，尽快赶路吧！还有很多地方要走。”带头的长者高高的个子，灰色衣装，系条浅色围巾。他就是省委书记王芳，正在带领省委和交通部门的同志勘察金温铁路的建设事务，在此之前他们已经马不停蹄地考察了十多天。

上车前，王芳对青田的同志说：“群众修建铁路的心情非常迫切，刚才开会时有侨眷表示愿意集资修铁路，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群众往往先想到了，大家要多下去走走啊！”

正当道别时，一声汽笛响起，大家的注意力不由地转到了大门口，一辆黑色轿车驶入大门，车上走下两位中年男子。

“这不是温州市委的同志吗？”考察组中有位同志认出了来者。

“书记您好，听说您今天到温州，我们过来接您。”他们热情地跟王芳打招呼。

他们本以为王芳会很高兴，没想到，王芳脸色一沉，现场气氛顿时变得尴尬起来。站在陪伴了大家十多天的面包车前，王芳说：“你们平时都是这样做接待工作的吗？我下基层搞调查，历来不允许沿途迎送。就是你们这种不良风气助长了有些干部讲究排场的虚荣心，败坏了我们党的声誉。”

温州的同志没想到书记会发这么大火，连忙解释说：“我们听说省委已将修建铁路列入议事日程，书记亲自带队考察，都很兴奋，在家坐不住，就过来了。同时也想跟大家一起勘察金温铁路，了解下兄弟单位的情况，以便为修建铁路早做准备。”

王芳的火气稍微缓和了些：“出行一定不要搞特殊化，要多从群众角度着想。你们知道毛主席是怎么做的吗？他来浙江时，我给他做警卫，他都是要求轻车简从，不鸣警笛，不闪警灯，不张扬，不扰民。那时毛主席对省里领导人的要求是：不接不送，不叫不到。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干部，出行时前呼后拥，车队浩荡，甚至还要警车开道，这种官僚主义作风拉远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

不论考察人员还是温州的同志都认真聆听、思考着王芳的话。他接着对温州同志说：“今天的事也不怪你们，你们从为民服务的角度出发是对的。我刚才讲的以群众为本、不要扰民的道理就记在心里，作为勉励吧。”

“我们记住了，在以后工作中一定会时常提醒自己的。”

王芳这才把手一挥，“大家出发”，小轿车与面包车一前一后向温州方向奔去。

四、浙江时代先锋的清廉故事

38、陈幸均的清廉故事

陈幸均（1929—2018），浙江浦江人。195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省政协台州地区工委主任。历任兰溪县委副书记、县长，永康县委书记，台州地委副书记等职。在对待权利的问题上，他的回答是:“职权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只能用它来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工作，而决不能用它来谋私利，搞特权。”平素，他确确实实也是这样做的。

不谋私利，不搞特权

陈幸均在担任兰溪县委副书记期间，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干部，与大家一样在食堂吃饭。由于工作较忙，他经常迟到，食堂没得吃，就买点面条自己在煤油炉上烧烧，从未想到要食堂替他留菜留饭；他的卧室兼办公室，只有十几平方，领导和同志们考虑到他的家属有时要来，经常还要接待来访的干部群众，曾经劝他搬进新宿舍，被他谢绝了。

下乡下厂，只要有公共汽车好乘，不管路远路近，在不是紧急的情况下，他都不要派小车子接送。有时，头天办公室同志知道他第二天要下乡，把车子给安排好了，那知翌日一清早，他却买了车票乘上公共汽车走掉了。

在他分管工业期间，下厂劳动，他就和工人们一起在食堂排队买菜买饭，有时还和工人们一样上夜班，一起乘厂车。工厂里有许多试用品和处理品，吃的、穿的、用的样样有，可陈幸均从来不沾边。化工厂的同志想替他在厂里买几块，他一口回绝；提出将厂里新出产的香皂请他试用，他又连连摇手。为这事，化工厂老金向他提开了意见:“你明明肥皂不够用，为啥老是不肯要?你是管工业的书记，新产品请你试用一下又有啥关系?”而陈幸均却笑笑说:“不管你怎么说，这个‘门’我就是不能开。如果这里放宽一点，那里也放宽一点，发展下去就没有底了。我抱定一个宗旨:公家的便宜我决不去沾!”事后，老金讲起这件事，十分感慨地说:“老陈在这方面可算是过得硬了，真难得啊!”

凡是和陈幸均交往较多的同志，差不多都知道他有个脾气:从来不吃请。梅江区委书记老胡，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去年，有一次陈幸均来到了梅江区，到吃饭的时候，老胡看看食堂实在没啥菜，就临时叫炊事员炒了两个菜，自己又去买了点酒。可万万没有想到，吃饭时，陈幸均一看台子上有现炒的菜，横竖不肯吃。老胡说，这是很平常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菜，这两样都是食堂里的。陈幸均却指着一盆豆腐炒笋片说:“这一盆呢?”老胡说，这也不是公家的，我们出钱有啥关系呢!他说:“那也不行，你为我搞特殊!”那个认真啊，老胡真拿他没办法。结果，他就是不肯吃那盆炒豆腐，酒也不喝。打那以后，老胡才算彻底认识他了。以后陈幸均再到梅江去，大家再也不敢为他多搞一个菜，食堂有啥就吃啥。

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星期天，没有上下班时间。紧张的工作，过份的疲劳，使他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1978年7月，他去灵洞公社检查工作，忽然眼睛看不见了，人从田塍上冲到了田里。干部、群众望着他那瘦弱的身体，凹陷下去的眼睛，一股强烈的情感油然而生:“陈幸均同志完全是靠一种精神支撑着的啊!”

39、王家恒的清廉故事

王家恒（1918—），浙江岱山人。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舟山地区行署副专员。早年参加革命，历任定海法院院长、省文化局新闻出版处处长、舟山县副县长等职。他常说:“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生活上不能过分讲究，相反，倒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正是他日常工作、生活的特色。

革命者的本色

舟山一解放，王家恒就担任定海县副县长。那时，有的老战友劝他把爱人接到城里来享享福。王家恒反问说:“丈夫当官，妻子进城享福，这不是搞夫贵妻荣吗?共产党可不兴这一套。”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诬陷为“叛徒”，折磨得生活不能自理时，老伴才来到他身旁照料。

至于对孩子的工作、生活，王家恒更是严格要求，不许他们凭借自己的地位搞特殊。有一回，他发现小儿子到浴室去洗澡，买二等票洗了头等的浴室。老王问怎么进去的，小儿子说:收票叔叔认识我。王家恒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小儿子“训”了一顿。接着，又亲自把票钱如数送到收票的同志手里，并说:“我家的孩子以后不要给他特殊照顾。”孩子们长大了，在处理婚姻问题时，王家恒再三告诫他们:不要搞门当户对，也不要考虑自己的门第，要紧的是姑娘的人品要好。在王家恒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儿子们也没有那种干部子弟的特殊感，优越感。两个儿媳妇都是普通工人的女儿。

他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群众打成一片。有年夏天，王家恒头顶烈日，步行到普陀县芦花公社检查生产。吃饭时，公社干部炒来了一盘肉丝、一盘黄鳝丝。菜端来了，王家恒却不见了，原来，他到公社食堂排队买了一碗青菜吃上了。而那两盘菜，他让大家“报销”掉后，自己悄悄地付了钱。

有年夏天，舟山水产食品厂给他和机关的同志送来二十个样品罐头，请他们品品味。王家恒说:“好不好，还是由群众自己来品尝，自己来鉴定。”他立即指派专人把罐头退了回去。

在三年困难时期，发给他的各种优待票，他从没去领过。食堂会计见他身体不好，工作又劳累，给他送来了购买食品优待票，他说:“越是困难的时候，领导干部越要带头吃苦。”他要会计把这些票子交给食堂。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口粮压减到每月二十斤，把节省下来的存在会计那里，哪个同志不够吃，就可到会计那里去拿。怪不得同志们说:“王副专员给我们上艰苦创业的党课，我们最爱听。”

王家恒平时生活十分俭朴，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但是当他知道哪个干部群众生活上有了困难，总是解囊相助。他在接待人民来信来访和下乡调查时，遇到哪位社员生病了，钱不够花；哪个基层干部家里吃口多，经济有困难，他都记到笔记本上。每当发薪水，他就把这些困难户的地址交给收发员，代为寄一些钱。岱西农村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婆婆，丈夫、儿子都已去世，王家恒就经常给她寄钱，直到老人去世。

40、郑海啸的清廉故事

郑海啸（1900—1987），浙江[平阳](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3%E9%98%B3)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历任平阳县委书记、温州专员公署专员等职。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他的妻子金澄梅、女儿[郑明德](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91%E6%98%8E%E5%BE%B7)、胞弟郑志荫先后牺牲，房子被烧，祖坟被挖。有着光荣的过去的郑海啸，解放以后依然永葆革命的青春。

丹心红似火

1955年夏，郑海啸得悉小女儿考取了西安冶金学院，有关领导为了照顾他，建议改录浙江大学。他谢绝了好意，说:“干部子女应该带头服从分配。”后来，他的小女儿大学毕业分配时，学校决定把她分配到北京，省有关部门准备派人去联系，要求把她分配到杭州。郑海啸坚决拒绝。就这样，他的小女儿由国家进行了统一分配。

1955年底，郑海啸接到平阳县委的一封信，寄来了毛主席签发的郑明德烈士证书，并告知政府要发给他一笔抚恤金。郑海啸抚摸着证书，百感交集。他凝视着“毛泽东”三个苍劲有力的字，感到莫大的鼓舞和欣慰，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当晚，他彻夜难眠，第二天，他提笔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我承党和政府的关怀，发给我抚恤金。现在我们国家还贫穷，我决定把这笔抚恤金献给平阳县，作为发展生产的资金，并以此来纪念明德。”

郑海啸每当想起明德和其他革命烈士时，总是告诫自己:要对得起烈士在天之英灵。他给自己规定，工作要高要求，生活要低标准。他不顾年岁大，坚持下乡，到基层了解情况，解决问题。郑海啸离休后，经常有战友或战友的亲属来找他，托他想个办法“走后门”，帮助调动个工作。对这种不正之风，郑海啸坚持说服教育。有一次，一位战友远道来到他这里发牢骚:“当年我冒着生命危险为武工队带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现在我要给儿子找个工作，区里就是不肯解决。”他要求郑海啸同区里打个招呼，给予解决。郑海啸和他尽管过去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但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卖情面，就严肃地对这位战友说:“你过去为人民做过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但是，你不能躺在功劳簿上闹特殊。你儿子的工作问题，要按政策办，由当地组织来安排。”一席诚恳的交谈，使这位战友认识到自己的想法错了。

至于郑海啸生活的简朴，这是好多人所知道的。他对于国家的资财也从未“慷慨”过一次。早在他当省民政厅副厅长时，按理上下班可以坐轿车，但他不坐。从家里到机关四、五站路，他坚持步行或坐公共汽车，风雨无阻。1981年春节，他住在医院里，儿子、媳妇要他回家吃年夜饭。他想，为了吃餐年夜饭，要让公家的轿车跑一趟，多浪费。再说，我舒舒服服过年夜，那驾驶员就过不舒服了。结果，他没有回去。有年国庆节，郑海啸作为老干部代表赴京观礼。由于他年事已高，由孙子陪同照顾。他孙子听有关部门说，自己的旅差费也可以报销，回杭后，就要爷爷去报销。郑海啸严肃地对孙子说:“你是陪我去的，应当我们自己掏腰包。人人都要为国家着想啊!”

41、陈继文的清廉故事

陈继文，原“杭一棉”女工，某军军长杨石毅的妻子、云南边防某部副连长杨少华的母亲。她没有官衔高位，也没有赫然战功，但是她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子女，在平凡的生活中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正气!

军长妻子的胸怀

杨石毅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模范家庭。作为军长，杨石毅在部队精简整编中对个人进退去留表现出的坦荡胸怀，受到中央军委负责人的热情赞扬。其子杨少华在老山防御作战中，沉着坚定，指挥果断，曾率领一个排的指战员坚守老山最前沿的“李海欣高地”，击退了越军两个营加一个特工连的反扑，歼敌三百五十余人，荣立了战功。如今，在这个英雄榜上，又添上了陈继文的名字。在杨石毅、杨少华的闪光事迹中，有她特殊的影响和贡献。

1984年初春的一天，少华调动工作，四名战士把少华的一些生活用品送回家里。这一切，正好被杨石毅看到了。军长勃然大怒，指着儿子吼道:“你这官不大，架子倒不小，为什么不能自己扛?”把少华训得“委屈”地跑进房间。他想，妈妈会替我说话的。可他没有料到，妈妈陈继文踏进家门，投来的却是严峻的目光：“爸爸的批评是对的，你应该去承认错误。”随即到厨房做了可口的饭菜，端到他的床头。少华捧着热菜热饭，想起妈妈平时的一再叮咛，不禁热泪盈眶，悔恨交加。

陈继文共有五个孩子。为了防止他们滋长“高干子女”的优越感，她十分注意培养孩子独立生活能力和艰苦朴素作风。还在少华刚懂事的时候，陈继文就把家里的保姆辞退了，让孩子们自己管理自己。她根据每个孩子的年龄大小规定每天的劳动内容，如买菜、烧饭、拖地板、整理室内卫生等等。谁病了，弟兄姐妹相互陪伴着去医院。平时谁与别家的孩子争吵，不论谁对谁错，先要检查自己的过失。孩子入学或者参加工作，陈继文都要再三叮咛:“你们都是普通孩子，千万不能利用爸爸的地位搞特殊。”

孩子们跨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陈继文对子女的教育又添了新的内容——摒弃世俗观念，正确对待恋爱婚姻。 她有个儿子与一个纺织女工相爱了。姑娘的爸爸在杭州市郊工作，母亲是位普通的纺织工人。她邀请姑娘的父母到她家来玩，接连几次，他们都借故不来。会不会是怕军长架子大，家里“门槛高”?他们的这种想法得到证实后，陈继文趁丈夫休假的机会，一起到姑娘家，探望未来的亲家，春节还请他们来家里聚餐。陈继文夫妇的平易近人的态度打消了姑娘父母的顾虑。

1984年秋天，在部队医院当卫生兵的少茵复员回了家。这个文静秀气的姑娘身上，丝毫没有娇骄二气。入伍不久，她入了党，当了护理班长。按少茵的表现，提干完全够格，可这位军长一直阻止他的部下这样做。少茵在部队当了八年兵回到了老家。孩子们埋怨母亲不关心子女的事，性格温和的陈继文发“火”了。她严肃地告诉子女:“这种风就是不能吹，以前不吹，今后也坚决不吹。妈妈决不干给党抹黑的事!”孩子们听了个个低头不语。

他们深知妈妈的耿直脾气。陈继文1958年调进“杭一棉”工作以来，当过挡车工、试验工、工段长、调度员，直到1985年5月退休前还是车间的统计员。她一直象一个普通工人那样生活、工作。

42、虞仁昌的清廉故事

虞仁昌（1928-），浙江东阳人。1949年5月参军，195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荣立过战功，是雷锋生前的连长。

雷锋精神的传人

在浙江省东阳市，有一位老人，40多年如一日，宣传雷锋精神，实践雷锋精神，被誉为“雷锋精神的传人”，他的名字叫虞仁昌。

55年前，虞仁昌是雷锋的连长；55年后，虞仁昌被人们誉为活着的“雷锋”。

虞仁昌转业回东阳之日，正是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之时。当地人武部的同志从他档案中获知虞仁昌就是雷锋的连长，当即请他为人武干部和全县民兵骨干介绍雷锋事迹。从这一天开始，虞仁昌就把宣传雷锋精神，作为自己转业后的一个神圣使命。尽管50多年来，“学雷锋”几经风雨，雷锋的形象也在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中被歪曲，但虞仁昌却认定“雷锋是我们的好榜样”，顶着逆风宣传雷锋。

虞仁昌满腔热忱地宣传雷锋精神，更是脚踏实地实践雷锋精神。

1963年，虞仁昌转业到了东阳。凭着1949年入伍、爱人1959年随军的条件，转业后，爱人可在县城安排一个正式工。可他，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正逢困难时期，应该像雷锋那样，尽力为国家分忧。他动员妻子去老家东阳李宅务农，而自己，则主动要求到与李宅相距80多公里的大盘山区工作。

“我们结婚后刚团聚没几年，回到老家还要分居？”妻子有点不快。虞仁昌耐心地对爱人说：“艰苦的地方总得有人去。不管谁去，都会有困难。我是雷锋的连长，要多想着别人。”

虞仁昌没有把“雷锋的连长”当金字招牌，去为自己找好“位子”，而是把“雷锋的连长”当戒尺，时时刻刻鞭策自己，努力为党和人民多作奉献。

虞仁昌来到大盘山区当供销社主任，这里交通不便，到村村寨寨，找个车、马、骡的道儿都没有。他是这个山区供销社的头，带头挑货郎担走村串户，大山深处留下他无数的足迹，洒下他无数的汗水。这挑夫的活儿他一干就是17个年头。

虞仁昌立足本职学雷锋，无论是担任供销社主任，还是运输公司党支部书记，没动用自己的权力办一点私事。一天下班，他发现家里铺上多了两只新枕头，妻子告诉他是一个陌生的男人送来的，丢下就匆匆走了。虞仁昌立即意识到这不好，来人总是有求于自己的。支部会上，厂干部会上，他把这件事给抖了出来，希望大家帮他找到“货主”。有人劝道：“老虞，别太死心眼了，你就收下吧！我们只听过‘失物招领’，那有你这个‘送物招领’的？” 但虞仁昌不依不挠，最后还是找到了送枕头的人，并归还了枕头。

1988年8月，离休后的虞仁昌，“退出一线，又上前线”——他全力去宣传雷锋精神，去尽“雷锋连长”的义务。一些熟人去看望他，常常会扑空——虞仁昌不是下乡去讲雷锋事迹，就是到武警东阳市中队去找战士谈心。

有一天，一位刚到东阳工作的同志到虞仁昌家里探望，也扑了空。老虞的儿子说，爸爸又到部队宣传雷锋去了。这位同志原本是想通过老虞解决个人住房和孩子工作问题的，此刻，他站在老虞房里，羞愧难言。他没想到，这位1949年5月入伍、曾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修建成渝公路、川藏公路的老同志，住的是小套房子，房间里至今还没有冰箱、彩电、洗衣机这类家用电器。

“你家经济拮据？”他问道。

“爸爸把余钱都用来为别人办好事了。他心里，就像雷锋一样，只记着别人，从不为自己、为家里考虑……我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天天讲雷锋，样样对照雷锋……”老虞儿子滔滔不绝地讲着，那位来人哪里还想再托老虞为自己办私事呢！他感叹说：“老虞可真是雷锋的传人哟！”

43、袁掌铨的清廉故事

袁掌铨（1936－2015），浙江新昌人。196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海军潜艇22支队班长、助理员，临海县公安局副局长，三门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长，台州检察分院党组成员，台州地区监察局副局长、局长，中共台州市纪委常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2015年2月13日逝世。

群众信赖的检察长

“袁检察长，我们信得过你。你一定要为我们想想办法啊！”几位经济财产受到严重损失的水产养殖户，含泪请求。

袁掌铨刚把他们送走，头岙乡一位村民又跨进门，在反映了本村一位护林员被打的情况后，恳切陈词：“我们村里人都晓得你刚正耿直，一定要你来管这案子。”

袁掌铨这位检察官，何以能得到人民群众如此信赖和钦敬？凭的就是那副铮铮硬骨，那身堂堂正气！

1989年3月30日傍晚，袁掌铨正在办公室和经济罪案举报中心的同志一起研究关于深入开展反贪肃贿斗争的文件。此门，三门县财税局的一位干部走了进来，他掩好办公室的门，试探地问道：“我手头有一个大案线索，可能要牵涉到有的领导。你们敢不敢查？”

袁掌铨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敢。只要是事实！”

斩钉截铁，不容置疑。于是，一张税单号码在袁掌铨面前展现……

侦查工作连夜部署。连续战斗3个昼夜，查出了县二轻局副局长何昌心、计算机设备厂厂长章以露借用个体户银行户头挪用公款，倒卖进口高纯铝，非法牟利12.4万元的犯罪事实。

案情初露端倪。办案经验丰富的袁掌铨透过蛛丝马迹，发现此案可能涉及隐藏得更深的犯罪分子。于是他迅速采取措施，对何昌心、章以露实行监视居住，并亲自挂帅办案，准备顺藤摸瓜清查深挖。

岂料，侦查工作刚刚深入展开，怪事接踵而至——

匿名信一封接一封，寄到袁掌铨办公桌上：“你想干什么？当心骑虎难下……”

匿名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到袁掌铨办公室里：“你要适可而止……”

袁掌铨透过这些怪象，看到了邪恶者的怯弱和挣扎，更看到了正义的威力。最后，检察机关将该伙犯罪分子一网打尽。

袁掌铨如此硬骨铮铮惩腐恶，除了有党和人民为其撑腰、严正的法律为其壮胆以外，重要的是自身清廉。

两年前的一天清晨，一名偷支储户存款2万元的信用社干部，想自首，又生怕投案后不能得到宽大处理，带了几条大带鱼找到袁掌铨。老袁接受了他的自首，但又严肃地指出：“你既然是来投案自首，就得老老实实交代问题。而附加送礼之举，是既愚蠢又错误的，只会使我怀疑你投案的诚意。”

投案者还执迷不悟，想把带鱼放下。袁掌铨气愤地把带鱼甩在水泥马路上。

在老袁那儿碰了“钉子”的人，受他清风正气的感染，自觉为他去树“牌子”。

在三门县，有一桩8年未了的伤害纠纷案。当事人在看电影时与人斗殴，突然倒地，从此病得很重。家属非要以伤害罪告对方，找了许多部门，请了外地名医来诊断出证。拖了8年，纠纷未息。家属听闻袁掌铨“秉公办案，不枉不纵”的名声，便找到了他。

袁掌铨请示县人大后受理了此案。为了取得法律证明，他趁星期天休息，专程赴杭请法医。当事人家属在他临行前急匆匆找上门，拿出一叠钱，说：“大热天出门，又是休息日，给你补贴补贴，住得好一点。”

“这算什么？是不认得我袁掌铨头上戴的是什么吗？”当事人家属只得作罢。

最后，法医的证明这位当事人并非是受对方伤害而致病，而是早就患有“先天性小脑萎缩症”。检察机关据此作出了“非直接伤害造成”的结论。

这一下，有人认为当事人的家属肯定会大吵大闹。岂料当事人一不闹，二不吵，而是感激地接受了这个结论。袁掌铨为官清正，已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向人宣传：“要办案，找老袁，他算得上公正廉明。”

44、徐定光的清廉故事

徐定光（1954-1991），宁波鄞县人。曾任鄞县花园村党支部书记。他为改变本村落后面貌，努力发展经济，把集体的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他像焦裕禄一样，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当群众要他挑起领导全村的重担时，他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智给了集体，直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我们村里的焦裕禄”

1991年3月，全省城乡正在上映《焦裕禄》。此时，鄞县茅山乡却再现了电影中那悲壮的一幕：1500多名群众手抬花圈，臂缠黑纱，在机耕路上绵延了二三里……

这位倒下的村干部叫徐定光，是鄞县茅山乡花园村的党支部书记，年仅37岁。村民都亲昵地称他为“阿光”书记。

“阿光只当了94天的书记。他整整忙了94天！”村委会主任边说边抹着泪。

52岁的村民沈雪梅哽咽道，“阿光就是我们村里的焦裕禄啊！”她忘不了那个大年初一，徐定光夫妻俩抱着出生才4个月的胖儿子来给她拜年，她说：“阿光啊，每年初一你都给我们拜年，阿伯阿婶怎么消受得起啊。”徐定光说：“阿婶，你不要这样讲。你们没有儿女，我就是你们的儿子。儿子抱孙子来拜年，不应该吗？”

“应该、应该。”沈雪梅回忆起那年，老伴上山背毛竹伤了腰，小便出血，是阿光背起他连夜往医院里送。沈大妈眼睛湿润了。“有你这样的儿子，我两老好福气噢。”

徐定光一日三餐，大多用青菜、毛豆、豆腐乳下饭。一双皮鞋穿了10年还舍不得扔。村里的年青人都穿上三四百元一件的皮茄克，他身上穿的还是旧涤卡。节俭在村里出了名。可是，一个村民缺钱给儿子缴学费，徐定光掏出了身上仅有的20元。村民项梦娇家里失火，他又从家里拿了300元钱送去。

在徐定光家的一间小屋里，受徐定光接济的63岁的苏北老人郭泰文感慨地说：“定光书记是我们碰上的最好的人！”

徐定光心里总是装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人们永远忘不了那个救火的场面。1991年农历正月初五的夜里，村里3户人家突然起火，徐定光听到警报后，立即将抱在手中的儿子往妻子怀里一扔，转身往火场奔去。

熊熊的烈火已窜上屋顶，正借着风势迅速蔓延，眼看南边几间新屋也保不住了。徐定光喊了一声：“上去几个人断火路！”随手抓了一把锄头从屋脊跳了过去。

屋顶上，徐定光冲着烈火，挥动锄头卸瓦片。他要扒出一条隔离带，切断火路。“叭”地一声，锄头柄断了。他把半截木柄一扔，俯身就用双手扒了起来。

后来屋顶塌了。徐定光与另3位村民掉进了火堆，檐、桁和瓦片没头没脑地打在他们身上。这时徐定光想到的不是自己的伤痛，而是他人的安危。他硬是用自己的身体把伙伴们顶上屋顶，使他们脱离了危险。

大火扑灭后，徐定光忍着伤痛，为受灾户寻找临时住处，为他们筹集衣物，直到凌晨4点钟才到家。朦胧中，徐定光隐隐听到妻子的哭声。

“你怎么啦？”徐定光轻声问道。妻子说：“你总是这样不要命，跌进火堆，还要瞒我，你也要为我和孩子想想，真要出不来了，我们……”说着说着，妻子又抽泣开了。

“好啦，别哭啦。我以后当心些就是了。”徐定光轻声说道。

妻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番话说过才1个月，一场意外事故夺去了她丈夫的生命。

3月19日下午，忙碌了一天的徐定光又去田畈上帮助电工安装抽水机埠的输电线。由于电工判断上的失误，电线杆立起的瞬间，他碰到了高压线！随着一声霹雳般巨响，徐定光搂着电线杆倒下了……

一名共产党员倒下了，倒在自己平凡而神圣的岗位上。他用自己短暂的生命，谱写了一曲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英雄乐章。

45、赵伯钦的清廉故事

赵伯钦（1933-2004），浙江缙云人。1951年入伍，195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任缙云县公安局副局长。2004年1月15日因车祸死亡。赵伯钦一身正气，自觉抵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过好权力关、金钱关、人情关；视名利淡如水，看事业重如山，任劳任怨地为人民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

正气清廉四十年

“缙云有个赵伯钦，这可是个好人。”

“这人是个干公安的清官。”

“我们的老赵，几十年如一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在缙云，可以经常听到老百姓对赵伯钦这样的评价。

每年冬季，是办理“农转非”的忙碌时刻，赵伯钦总是在办公室里像车轮战似地接受来访。而这时，有更多的人登家门去拜访他。老赵原先对到家里来的人是一律不接待的，总是说“有事到办公室谈”。后来，见到有些群众大老远从乡下跑来，你休息时间或星期天在家不见也不太好，故也热情接待，但有一条，凡是手上拎礼品的，必须放下东西才能进门。来访者走时，老赵又提醒三条原则：一是把礼品带回，下次来表示欢迎；二是如硬把东西放在这里，下次不必再来找我，且派人将东西送回；三是在局里通报送礼者的尊姓大名、住址、身份。

县棉纺厂有位老管道工是生产骨干，工龄也长，家属子女一直没有户口，生活很困难，赵伯钦走访了解后便按政策上报审批。一天中午，老赵在整修房子，老工人空手登门来访，寒暄几句后走了。之后，老赵发现桌上多了一只小盒子，打开一看，是条金项链。老赵急带口信让他到办公室来，严肃批评了这种行为，并原物归还。以后，那老工人又一次来访，见老赵家门开着在装水管，便给他装了只电热淋浴器。老赵回来后，找到他问用了多少钱？他不吭声。老赵只好跑了6个商店，查明型号，通过邮局将钱如数汇还给他。

对于这类事，赵伯钦总是说：“我是共产党员，总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在缙云县城石街有一位应老师，当时已70岁，年轻时由于受错误处理，落实政策后儿子的户口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后来，他找老赵反映情况。老赵通过多次调查，终于按政策解决了他儿子的户口。1992年春节时，应老师听说赵伯钦女儿要出嫁，就送了个红包。老赵知道后，立即带上红包找到他，说：落实政策，解决户口是我的本职工作。过去没主动给你办好，累得你跑了这许多趟，我得向你道歉。而你送的这个红包我不能收。你来我家道喜，这情我领了，要谢就谢党的好政策吧。

赵伯钦身为公安局副局长，有人以为他自家的事总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其实不然。

赵伯钦一家原先在农村，但他却一年到头很少回家。仅1989年至1992年4月的1216天里，他出勤1166天，晚上经常在办公室里度过。妻子和大女儿是精简下放人员，几十年来，老赵没有向组织上提过这方面的要求。直到1985年，国家对知识分子采取优惠政策，老赵早年经组织上推荐并考试，在杭大经济系大专毕业，故按规定一家才转了户口。但大女儿由于超龄，仍留农村务农。对待小儿子招工的事，老赵也不愿出面，而让儿子自己去考。这时，有个厂长上门来说：“你儿子的事我帮你办，条件是你帮我儿子‘农转非’。”老赵一听，就回绝了：“这个忙帮不了。”

自1990年以来，由赵伯钦经手报批解决的清洁工、炊事员、残疾人员“农转非”就有27人。这些人无钱无权，生活有困难，但在赵伯钦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都得到解决，使他们分外地感受到了党的政策的温暖。

赵伯钦的故事讲不完。他的事迹像春风和春雨，滋润着缙云百姓纯朴的心。他先后被评为县、地、省、国家级的先进工作者和县优秀共产党员。

46、王彩金的清廉故事

王彩金（1948－1994），浙江淳安人。在部队，王彩金是名好战士；退伍后，他是一名好党员。他曾先后12次在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充分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7年时间里，他廉洁奉公、以身作则、艰苦奋斗，带领全村群众积极发展生产，使后进党支部成为全县先进党支部。

“让人心服口服的党支部书记”

他，名字叫王彩金，淳安县安阳乡山下村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1994年6月，就在王彩金带领乡亲们快速奔小康的时候，他为了抢救群众的生命财产，英勇牺牲，年仅47岁。

他，没有留下发人深思的豪言壮语，却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在乡亲们心中，他始终是：让人心服口服的党支部书记，我们村里的焦裕禄……

山下村原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和老大难村。1987年秋，该村党支部的11名党员联名上书乡党委，要求把1975年从部队复员后一直担任安阳乡运输队长的该村村民、党员王彩金的组织关系转到村里，并一致向乡党委推选王彩金担任山下村的党支部书记。

是年底，乡党委同意了该村的请求，并建议王彩金在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后，继续在运输队做事。王彩金认为既然大伙信任他，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当好这个书记，为此，他毅然放弃了乡运输队长的优厚待遇，回到村里担任党支部书记。

1988年以后的连续6个冬春，乡亲们在王彩金的带领下，先后浇筑起总长达3010米的水渠；在砂石纵横的荒滩上造起63亩良田；从一里多外的千岛湖库区挑来沉积的肥淤泥改造了薄田100多亩；营造了1045亩高标准的世行贷款杉木林基地，封山育林3000多亩。短短数年间，山下村的粮食总产翻了一番多，人均收入从1987年的352元增加到1993年的645元。乡亲们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

山下村变了。山变青了，人变勤了，村变富了。可王彩金的家却没有多少变化。他的家是一幢紧挨公路的三间一进泥墙房。简陋的堂前屋只有一张吃饭的桌子和一架14英寸的旧黑白电视机。彩金和妻子住在左边一间房，一张床和一只旧式大衣橱，这是主人唯一的两件像样的家具。

在整理王彩金的遗物时，大家只找到他的两本日记和两件衣服，一件米黄色的中长中山装，是王彩金外出开会、公干时才舍得穿的衣服；另一件青卡其布上衣，肩上已叠了多处补钉，袖上破了几个洞，是日常劳动穿的。捧着这两件衣服，王彩金的妻子泪流满面：“彩金他没有一件好衣裳。他想买一双皮鞋，想了十多年了。去年到县里开党代会回来后跟我说，别人看到他穿双旧解放鞋，都笑他。我说，下次到县里开会买一双皮鞋吧。5月底，大女儿淑红被招到安阳丝绸厂工作。我又对他说，彩金，等淑红上班领到工资后，先把春上买的两头小猪款90元帐还掉，再给你买双皮鞋，好吗？彩金笑了笑。可是，淑红刚上了一个礼拜的班，他就……走了……”

王彩金当了10多年的乡运输队长和7年村党支部书记，他精明能干，吃得起苦，生活俭朴。妻子朱菊兰尽管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但非常贤惠勤劳。她除了帮助彩金种田、修水利外，家中还养猪和蚕，每年的经济收入可达3000元以上。论理，这样的家庭总不至于连买皮鞋的钱都没有，还欠着债吧？王彩金到底把钱用到哪里去了呢？

“彩金把自家的钱用到为集体，为乡亲们做好事、办实事上去了。”老村长应积善说：“这些年来，彩金为村里跑项目、跑资金、跑物资，不知误了多少工，贴了多少钱。在外面为大伙办事，不仅烟酒自己掏腰包，就连差旅费也很少到村里报销。前几年，上面来人到村里办事，他知道村集体底子太薄，吃饭都带到家中去吃，从不叫村里报销。1993年供电局8个电工到村里安装变压器、架电线。我说，村里现在有点底子了，还是让村里来招待他们吧。彩金说，碰巧家里刚杀了年猪，还是让他们到我家吃饭吧！”

王彩金走了，他为民务实、清廉正气的事迹一直被山下村的群众所传颂。

47、杨东海的清廉故事

杨东海（1948－1994），浙江兰溪人。197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林业局股长、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市农经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他视农业为命根子，视农村为自己的家，视农民为亲兄弟，带领干部、群众开垦山地，种植杨梅，兴修水利，拓筑道路，最后累倒在工作岗位上，年仅47岁。逝世后，中共浙江省委作出《关于追授杨东海同志“党的好干部”荣誉称号的决定》和开展了向“党的好干部”杨东海学习的活动。

“党的好干部”

杨东海任市农经委副主任的同时，兼着农业发展基金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在农业投入资金十分紧缺的情况下，这笔每年100多万元的基金特别为乡村干部和群众所渴望。杨东海把这笔钱掂了又掂，坚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口上。凡是他支持的项目，都是农民渴盼的“及时雨”。立项上报前，他都要安排或者亲自到实地踏勘，看申请的项目实不实、值不值。资金下拨后，他还要限时验收：一个钱到底掰成几块用？因此，他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沉在乡下，人称他是市府大院里的“下乡专业户”。他在农经委为政清廉，有口皆碑。1994年，他到北京参加培训班。回来报销前，他特地把休息日去游览或在市区走亲访友的车票一剔出。同事们说：“老杨你是领导，谁会管你的车票呢？”他说：“国家让我去培训已花了很多钱，我怎么还好意思揩油呢？”在京20天，包括往返火车票等全部费用在内，他只报销了743元。

杨东海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健壮的身体，然而，病魔却在窥视他。从陈家井村挂职回来，他时常觉得心跳异常，觉得胸间有只无形的怪手在狠掐他的心窝，喘不过气来。起先，他只当是累了，后来越来越严重。

熬过一年多之后，直到1991年11月，组织上“强迫”杨东海到杭州的浙江医院住院检查。入院后，医生让他住进一病区。他一看，怎么是双人房，而且还有空调？他迟疑了半天，央求医生给他换一间收费便宜的病房。医生不解地问他是否自费住院？他解释说：“报销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我们市财政比较困难，住这么高级的病房我心里不安。再说，住差点，对我治病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吧？”他又托人辗转找到院长，一再恳求换房。

院长被感动了。在他收治的许许多多的病人中，很少见过像杨东海这样“开后门”要住差病房的。

经多方会诊，确诊杨东海患的是主动脉扩张症，在紧连心脏的血管间已鼓起了一个大得惊人的瘤状体。医生们说：这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爆炸。若想根治，唯一可行的是动手术。

杨东海有些吃惊，想不到自己病成这样。他问医生，手术后还能不能工作？医生告诉他，起码要休息一年，之后也只能做些轻便的工作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厄运，杨东海知道在自己的人生之途上要择路而行。他对妻子说：“凡奇，我才43岁，还年轻，可以拼一拼，再干点事，如果开一刀，我就在要在病床上呆着了。你看能不能再过几年动手术呢？”深知丈夫脾气的孔凡奇流泪默默地点点头。

仅住院47天后，这位“危重病人”就执拗地出院了。出院后，杨东海立即把一份《关于加快山区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交给市政府，这是他在病床上写的。从此，他再也没有请过一天病假。

1994年6月，连续的大暴雨，使兰江水位猛涨，沿岸各地堤防开始告急。在抗洪救灾的危急关头，杨东海不顾安危，主动深入抗洪第一线，连续四天三夜带领群众奋勇抗灾。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坚持工作，为兰溪农村经济的发展筹谋划策。

杨东海去世的第二天，陈家井村村民就赶去吊唁。由陈家井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署名、七易其稿写就的碑文，寄托着百姓的哀思，更刻入了他们的期望：

“……杨君律己唯严，清廉自守，关怀民瘼，志在悯农，泽及桑梓，口碑载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口碑更胜石碑，人心重于人言。

48、叶复初的清廉故事

叶复初（1932-），浙江温岭人。1965年浙江农业大学（今浙江大学）农学系作物育种专业研究生毕业，分配在浙江农业科学院从事水稻育种工作。现为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

清贫的“富翁”

64岁的叶复初孑然一身，住在中国水稻研究所一套两房一厅的宿舍里，除一台彩电外，陪伴他的是“年龄”都在30岁以上的一张床、一张饭桌、几个方凳，朴素得近乎寒酸。打开门，下面就是车水马龙的杭州体育场路，林立的商厦和豪华的酒楼。走在大街上，身着便服的叶复初就像一位刚入都市而略显笨拙的老农，与周围繁华的街境显得那样不协调。然而就是这位老人，由他主持选育的杂交水稻新品种已为国家多增产粮食近200亿公斤，创收100多亿元！

谈到钱，老叶记忆中最深刻的是30多年前他刚工作领到的第一个月的工资，一共53元钱。当时他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即使到了1996年，老叶的月收入加上各种补贴、奖金、政府津贴等，也才1000元多一点。有人给他算了一笔帐，这一辈子，老叶的总收入大概也不会超过20万元。这与他的贡献比，可谓是“沧海之一粟”。对此，老叶的回答是：“一个人的价值，是不能光凭金钱来衡量的。如果真要算帐，这多增产的粮食，大概可以让一亿人吃上一年吧！在这么多人口的中国，还有什么比吃饭更重要的事？”

正是凭藉这种信念，支撑着老叶将毕生的光阴都奉献给了我国的水稻育种事业。从浙农大研究生毕业到省农科院，到中国水稻所，整整30个年头。叶复初所失去的一切，又岂能用“金钱”两字来衡量！

1968年，已经35岁的叶复初终于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接下来的几年，是叶复初自感压力最大的时候。他担任全省杂交稻培育研究工作的负责人，省领导对此极为重视，经费也下达了，成果又不可能一下子出来，哪有时间和精力照顾自己的小家庭啊？妻子生病，他不在身边；妻子生女儿，他又不在身边……再加上妻子也有自己的事业，双方性格上的差异，5年后，备受冷落的妻子终于提出离婚的要求，心爱的女儿也由法院判给了对方。分手的时候，女方含泪道：“叶复初什么都好，就是心中没有家啊！”

这是老叶内心深处最隐秘、也是最沉重的伤痛。坐在灯光的暗处慢慢回首往事，一颗老泪渐渐滚出他的眼角……失去了常人该有的家庭温情、父女亲情，他把自己所有的感情全部倾注在杂交水稻上。

叶复初在生活上的随意也是出了名的。他一位同事的爱人说，在菜场碰到老叶，他买得最多的是咸菜。老叶说，咸菜多买点不会坏，既省时又省钱。1989年之前，老叶20多年来一直住在省农科院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有人劝他要求面积大的房子，他笑笑说：当初大数学家陈景润的房子也才6平方米，与他比，我够心满意足的了。

坐在家里，老叶把他多年来获得的奖状一张一张地整理好：这是“汕优10号”的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七五”攻关重大成果奖，这是“协优46”的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汕优6号”的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汕优85号”的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这是1994年省劳动模范的证书，这是1993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证书……抬起头，老叶自言自语道：“有时候，特别是碰到很大困难的时候，确实连自己也想不通，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到底是为了什么？想来想去，又为自己找到了答案，那就是事业两个字。搞科研，就是要有甘于清贫的精神、甘于奉献的精神。更何况探索本身就有无穷的乐趣，这是常人无法领略到的。”

一阵清香悠悠飘来，那是老叶书架上的一盆水仙。一瓢清水，居然能使它如此茁壮而又生机勃勃，它多像叶复初这类优秀科技人员的高洁品行！

49、陈金水的清廉故事

陈金水（1935-），浙江临安人。1956年从北京气象学校毕业，毕业前夕，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写下血书，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西藏去，从此，陈金水选择了一条艰苦创业的人生之路，他怀着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先后3次进藏，为西藏气象事业的发展奋斗33个春秋。1996年，陈金水同志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1997年他又荣获国家“五一”劳动奖章。

唐古拉山上的风云赤子

这是一位气象工作者的人生历程：

1956年至1981年，初进西藏，从藏南转战藏北，整整25年；

1988年至1992年，再赴雪域，苦战藏东昌都，一干5年；

1993年至1995年，三上高原，再战昌都，又是3年。

从22岁到61岁，生长于浙江水乡的陈金水，有33年工作在西藏高原，他把自己的赤子情怀献给了祖国的气象事业。

1965年9月，陈金水从藏南来到藏北唐古拉山上的安多。这是一个人的世界。要是无人路过，陈金水有时几天都说不上一句话。他常常对着风雪喊叫，对着繁星眨眼。没有鲜菜，水烧不开，饭煮不熟。面对光秃的荒山，稀疏的牧草，见不到一棵树木。冬天，难以成眠的长夜，呼出的气很快在被头上结成冰，第二天起来被褥和床板能冻在一起。陈金水说：有一天夜里，实在睡不着，头很痛，胸很闷。起来一看温度表，帐篷里的温度是零下27摄氏度。“那时，常常面临死亡的威胁。可想得更多的是，气象站刚刚工作，还有很多事要做。我死了事小，可要留下气象数据的空白，损失可就大了。无论如何不能倒下。”

唐古拉风雪漫卷，副食品奇缺，生活特别清苦。1967年秋天，陈金水的爱人刘晓云怀孕期间，特别想吃鱼。陈金水想，晓云从来不向自己讨吃讨穿，这次是第一遭，哪怕鱼价再贵，我也要买给妻子吃。可是在安多，有钱也买不到鱼。陈金水只好步行10多公里路，到河里去钓鱼。到下午4点钟左右，好不容易才钓到一条大约100克重的小鱼。陈金水将鱼拿回家烧了鱼汤，只放了点盐，刘晓云吃着感到特别有鲜味。刘晓云硬要将中间的那段鱼挟给陈金水尝，陈金水怎么也不肯吃！两个人一直将鱼推来推去。

1968年，陈金水胃病复发了，痛得他常常直不起腰，吃不下饭，连喝进去的水都要吐出来。没过多久，陈金水又得了脉管炎，有时两脚几乎不能落地。可陈金水仍坚持上班，每天一瘸一拐地去观测场测量气象数据。安多县委书记刘逸民见此情况，特地送给陈金水一副拐杖。以后很长一段日子，陈金水便拄着这副拐杖走在通往观测场的路上……

20世纪70年代，安多的副食品供应极为困难，人们甚至半年吃不到蔬菜，每天吃的是腐乳、咸菜、榨菜、罐头食品。陈金水的爱人刘晓云体弱多病，她对老陈说，很想吃点蔬菜。陈金水平时从来不向县领导提什么要求，这次万不得已，向县领导要求给刘晓云配给点蔬菜。安多县副县长周志辉了解陈金水的为人，为老陈特批一公斤青菜。刘晓云如今忆及此事还感慨万千，当时不要说吃到青菜有多高兴，就是看见绿色的新鲜蔬菜，病似乎就好了许多。

凡是到过唐古拉山的人都说，在安多，在唐古拉山，只要能坚持工作，就是一种牺牲，就是一种奉献。陈金水在这环境恶劣的“天下第一气象站”，一干就是16年！

1979年元月，陈金水和妻子回内地休假。这是他进藏23年3次回乡探亲中的一次。谁想西藏自治区气象局的电报接踵而至，催他返藏。陈金水二话没说日夜兼程赶回拉萨，接受了“青藏高原气象科学考察”赴双湖无人区考察的任务，并担任科考队党支部书记。

作为科技工作者，陈金水没有显赫的研究成果，没有轰动的科学论文。他的“专著”，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观测、收集的数百万个珍贵的气象数据。他用心血、用汗水、用青春，在世界最高的气象站，在藏北无人区，在横断山脉的三江流域，写出了一篇出色的人生论文！

50、陈桂祥的清廉故事

陈桂祥（1951－1995），浙江衢州人。1986年从部队转业任衢县乡镇企业局办公室主任，1988年调到县委组织部办公室工作，1992年4月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直至去世。

**党务工作者的好榜样**

1995年12月29日，浙西大地，寒意袭人。

这天，衢县县委组织部原副部长陈桂祥的骨灰盒从杭州被护送回衢州。中午12点起，许多人自发地从四面八方涌向衢州市区斗潭新区，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待着陈桂祥“回来”。当覆盖着党旗的陈桂祥的骨灰盒被捧下车时，数百名干部群众的眼睛湿润了……

陈桂祥，一位普普通通的党务工作者，你为什么能赢得人们如此真诚的爱戴和尊重？

为了做好党务工作，陈桂祥刻苦学习，注重实践，领导称他是组织工作的“活字典”，基层党务干部说他是“组织工作的行家”。而陈桂祥常说的一句话是：“作为组织部干部，就要上为中央分忧，下为干部群众解难。”

陈桂祥每次下乡蹲点，都带上一辆自行车、一顶草帽和两双解放鞋，10天半月不回家，跑田头、进村头、蹲灶头，与群众心贴心。全县28个乡镇，他都到过；642个行政村，有一半以上村子留下了他的足迹。

陈桂祥是组织部副部长，在县里也是个不小的“官”。可是有谁能相信，陈桂祥生前最贵的衣服是一套花100元钱买来的灰色西装；他那一直换着系的两条领带是5年前花8元钱买来的；他仅有的一双皮鞋，是从部队带回来的高帮皮鞋。直到去世前的一个月，他还穿着这双皮鞋下乡，鞋帮已破得不见原布，鞋底也脱线裂开。陈桂祥临终时所穿的内衣，也是部队带回来的。

陈桂祥去世后，许多干部群众到他家去看望。不少第一次到陈桂祥家的人都震惊了，他们想不到一位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家竟如此贫寒：四面的墙到处泥灰脱落，潮湿的墙面斑斑点点。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一张用了很多年的旧沙发人造革面早已磨破、褶卷，一张旧写字台已磨得发亮。有人不解，陈桂祥却有自己的准则：“生活上过得去就行了，当干部艰苦点不是什么倒霉的事。再说，我大部分时间在基层工作，穿得朴素、随便，反倒方便工作，群众看了顺眼。”

1993年8月，陈桂祥的一位战友为了承包一个工程，托陈桂祥帮忙，并用信封装了1000元钱放到陈桂祥的桌上。“你今天如果不把钱拿回去，就不是我战友！”陈桂祥严肃地对战友说，那位战友赶紧收起钱，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从1994年9月起，陈桂祥就感到腹胀，腰部隐隐作痛。陈桂祥在部队服役时得过肝炎。回到衢县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组织部8年，从未休过年休假和请过一天事假。超负荷的操劳，使他的身体日益虚弱，体重不到50公斤。

1995年12月3日，陈桂祥这位铁打的汉子终于倒下了。他的肝、胃、胰腺、肠等共有5个部位都患有恶性肿瘤，且已晚期。赴杭做手术前，他想起了尚不知情的母亲、妹妹。妹妹出嫁后，他多次把孤身在家的母亲接到城里住。老人惦着乡下的女儿，有一次她对儿子说：“桂祥，我老了，你还是想办法给你妹妹办个城镇户口，找份工作，让妹妹也住到城里。”陈桂祥想了想却说：“妈，妹妹可以常住我家陪你，但办城镇户口不行。权是人民给我的，可不能为自家人谋利呀。”

24天后，陈桂祥在杭州浙医一院溘然去世。去世前7个小时，他还艰难地与前来探望的县长谈工作，却一点不谈个人要求。

陈桂祥走了，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他留下的是平凡而闪光的人生足迹：一枚三等军功章，8本“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勤政廉洁领导干部”的大红证书。他那“忠魂伴党旗，奉献于人民”的崇高精神，在人们心中耸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51、柴万清的清廉故事

柴万清（1953－1996），浙江舟山人。1973年入伍，中共党员，1978年退伍到舟山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工作。1996年4月，他在抢救国家财产中英勇牺牲，生前为舟山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土石公分公司经理。

闪光的基石

1978年，柴万清从戎归来，到舟山建筑工程公司工作。5年的部队生活，他不仅学会了驾驶和修理汽车的技术，而且还传承了务实进取、忘我奉献的光荣传统。他热爱学习，特别是汽车装备情有独钟，每次见到外单位的新设备，柴万清总要凑前琢磨一番。凭着这份执著，使他成了舟建公司一流的“机械专家”，同时取得了高级驾驶员职称。到舟建公司的18年中，柴万清为公司开回了第一辆装载机、第一辆推土机、第一辆全液压挖掘机、第一辆15吨自卸车、第一台20吨汽吊……

1992年4月舟建公司组建大型土石方分公司，柴万清被推上了领导岗位。公司领导要柴万清从集体工房搬出来单独住，但柴万清摆摆手，说：“我还是跟大伙一起住吧！虽然嘈杂些，但可以互帮互学，切磋一些技术问题。”柴万清不但像普通工人一样长期住在集体工房里，而且每周抽两个晚上给青工们上技术辅导课，并把自己从书本上学到、实践中琢磨出来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工友们。

在柴万清的带领下，土石方分公司连续4年被上级部门评为文明单位，虽然只有60多人的小集体，却年创利税300万元。

常州常岭机械厂是土石方分公司的供货大户，柴万清一年里要去10多次，每次都要采购几万、几十万元的配件。厂方十分看重这位老主顾，每次都想设宴招待柴万清，但他从第一次起就谢绝了。他在厂里买了一叠饭菜票，又特意跑到商店买了一双筷、两只碗，每次都到厂食堂排队买饭吃。这个厂的领导纷纷翘起大拇指说：“想不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人。”

一次柴万清去买装载机，厂方开价22万元，要是不还价，可给5%的回扣。柴万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损公肥私的做法，把价格压到20万元。

土石方分公司创建4年来，柴万清经手采购的大型设备、材料、配件等总金额达1400多万元，他从没拿过一分钱回扣，从没住过一次宾馆，从没到饭店吃喝过。有人笑话他：“什么年代了，哪有见钱不要的？真傻！”他回答：“对这种事，还是傻点好。”许多客户说，与柴经理谈生意，这才叫真正的买卖。在金钱、享乐和个人利益面前，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廉洁自律、一尘不染的金子般的素质。

1993年4月，柴万清到广东汕头华能电厂建设工地学习土石方机械施工技术。一个香港老板跟柴万清接触几天后，发现他不但是个精通机械设备的行家，而且还是个兢兢业业的实干家，就私下找他商议：留下来为其工作，月薪6000元，每月可坐飞机回家休息一周或到香港休假一次。6000元是柴万清月薪的10倍，但柴万清还是谢绝了。他诚恳地对那位港商说：“你看重的是事业，我看重的也是事业，大家都想干一番事业，不是吗？！”

在担任分公司经理的4年里，柴万清公休和节假日从未休息过，每天超负荷地工作。他经常加班加点，劳累加上吃饭没有规律，使他患了胃病。他身上经常带着一小袋饼干，胃难受时就啃上几块。由于长年累月在风里雨里拼搏，柴万清还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腰痛病，有时跪在地上修完车子，半天站不起来，工友们看到这种情况，十分心疼。妻子沈慧芬也常常劝他：“万清，你也不算年轻了，别再逞强。”但他一干活，就什么也顾不上了。他这个经理跟普通的工人没什么区别，每天身着油腻腻的工作服，一双沾满油污的手满是裂口，比工人的手更粗糙。

 柴万清殉职后，工友们用剪刀剪开他沾满油污和血迹的衣服，从他口袋里找到的遗物，却是一小包饼干和拾来的几颗旧螺丝帽……

柴万清的生命之火，虽然只燃烧了43个春秋，但柴万清用生命之火点燃的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之火，永远不会熄灭。

52、陆乌铁的清廉故事

陆乌铁（1945—1997），浙江东阳人。1962年入伍，退役后一直在金华水利部门工作。在担任金华市水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正局级），金华市沙畈水库工程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指挥时，不幸殉职。

基石无语垒丰碑

1969年，金华金兰汤水库到东阳招民工。陆乌铁决定报名。

“乌铁，做民工是去干苦力呀！你刚从部队回来，又是党员，在村里当干部不比到水库做苦工强？”有人劝道。

陆乌铁笑了笑说：“谁不知道我们金华十年九旱，易洪易旱。我们是农民，建水库可是为了我们自己呀！2000多年前，四川有个李冰造了个都江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造水库功在千秋，光荣啊！”

这年9月，陆乌铁参加治水大军走了。这一走，就是整整28年。

在这28年里，从一位普普通通的民工，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为一名水利干部。金兰水库、衢州铜山源水库、东阳南江水库、磐安五丈岩水库、永康杨溪水库、金华市区龙渎河治理工程，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这28年里，陆乌铁始终顾大家、舍小家，奋战在水利工程第一线。两个孩子出生，他都未能守在妻子身旁。妻子患乳腺癌，陆乌铁答允妻子在她开刀的那天一定要守在医院，结果却又因工作需要而未能赶到医院。1994年9月，在3天时间里，陆乌铁的岳母、父亲相继去世，正逢全省水利工程建设现场会在沙畈水库召开，陆乌铁只能晚上匆匆赶回老家拜祭亲人，片刻即回。

在这28年里，陆乌铁先后担任过水电工程处处长、党委书记、水利局副局长、沙畈水库常务副总指挥，从他手上进出的资金数以亿计。他做到笔笔清楚，留下了一本本明白帐。他说：“这些钱，有的是人民一分、一角、一元地省下来、集资起来的。我们当干部的，对人民的血汗钱可要有个好的交待！”1996年他两次出差进京，都住8元、25元一夜的四人通铺。服务员还误以为他是进京的民工。

1993年底的一个夜晚。陆乌铁家中——

“爸爸，我工作单位实在太远了，每天来回要骑两个小时车。”在金华市第二制药厂山嘴头分厂的陆阳文下班回到家里，难得看到父亲从水库工地回来，忙逮住机会说：“辛苦点我不怕，就是每月收入太少了，单位福利又不好，分不到房子。以后怎么结婚哪？”

陆乌铁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阳文，现在条件比我们过去好多了。再说我加工资啦，爸爸一不会抽烟，二不会喝酒，你可以在家里吃饭，不要你交钱，自己多存点……”

“老陆，现在怎么能跟我们那时候比！”妻子打断丈夫的话，说：“结婚这么多年，你整天在外，家不沾边。我苦点，不怨你，但不能苦了孩子哪！”妻子眼圈一红。

“那你们说怎么办？”

“能不能调个工作单位？”妻子和儿子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一阵沉默，陆乌铁低下了头，他确实感到对妻子、对儿子有着太多的歉疚。沉默过后，他关掉电视机，恳切地说：“我不能乱用权，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哪！”

大儿子的工作，陆乌铁没有帮一点忙。小儿子陆阳明1990年参加工作，上班地点在乡下，年年想请爸爸关照一下调进城。可陆乌铁仍然不肯出上一点力。

1997年3月27日，“金华市党政机关1996年度实干家”评选揭晓，陆乌铁排名第一，并被金华市委授予“杨东海式实干家”荣誉称号。

基石无语，丰碑永存。陆乌铁的名字，将永远和沙畈水库连在一起。

53、赵加启的清廉故事

赵加启（1941－1996），浙江黄岩人。1972年被招聘为公办教师，任前路小学校长。1978年调任沙埠乡中心小学(现为逸夫小学)任副校长兼教导主任，1984年任校长。多次被评为全国优秀老师和“模范乡村”校长。

共产党员的生命价值

1995年，浙江省教委决定把香港邵逸夫基金会第九批赠款40万港元投入到沙埠镇中心小学，该校校长赵加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一步到位，完成征地和基建任务，使学校的校舍实现标准化。但是，按有关规定，要得到这笔邵氏赠款，当地政府还需投入两倍的配套资金。镇政府为难了：如果把钱投到学校，镇政府的办公楼就建不成了。赵加启他一次次地劝说镇领导，镇领导被他的精神感动了，决定先建校舍，缓建镇办公楼。

从1995年8月到1996年9月，赵加启带着一身的癌肿块，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在学校忙着督促逸夫教学楼的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寒暑假，学校食堂不开伙，他就吃面包、方便面。他常常吃不下饭，他妻子催他去医院看看，他总说没空，后来实在吃不消了，到当地卫生院抓了3帖中药，就再没去看过。

1996年9月，两幢式样新颖、功能齐全的教学楼竣工，200米环形跑道、100米直跑道的田径场也相继建成。这是赵加启一生中最高兴的一件事。

赵加启的办公室在旧教学楼二楼。四周墙壁上的石灰已斑斑驳驳。墙上挂着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下面是入党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章程……旁边有两个条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另外还有一个镜框，上书“党员十带头十不准制度(20条)”。

 赵加启常在支部会上说：“什么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就是要没有私心，学校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每一个共产党员要把群众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

赵加启有一辆71厘米的永久牌自行车，这辆车早已铁锈斑斑，几乎已经看不出车子原来的颜色了，连他的同事们都不知道这辆车已骑了多少年了，反正他这辈子只骑过这一辆车。而他就是骑着这辆车，去一家家农户做流生的工作，动员他们回到学校读书。他就是骑着这辆车，为调整教学网点，把沙埠镇20多所学校并成6所，没日没夜地奔走于乡村政府和村民家中。 他就是骑着这辆车，为了给学校征得15亩地，在9家农户之间来来回回地跑，直到每家农户答应为止。

哪位教师、哪位学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赵加启准会出现在那里。学生谢琳琳说：“我是一个孤儿，8岁时失去了爸爸，10岁时妈妈又嫁人了。我和爷爷奶奶一起过，生活非常苦。是赵校长免了我6年学费，还买书包给我，叫我要好好读书。赵校长下葬时，奶奶拉着我的手跟在队伍的后面很久、很久。”赵加启的邻居说：“他太苦了，穿也不穿，吃也不吃，就知道办学校，我们子女不读书，他一次次上门做工作。”

1996年10月23日，这是赵加启在校的最后一天。这天一大早，他就来到了学校，捡起地上的几片纸屑，告诉学生要爱护学校，保持校园的整洁。这天下午他实在吃不消了，提早回家了。许多教师说这是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此后直到11月12日，赵加启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这天深夜，他最后一次从昏迷中醒来，他睁开眼睛盯着守候在旁边的妻子和儿子，艰难地伸出了4个手指。妻子问他是否叫4个子女来，他摇了摇头。妻子问他是不是想“逸夫”项目的第四幢楼、教师宿舍楼，他点了点头。11月13日凌晨3时45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个平凡的人去世了。他死于癌症，从发现病情到去世仅20天。

赵加启平平常常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55年，但他的追悼会却成了这些年以来当地最隆重的追悼会——

他所在学校的教师、学生来了，学生的家长来了，当地的村民扶老携幼也来了。

赵加启家所在的前路村中心大道上，挤挤挨挨的队伍有1000米长，还有数不清的花圈和挽联。

54、冯永求的清廉故事

冯永求（1938-），浙江余姚人。曾任余姚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余姚市副市级巡视员。在任时，他不但自身清正廉洁，而且敢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曾被评为全省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宁波市第一届和第二届“十佳公仆”、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

一名共产党员永恒的追求

春去秋来，冯永求在纪检监察领导岗位上工作了整整12年。在即将退休之际，这位被余姚人民誉为无私无畏、铁骨铮铮的“冯包公”得了癌症。仅仅过了两个多月，他却强忍着病痛又回到了反腐败斗争的第一线。他究竟追求什么？

余姚市是全省房改试点单位，房改政策一出台，群众举报领导干部以权谋房的信件多起来了。老冯马上组织力量进行专项清理，清房工作很快就遇到了困难。有位市委领导的房子面积超标，却是他的爱人单位买的，而且经过批准的。有人说，以前买的房子就算了，从现在开始从严要求，下不为例。老冯说，执行政策绝不搞下不为例。他首先向市委主要领导汇报，然后又找那位领导谈，希望带头支持清房工作。后来，这位领导补交了1万多元差价款。由于市领导带了头，全市清房工作进展顺利，共清理300多名领导干部的住房，收缴违纪金额360多万元。第二年，他又组织对清房工作进行“回头看”，抽查了167位市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住房，发现20套有疑问。后来这20位干部按规定补缴了11万元差价款。

冯永求的家住在一幢80年代初建造的楼房里。如今，当年居住在此的局级干部早已搬走了，只留下老冯一人“坚守”在这里，单位里也几次分房给他，他都说，我有房，还是分给其他同志吧！有一年，他爱人单位考虑到他家3个儿女都已长大成人，仍挤在一套旧房子里生活不方便，准备分一套房给他家。他听后对爱人说，我们住房是困难一点，但这个房子不能要。这一年他大女儿刚好结婚，只好租住农民的房子。

 爱人说起老冯，感慨很多。她说：“我们家里孩子的事我来管，我的事他不管，他的事我不管，亲友的事他拒管。”

 乡下的外甥从部队退伍回来，求当局长的舅舅找份工作。他说，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他的小女婿所在的企业经济效益不好，想换个单位，女儿求老冯与有关部门打个招呼。老冯说，你们要跳槽，我不干涉，但不要指望父母。

 他对自己、对家属严格要求，但对同志满腔热情。还在筹建监察局的时候，老冯就严把进入关，挑选那些政治素质好、作风正的年轻干部进监察局工作。有一年，局里接收了3名转业军人，他们在市区大多没有住房，只能租住农民的房子。老冯时刻惦记着这件事。经过他的努力，这年年底市监察局争取到了3套住房，全部分给转业军人。

公生明，廉生威，老冯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现在，这位食道被切除12厘米的老人在行将退休的时候，依然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奋战在纪检监察岗位上，像一轮夕阳，默默地散发着光和热。

55、张晓东的清廉故事

张晓东（1971-2001），浙江温州人。199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温州市瓯海法院三溪法庭助理审判员。参加工作8年，张晓东的足迹遍及瓯海的角角落落，奔走了30余万公里；一年中，他办结案件531件，超全国法官人均办案数的7倍多；近2年他共加班加点1000多个小时，折合120多个工作日。在他办结的千余案件中，上诉率不足1％，没有一件被发回重审！

人民法官为人民

在权与法、情与法、钱与法的矛盾抗衡中，张晓东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清醒头脑，一个人民法官的高尚情操。仅据三溪法庭的拒礼拒贿登记簿上的记录，一年来，他先后拒请吃20多次，拒礼拒贿8人次，拒礼金计万余元。

张晓东有个要好的高中同学，是一名律师，由于工作关系，两人常有来往，一起参与的案子有四五十件之多。去年，这个老同学接了一件离婚案，女方当事人声称自己患有重病，没有相应的劳动能力，老同学找到张晓东：“给她关照关照算了，财产分割上给她一点照顾，反正也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晓东问他：“她有医疗证明吗？”老同学没吭声。晓东斩钉截铁地说：“没有证据，绝对不行。”一句话给驳了回去。

2001年开春，晓东的表弟施某在一次争执中，被人用刀砍伤了，表姨一家哭哭啼啼地找上门来，要张晓东给他们撑腰，向对方索要民事赔偿，最好把对方抓起来，判他几年，母亲也来说情：“晓东，你就帮帮你表弟吧，好歹讨个说法。”晓东却固执得很：“公事公办，这事该怎样就怎样，按规定这案子我还要回避呢，这事用不着来找我。”家里人为这事责怪晓东不近情理。晓东说：“我不能滥用职权！

1999年年底，晓东的一个熟人因大儿子为人担保贷款，被信用社告上法庭。当时，他以为自己同晓东关系熟，加之小儿子又是晓东的高中同学，平时关系不错，请张晓东关照一下，应没有什么问题，哪知晓东一一回绝了。他又要小儿子拎着名酒、名烟和红包夜访张晓东，第二天晓东把礼物如数上交给法庭内勤。

瞿溪信用社河头分社主任黄吟龙深有体会：“这些年信用社的还贷纠纷还真不少，我同晓东打了8年交道，8年来，他没有喝过我们一次酒，没有收过我们一分钱，没有吃过我们一顿饭。真是个过得硬的好法官！”

张晓东，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用自己平凡而短暂的一生，把“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崇高形象深植在人们心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浙江省委在杭州举行大会，追授张晓东“全国法院模范”和“人民的好法官”称号。

56、范匡夫的清廉故事

范匡夫（1946-），浙江江山人。196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金华市委常委、浙江省军区政委。范匡夫之所以能做到在权力面前“淡泊名利、倾心为民”，在金钱面前“经得起诱惑、管得住小节”，在歪风邪气面前“有勇气、敢较真、敢碰硬”，是因为他以他的信念、人格、情操，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

永葆共产党人本色

这不，听说分区投资1000万元准备兴建专武干部培训基地，呼啦啦涌来了37家竞标单位。就任分区政委不久的范匡夫一时成了被“关注”的目标。一位施工队老板趁黑敲开了他的家门：“范政委，工程上的事还请你多关照。”说着，将一袋鲜荔枝放在了桌上，底下压着一个厚厚的红包。

“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快把东西拿走！”见范匡夫沉下脸来，来人只得收起东西，悻悻地走了。随即，范匡夫喊来分区后勤部长，再次重申：对这些搞歪门邪道的，要坚决取消投标资格。

妻子王志萍从街上买回两尾鱼，顺手用楼下的水龙头冲了冲，可巧遇上了范匡夫。

“那是公家浇花用的，你怎么能用？”

“芝麻点大的事儿，看把你气的。”王志萍拎起鱼，头也不回地上了楼。

丈夫紧跟在身后，慢言慢语地说：“事情虽小，可别人见了会怎么看？公家的东西，哪怕一分钱也不能占，你不是经常这样教育孩子吗？！”

“行啦，我注意就是了。”妻子诚恳地说。

与所有重情重义的人一样，范匡夫也时常牵挂着自己的亲人。姐姐家孩子多，日子过得很紧巴。每次回老家，从小在大他12岁的姐姐背上长大的范匡夫都想方设法从生活上帮助恩重如山的姐姐。前些年，姐姐患了甲状腺癌，范匡夫把她接到金华最好的医院，请出最好的专家为她手术。住院期间，夫妻俩轮流陪护姐姐，并承担了几千元的住院费。可当姐姐做泥瓦工的小儿子求他帮着揽点活儿时，却被掌握着许多营建项目的舅舅挡了回去。

一些亲朋故旧以为范匡夫已是师职“大干部”，又在“家门口做官”，也像小外甥一样，希望从他身上得到点照应，范匡夫从未以权为他们谋过半点私利。他曾对自家的亲戚约法三章：不许用他的名头找政府办事；不许到军分区和人武部白吃白住；不许打他的主意“跳农门”。至今，范匡夫兄弟姐妹的14个孩子，除一个大学毕业后分到新疆工作，一个当兵在外，其余都在家种地。

那个当兵的侄子，当初被分配在河南某部服役，弟弟、弟媳多次请他出面把侄子调到分区来，范匡夫始终不松口。不得已，身患癌症的父亲赶了100多公里的路找上门求他：“咱范家就这一个当兵的晚辈，在哪里还不是当兵，又不指望你为他转干提升，怎么就这么难哩？”

范匡夫动情地对88岁的老父亲说：“调个兵并不难，但用手中的权为自家办事，那我今后说话就不响，腰杆子也不硬了。”

父亲默默地走了。望着那个卷曲的背影，望着父亲留在雪地上的一行深深浅浅的脚印，范匡夫泪水长流。可直到父亲去世，他仍未遂老人这个愿。

57、朱缀绒的清廉故事

朱缀绒(1950-2001)，女，浙江定海人。197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白泉镇皋泄村党支部书记。朱缀绒心系群众、无私奉献，清正廉洁、鞠躬尽瘁；以自己艰苦奋斗、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与时俱进、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带领村民把一个人均收入只有一千元的穷山村变为了四千多元的小康村，实现了皋泄村民几十年来打通东皋岭隧道的愿望。朱缀绒先后被评为省“优秀共产党员”，省“三八”红旗手，市“十大杰出女性”等。

**一心为民的好支书**

“做人办事作风正，最要紧是在群众不注意的小事上自觉做好，不给党丢脸。”朱缀绒就是这样一个洁身自好的基层党员干部。

朱缀绒始终视群众为亲人,关心群众甚于自己。起早贪黑,走家串户,了解村民喜怒哀乐，为村民排忧解难。大旱天种田缺水，朱带上铺盖和方便面到抽水机房守候两天两夜,帮助村民抽满田水。刮台风闹水灾，朱全身心为村民抢险救灾,自己家却进了齐腰深洪水,大冻天，一位五保户没有棉袄,朱立即翻越东皋岭,跋涉10多里山坡路,到定海城里给老人买冬衣。逢年过节,朱总惦记着五保户、困难户,逐户上门去慰问，村民生病住院、买种子添农具缺钱,朱用自己积攒的几块钱去接济贫困村民。

村会计朱意庆最清楚书记的为人。有一次，朱缀绒从定海回来没有报销车费，朱意庆问她为啥不报销。朱缀绒说，中巴车的车费是1元5角，可是，这天车主刚好没有1元5角的车票了，随手给她一张两元的车票，朱缀绒不肯要。她说：“我们为集体办事，一定要清清白白。这票拿回去报销，叫我怎么说得清爽？”朱缀绒对集体的钱看得紧，从来都是精打细算。有一次，朱意庆和几位村干部外出办事，快到吃晚饭时间了，就在城里的小铺子花了45元就餐。回来后，朱意庆找朱缀绒签字报销，朱缀绒一看，立刻严肃地说：“你们明明可以回家里吃饭，为啥要在外头吃？这张发票不能报销。”45元钱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高级饭店可能连一个菜都点不了。起初，朱意庆对此想不通，可看看书记严于律己的样子，想想自己的做法确实有些不妥。

朱缀绒当村干部多年，别人觉得欠她太多、太多；朱缀绒却觉得欠家人太多、太多。

每次去定海开会，朱缀绒总要到小姑子王素娣家里去借自行车因为她舍不得花钱坐三轮车，用自行车既省力又省时。只要会议是半天的，朱缀绒就到小姑子家吃饭，也是为了省下快餐钱。虽然小姑子一家对她照顾有加，但坚持原则的时候，朱缀绒却一点也不含糊。王素娣的儿子，也就是朱缀绒的侄子和朱缀绒感情很好。有一次，侄子出了车祸，王家通知了所有的亲戚，住在乡下的朱缀绒是第一个赶到医院。但是，当王素娣要求朱缀绒利用她和一些领导熟悉的便利，为儿子换一个好一点的工作时，却被她一口回绝了。朱缀绒说：“我这个‘熟’，只能用在为村里办事，用在家里人身上，不行。”

朱缀绒不但没给家人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成了他们的“拖累”。朱缀绒的小儿媳没有工作，隧道工程队知道后，为感激朱缀绒平时对他们的关照，想招她去记账。朱缀绒找到项目经理陆林强说：“我帮你找个记账的。”几天后，一个刚从技校毕业的姑娘前来报到。工程队又为朱缀绒出主意，叫她让多病的丈夫开个小杂货店，工程队百来号人一定“捧场”。可朱缀绒把这个赚钱的“项目”让给了一个困难户。朱缀绒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使她产生了独特的人格魅力。

为了省下几元车费，朱缀绒和两个村干部坐上村民的三轮车出发办事。一到公路上，惨剧就发生了。当天晚上8时许，朱缀绒在家属和村民的恸哭声中，与世长辞。

带着没有完成的使命，带着几多遗憾，朱缀绒走了。与她深爱的，同样也深爱着她的父老乡亲诀别。

 在皋泄人的脑海里，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共产党人形象将永远留存！

58、黄斌的清廉故事

黄斌（1925-），山东烟台人。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宁波军分区副政委。1992年起，倾囊150万元，先后资助了370个孩子，遍布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等10个省、自治区，成就了105名大学生、27名研究生，是孩子们实现梦想的“助力爷爷”。戎马一生的他，在桑榆暮年，用滚烫的爱心，唱响了一位老兵的嘹亮军歌。先后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先进离休老干部、“中国百名慈善人物”，２０１０年 “中国好人榜”好人等。

**爱心助学夕阳情**

1992年初，一部反映贫困山区生活的内部录像片，打破了黄斌原本平静的离休生活。清贫的家境和淳朴的农民，勾起了他儿时的回忆，而失学孩子那一双双饱含渴望的眼睛，刺痛了他的心。

当晚，他就与老伴商议，该为山里孩子做点什么？

次日一早，这对从战火中走来的老夫妻，就与省青少年基金会和省关工委取得联系，请求帮助联系助学。不久，他们很快就和景宁山区的5名孩子结成对子，寄出了第一笔助学金1000元。

平时，黄斌担任着辖区内多家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和社区关工委工作，全然不顾年老体弱，时时从报纸、电视上留心，或者托慈善机构打听，周边的余姚、宁海等地还有哪些贫困孩子需要帮助。后来，他寻找失学孩子的目光，扩大到金华、丽水、衢州、嘉兴等地。

2003年春节前，黄斌又接到宁波市慈善总会转来贵州52名贫困孩子的助学名单。一下子要资助这么多，他感到了经济上的压力，可他知道，过完年，学校就要开学，如果资助的钱不到位，就意味着52名孩子将丢下书包。

老人左思右想，想到了“支前动员”的老办法。黄斌先去相邻的老战友家鼓动，又到干休所结对共建的马园小学游说。几天下来，谈妥了16名孩子的资助对象。接着，他和老伴商量，把过春节的钱省下来，一揽子包下了36个孩子的学费。那年，全家人吃了一顿水饺算是过年了，孙子的压岁钱也免了。

儿子儿媳得知老父助学的一往情深，也跟着掏钱参与结对。亲家母也随后加入这一善举。

“资助孩子上学只是救急，教育孩子成长才是百年大计。”黄斌1982年从台州军分区副政委的任上离休后，始终关注着青少年的成长。他每与一个贫困孩子结对，就是找到了一棵需要培育的苗子。他通过信件、电话、走访，在与受助学生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地用高尚的情操和人格力量影响和教育孩子们。他说：“孩子们从大山认识了家乡，从我的助学行动中认识了党。”

读小学时小钟面临失学，是黄斌给她交足了学费，他还专门坐长途车来到余姚山区里看她。后来，她在写给黄爷爷的信中这样说：“争取成为像黄爷爷您一样的共产党员，是我不懈追求的目标。”考上大学后，她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很快，黄斌就回了信，告诉她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先从思想上入党。

小钟告诉记者：“我工作后，第一个月工资除交足党费外，要将剩下来的钱拿出来资助失学儿童。因为没有黄爷爷的帮助，也就没有今天的我。

从19岁参军，解放烟台战斗、淮海战役直到最后解放洞头战斗，黄斌至今依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么一种艰苦奋斗的老传统。

对失学孩子慷慨解囊的黄斌，对自己的生活却更加“吝啬”。

多年来，黄斌夫妻俩每天早晚合用一盆水洗脸洗脚，洗完后舍不得浪费，用来冲厕所。他家抽水马桶的进水开关总是紧关的。

邻居们发现，他家总在傍晚时分，趁菜贩收摊之前，才去买便宜的“倒担货”；或者在便利店打烊之前，选那些贱卖的散装冷冻食品。大伙说：“黄政委”的一分钱，总要掰开来花。

黄斌爱吃面食，饺子是他的最爱，可平时难得开荤。在干休所，流传着黄斌的一段佳话：有一次，老伴赶在便利店快关门的时候，折价买回了16只饺子。次日周末，那一盆饺子，黄斌吃6个，老伴10个，就算是两老改善生活的“佳肴”。

黄斌不光助学掏出了20多万元，而且其他捐款在干休所里也是数一数二的，每次救灾捐款的数额都是千元以上。

5月28日，是黄斌夫妇金婚纪念日。那一晚，烟酒不沾的黄斌破例喝了点酒，他动情地对儿女说：“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是你妈。战争年代没有享过一天清福，离休这么多年，我又把两人的钱大多拿出来资助贫困孩子了。但这是我们俩共同的事业。”

59、郑九万的清廉故事

郑九万（1951-），浙江永嘉人。198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永嘉县山坑乡后九降村党支部书记。郑九万心系百姓，无私奉献，做群众贴心人；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做致富引领人；甘于清贫，严以律己，做廉洁清白人。永嘉县委授予郑九万县级优秀共产党员、标兵党支部书记荣誉称号；2005年度浙江农村十大新闻人物；温州市委授予郑九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村支部书记称号。

一位老支书的高山情怀

春寒料峭，括苍山脉深处，海拔800米。2006年2月9日晚8时许，天上下着毛毛细雨，不时夹杂着雪粒子，记者乘车赶往偏远的山坑乡后九村。

车子左摇右晃，缓慢前行。窗外漆黑一片，只听见石块与车轮和底盘的撞击声。开车的山坑乡政府司机小唐说：“现在路况比以前好多了，再过半年，这条路肯定变成水泥路了。”

这条路，是55岁的郑九万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路，也是险些让他付出生命代价的路。修路缺的还是钱。郑九万一方面动员村里自力更生，一方面又主动跑部门，争取上级支持。2002年初，终于等到了永嘉县通乡公路联网公路开建的大好时机，他带头捐资。没有大型机械，没有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硬是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了一条四五米宽的机耕路。为了把路修好，郑九万还专门把在外打工的两个儿子召回来，全家一齐上了工地。见村支书一家这样扑心扑肝，村民们都争先恐后干起来。其间，郑九万的腰椎间盘突出老毛病发作了，但他瞒着家人，贴着膏药又上阵了。

2003年冬，一条长约2.45公里，宽4.5米的通村机耕路，终于修到了山下，这也是小山村有史以来最喜庆的日子，而此时的郑九万却去了医院，腰病让他几乎寸步难行。村委会主任刘建鹏心痛地说，为了这条路，郑支书命都不要了。

以前，村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到几里外的山坑里挑水喝。郑九万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从解决群众喝水难做起。村里集体经济薄弱，郑九万就把家里仅有的500元钱拿出来，再带领村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每人集资50元，村里人出义工，很快全村人就喝上了自来水。

“总为别人着想，他是大家的贴心人。”村民陈菊蕊忘不了，5年前，老伴由于骨质增生急需筹钱做手术。郑九万主动送来了2180元，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卖掉家中唯一的耕牛，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钱。

村民刘继海忘不了，在台风“海棠”来临前，要不是郑九万一趟又一趟上门做工作，最后逼他们撤离，倒塌的墙可能要了他一家六口的性命，灾后第一个给他送来生活费的又是郑九万。

郑九万对别人总是那样的慷慨大方，对自己却是那样的节俭吝啬。每次下山到乡里开会，郑九万都舍不得上饭摊，不管多晚都赶回家吃饭，实在不行就在路上买两个麦饼充饥。

郑九万的大儿子是春节前领的结婚证，除了门口贴着的大红喜字外，连喜酒也没办，这几乎就是5年前小儿子结婚的翻版。他说：“没钱，也没这个必要。”

郑九万的故事，感动了整个浙江——“他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关爱”。

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批示中高度评价郑九万的事迹，指出：“老百姓在干部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就有多重。郑九万同志的先进事迹正是这句话的生动写照。他以共产党员的实际行动赢得了老百姓对他的尊重和关爱，他是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值得党员和群众学习的好典型。”

60、许茂盛的清廉故事

许茂盛（1965-2007），浙江临安人。200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临安市青山湖街道宫里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个偏僻小山村的村干部，为了山村发展和村民致富，20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清正廉洁、无私奉献，贡献了全部精力，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和拥护，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示了一名基层党员干部的先进性，陪广大群众誉为“一心为民的好书记”。

**青山深处的丰碑**

许茂盛是乡亲们脸上两行思念的泪，是群众心中一盏温暖的灯……17本厚厚的工作日记，记录着他为村民奔波的日日夜夜。许茂盛因肝癌去世后，村干部和亲属在他办公室整理遗物时找到的17本写得满满的日记本，记录了这位村支书为村民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的点点滴滴：上午，到街道改水办商量村里安装自来水的事；下午，商量洞霄宫旅游开发的事情……平常的字句背后，有着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落户青山湖街道的临安经济开发区，每年会给宫里村分几个就业名额。几年来，经许茂盛介绍工作的村民不下30人，却从来没有自己的亲戚朋友。儿子许涛高中毕业后参军；弟弟许雪盛现在还在打零工；妻子张文仙在山下8公里外的一家小厂打工（一年要停工6个月），这工作还是她自己找的。也有人劝许茂盛：“你也该帮家里人找个好点的工作。”他总是淡淡一笑：“别的村民更需要。”

村民说，茂盛做事干净。这两年，村里搞了许多建设项目。园区的几家大企业选址就在宫里村。一些企业见他忙前忙后，想把一些小工程给许茂盛个人做，但被他婉言谢绝了；有的包工头想和他拉关系，给他塞钱塞烟，让他入股，他总是简单一句“这弄不来的”就回绝了。许茂盛把自己当村干部的补贴都贴给了有困难的村民和为村里办事上了。他买烟时总要买两包，20元一包的烟递给别人，为的是方便村里办事，5元一包的烟留给自己抽。

住院期间，深受感动的医生们想把省抗癌协会和杭州市红十字会的帮扶名额分一个给许茂盛，他却说：“还是留给比我困难的病人吧。”

弟弟许雪盛现在还没有固定工作，只能偶尔给人家打打零工。看着村里不少人在哥哥的帮助下，都到经济开发区的一些企业工作了，许雪盛找到哥哥，想让茂盛给介绍个工作。许茂盛却黑着脸说：“厂又不是我开的，哪有说进人就进人的。”从此，许雪盛再也不敢和哥哥提找工作的事了。

许茂盛去世后，“我们在整理茂盛留下的工作日记本时，翻出了几张不同时间开具的办公用品发票，分别夹在不同的本子里。”街道驻村干部周荣跃说：“我们算了算，大概有1000多元吧。按照财务制度，像办公用品这样的发票可以当月报销，但许茂盛一直没有报销。”

妻子张文仙对丈夫“藏”的这些发票一无所知。她说：“村里有什么急事需要用车，茂盛都去叫出租车，3年下来就花了7000多元。本来这钱是可以报销的。有时候家里需要花钱，我催他去报销这些出租车费，他总是不耐烦地说‘村里有困难，给村里省点也好的’。”这几年，家里几乎是靠张文仙打零工的收入来维持。

朋友孔祥飞说，以前问过茂盛这是为什么，茂盛总是笑笑：“我想让宫里村好起来，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守着这么一个朴实的愿望，许茂盛尽了最大努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许茂盛的碑文只有5个字：“许茂盛之墓”，平凡如其人。

61、马健的清廉故事

马健（1947-），浙江嘉兴人。198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浙江省嘉兴市教育工委书记、嘉兴市教育委员会主任。马健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积极探索教育改革的路子，使该市的教育工作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他以事业写人生，心系教育，一往情深；以人格得信誉，廉洁从政，一尘不染。1989年被国家教委、人事部、全国教育工作委员会授予“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1995年被评为嘉兴市市级机关优秀党员，1996年被评为嘉兴市勤政廉政好干部。

干净干事的楷模

市教委又要分房了。1998年底，为赶上货币分房的“末班车”，一些人或明或暗在着急。200套新房，足足有500多人申请换房。有的人还专门托人到市教委“做工作”。当听说马健还住着老房子，他们表示：“马主任要房，我们没意见。”

马健是教委的住房“困难户”。三代同堂，一家四口挤在一套建筑面积只有62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一间10平方米的卧室里搭了两张床，住着马健80多岁的老母亲和已工作的女儿。这房子还是他15年前在市电大工作时分的。

不是教委的住房条件特别困难。马健任教委主任后，教工宿舍建了646套，改善教工住房846户，不少青年校长、教师都已住上了80多平方米的新房，省政府还专门为此在嘉兴开过现场会。

不是没有机会分到新房。这些年来，大家已记不清马健到底让了几次房。早在电大当校长时，他就把新房让给了其他同志，后来又让了2次。教委住房改善后，马健终于分到了新房。但当他得知有一对教龄加起来已80年的中学教师夫妇，住房还没有改善，他又把到手的新房让掉了。又有一次，他把房子让给了嘉兴教育学院的一位退休院长。

“这可是最后一次分房了，再也不能让了”，不少人这样劝他。马健的妻子孙月华到教委领了分房申请表，瞒着老马，填好后交了上去。马健内心也很矛盾。不要吧，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这样实在对不起家人；要吧，要求换房的人这么多，他们也确有困难。最后，他为自己拍了板：在这种时候，当领导的就不该与群众争先。

马健又一次退了房。

教委是群众关注的“热点”部门。从上幼儿园到考大学，从学生分配到教师调动，找马健“办事”的人很多。送礼的，请吃的，塞红包的，来了一拨又一拨。“臣门如市，臣心如水”。马健廉洁自律。有一次，一位海宁老乡拎着礼品，找到马健家，求他帮忙把师范毕业的女儿分配到市区工作。马健说：“我知道你家里困难，你买了这么多礼品，不是更困难了吗！分配的事，只要政策允许，我认为是可以照顾的。你先把礼品带回去。”那位老乡说啥也不肯，临走时偷偷留下2000元红包。马健发觉后，多方打听到他的地址，和妻子一起把钱退了回去。

马健拒礼三分，但教委系统每一次捐款，他总是第一个捐，也捐得最多。1998年，在筹建嘉兴学院和建造高级中学时，他先后两次捐出两个月的工资。这些年来，马健为教育事业和贫困学生累计捐款2万多元。

马健清正廉洁，敬业奉献，开拓进取，勤政为民，是干部群众敬佩的共产党员。以他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开拓创新的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默默地奉献着。他以人格的力量、无私无畏的精神，奏响了新时期领导干部干净、干事的正气歌。

62、金启和的清廉故事

金启和（1951-2008），浙江台州人。197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８０年，金启和作为从乡干部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被招录进了检察院。１９９４年，被任命为台州市路桥区检察院反贪局第一任局长。金启和因病去世后，台州网民自发为他设立网上纪念馆，潮水般的留言，表达着网民的哀悼和敬仰之情：“您做到了一个公仆该做的一切”“什么是好官？看到老金的生平和事迹，我才真正懂得共产党员是这样的”……

去留清正满人间

金启和的家，在路桥区城乡接合部下包村。一幢陈旧的楼房跟周围的农民房没有两样，屋内设施简陋，客厅空空荡荡，除几张塑料凳和竹椅外，没什么值钱的家具。这是十年前为给儿子结婚花１０万元建的，其中一半还是借的。直到金启和去世，他仍然欠有３万元建房借款。

儿子、儿媳跟金启和老两口一起生活。儿子有时做点小生意，但亏多赚少。妻子陈珠凤说，一家人主要靠金启和的工资过日子。建房欠下的债还没清掉，陈珠凤又得了子宫癌，治疗花了３万多元，一家人的生活更拮据了。

为了早日还债，陈珠凤在家手工制作节日灯，多时一个月能赚三四百元，可捋灯绳这道活很伤手。于是，金启和下班一回家就脱下制服，开始帮妻子捋灯绳。有时办案到深夜才回家，他就让妻子先睡，自己接着干。１０多年下来，金启和的拇指和食指间结下一层厚厚的老茧，一到冬天就会裂开渗出血来。

陈珠凤说，结婚这么多年，老金只给自己买过一件蓝色的Ｔ恤；而老金自己喜欢穿一件蓝白条夹克衫，穿一个星期，周末洗一洗，下个星期再穿。这件衣服穿了许多年，也早已褪色了。儿媳妇看不过去，想给他买件衣服，也被他回绝。

金启和的儿子金斌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金斌说：“凭着父亲的关系，求人安排个工作也不是难事，但他直到去世也没开这个口。”

但金启和却生活得很坦然：“不该拿的钱不拿，这样活得踏实！”有一次，亲家的广告公司出了问题，想让金启和关照一下，但他的“照顾”要求被金启和断然拒绝。亲家说：“他是一个确定原则就不会动摇的人。从此，我再没找他办过事。”

其实金启和也并不是一个刻板僵化的人，他性格开朗，平时喜欢和大家说笑，但只要涉及办案，不论是谁说情，都会碰一鼻子灰。用陈晓风的话说：“老金这个人硬了一辈子！”

金启和的外甥犯了事，想让他跟经办检察官说情，但他断然拒绝，外甥坐了一年半的牢，从此三年不和他往来。他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他的不近人情，他说：“干反贪这一行，注定一辈子孤单，不能有太多朋友。”

但金启和想不到的是，他的离去却重重地冲击了无数人的心灵。２００８年５月６日的清晨，一长列严装肃容的检察官从一条偏僻的街道中走出，途中数不清的群众自发加入，他们一起护送着一具灵柩，缓缓地前往殡仪馆，他们要陪伴金启和走完最后一程。

63、雷云的清廉故事

雷云（1933-2018），浙江临安人。1950年9月参加工作，195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学习生活》杂志编辑，浙江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干事、副处长、处长，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委讲师团团长，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兼主席等职。雷云生前为自己立下三条人生座右铭：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他以这三条座右铭为准则践行了壮美人生，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党的理论事业。

作为共产党员，不该拿的决不能拿，可以拿的，也不一定都要拿

2009年2月25日，杭州，省政府大院门外。春雨像一把古琴在漫天演奏，淅淅沥沥地落在一间民居屋檐上，一位颧骨高耸、两颊凹陷的瘦削老人，怀揣笔记本走进这间不起眼的打印店，要打印论文。

黄昏时，杭州新天图文制作社打字员小谢给老人打电话，说文章打印好了。一会儿，老人赶来，付罢钱，拿着文章走了。

望着老人瘦削的背影，小谢对记者说，这老人挺有意思，据说当过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但从不上大院打印，而是到小店自掏腰包打文章，70元钱一万字，今天付了打印费100多元。

谈及老人，店主杨德成肃然起敬：像老人这样的大官，写的又是研究马列的文章，谁会自己掏钱打印？交秘书办理就得了。他还告诉记者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有次，省社科联一位处长到店里拿材料，发现老人在这里打印论文，便告诉打字店：这是我们的老主席雷云，以后他来打印，全部挂账，不要让他付钱。第二天，老人来拿论文时，却一定要付钱，说：“他们的好意我领情了，但这钱不能让单位付。”杨德成对这位倔老头打心底佩服、尊敬，说：“雷部长真是个好人啊”

雷云生活俭朴，退休后身上穿的毛衣，还是妻子几年前织的；简陋的住房，许多家具是他几十年前在台州做“业余木匠”时打造的。对于“利”，他始终认为，遇上“利”的事情要尽量往后退，不要往前冲。

2008年8月1日，他为全省高校教师马克思主义原理备课会作辅导报告，会议组织者按规定给他讲课费，他就是不收，说：“我是来宣传党的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收了钱，就变味了。”

几十年来，雷云给党政机关、高校等上了数百场次的理论辅导课，这个规矩一次也没破。原浙江纺织服装学院党委副书记陈光证实，上世纪80年代，请雷云讲了很多次课，他没有收一次讲课费。后来请他讲课，他仍不收。陈光对雷云讲，讲课费是政策允许的，是劳动所得。但他说：“在职时不收，何必退休后再收？不能破惯例。”有的单位偷偷把钱塞进他的包里，他回家发现后就倒贴邮资把钱寄回去，这才心安。

雷云常说：“作为共产党员，不但不该拿的决不能拿，应该可以拿的，也不一定都要拿。”

在宣传部工作那些年，同志们都知道，雷部长有个倔脾气，部里打分拿奖金，每次评他一档奖金，他总要划“下来”，拿第二档奖金。后来到省社科联工作，尽管每年可申报课题经费，但他从未申请过一次。

雷云绝不为家人牟利，连独生女儿报考省广播电台也没管。谈及此事，当时在省广电厅担任领导的省记协主席马雨农非常感慨，他当时接到不少说情电话和条子，但就是没有收到雷云的。要知道，雷云还是与他私交不错的“顶头上司”啊。雷云的一位好友闻此，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说:“这种事对雷云属正常，如果去为女儿工作找关系、打招呼，那就不是雷云了。”

妻子洪映霞在郊区工作，上班、生活很不便。有次，雷云的部下提出要帮她解决调动问题，却被雷云婉言拒绝了。1993年胃癌手术后，雷云仍多次应邀去外地做报告、参加学术会议，因身体虚弱，老伴为照顾他陪同前往，但雷云还真做得出：她的差旅费必须自理，甚至有次他还为此事与接待单位“吵架”。

64、钟伟良的清廉故事

钟伟良（1972-2009），浙江桐庐人。1990年12月入伍，成为连云港边防检查站的一名武警战士。199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退伍。2004年9月，钟伟良通过公务员考试，被录取到桐庐县偏远的新合乡担任一名普通科员。由于工作勤奋，努力进取，他一路从普通科员干到乡党政办主任，并于2008年担任副乡长。2009年8月13日，在赶赴抗洪救灾一线的道路上，不幸以身殉职，年仅37岁。

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基层干部

钟伟良的家庭条件一直比较困难。妻子在横村镇一家针织厂打工，两人的收入都不高，不仅要抚养女儿，还要拿钱给没有退休工资的父母。直到钟伟良去世，一家人还住在横村镇粮管所一套老旧的房屋里。走进这个不足70平方米、只有两室一厅的套间，但见墙壁破损、家具破旧，饭桌坏了一条腿，就用硬纸板垫着。钟伟良的丈母娘泪眼婆娑地说：女婿家里所有的家具都是10年前结婚时操办的，除了一台电脑和空调之外，所有的摆设都没动过。“其实我心里清楚，女儿女婿很想在县城买套房子，已经想了快9年，但总是钱不够，买不起啊！”

钟伟良是清贫的，但他又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富翁”。因为，他帮助许许多多百姓摆脱了疾苦、谋上了幸福。他说：人民群众就是我的亲人，我喜欢和群众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渡过难关。

这就是钟伟良，一位优秀基层党员干部内心的真切独白和高尚情怀。

钟伟良的战友叶水平一直记得：在部队服役时，有一名战友的父亲病故没钱安葬。钟伟良得知此事后，二话不说，马上拿出自己省吃俭用存下的300多元津贴送给战友。“他还发动我们全连战友，同时号召其他两个连队及部队机关的战友们捐款。在他的带动下，大家一共为战友捐款一万多元，让战友的父亲能够入土为安。”叶水平说，其实大家都知道钟伟良的家庭经济状况也十分拮据，但钟伟良就是这么一个热心无私的党员，宁愿自己吃亏，也要帮助别人。

钟伟良刚刚担任西金坞村党支部书记时，一些农户困难到连农业税都交不上，钟伟良常常二话不说为困难农户垫付农业税。为了修筑道路，他以个人名义向信用社借了3万元。因为村里经济困难，只能逐年还给他一些，直到2009年5月还欠钟伟良2000元。当村支书将最后这笔钱送到他家里时，钟伟良却坚决不肯收。他说，这笔钱就算是他的一点心意，捐给村里办公益事业吧。

一说起钟伟良，莪山乡西金坞村村民吴易塔就会发出长长的感叹：“他真是比自己的儿子还要亲啊！”吴易塔老人今年73岁，48岁那年半身瘫痪。老人说，钟伟良对待自己就像对待亲生父母一样好。钟伟良当村党支部书记时，每年过年都要去看他，并从微薄收入中拿出一两百元给他。离开村里去新合乡后，钟伟良依然非常关心他。2007年，钟伟良给了老人700元钱；200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钟伟良为吴易塔包了700元的“红包”，亲自送到老人手上。

在百姓心中，钟伟良就是这样一个难得的好战友、好兄弟、好儿子、好干部。他对集体、对别人，总是这样大方；对自己，却非常节俭。他从来不买贵的衣服，也从不跟别人在生活上攀比。他总是说：“我是个党员，是个基层干部，勤廉节约是我的本分。”原新合小学校长闻琪每次看到钟伟良的遗照，总是忍不住流下热泪：“拍这张工作照时，需要系领带，钟乡长居然没有。拍这张照片时用的领带，还是他向我借的。”

甘于清贫，乐于奉献，不图回报，这就是这位优秀党员基层干部的自觉选择。他怀着对人民群众最朴素的情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地诠释了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

65、胡冬生的清廉故事

胡冬生（1954—），浙江永康人。197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永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办主任，市政府驻京办主任等职。2007年，胡冬生从驻京办主任退居二线，拒绝了多家企业的高薪诚聘，回到从小长大的小山村担任党支部书记达六年之久。六年，他当了一名好支书＋孝子！这种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情就像一片无杂的雪原一样纯洁，用那份真诚去守护彼此一生的天空。

部长回乡当支书

胡冬生出生在永康偏僻的普通农村家庭，刚落地就被养父母抱领。青年时代，他种过地，教过书，后来参军入伍，在部队宣传部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退伍回乡后，到人武部门当过临时工，一度以为人生注定平凡。不料，部队里锻练出来的写作能力让他显山露水，很快就被当时的永康县委破格录用，安排他到县委报道组工作。

几年后，由于文字基础扎实，工作勤奋努力，刚满三十岁就走上了市机关部门领导岗位，先后担任永康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办主任，市政府驻京办主任等职。

2007年，市委组织部找胡冬生谈话，因年龄关系，需从岗位上退下来，准备让其担任某商会负责人。他没有答应，向组织上讲了埋在心里多年的打算：养父母80岁了，自己18岁出来当兵，30多年未回去，要回村务农，陪陪两老。

他选择回老家陪伴父母双亲，结果“被上任”成为村支书。上任后，胡冬生不烧“三把火”，而是郑重承诺“三不”：不拿村里补贴，不为亲属谋私利，不收村民办事礼。

为了改变小山村的落后面貌，胡冬生忙里忙外。跑乡进城，未向村里报销一分差旅费，还自掏腰包帮村里安装路灯、购买音响、添置健身器材；平时村里几十、上百元开支，也是他从口袋掏出来的。

老支委胡永安记得很清楚，当年是老胡多次走路出山，向有关部门申请来13500元救济金。先是给16户困难人家每户500元，又给历任村支书的9位老党员每人200元，剩下3700元买电热毯、金龙油等发给军烈属时，还缺140元，胡冬生又自掏腰包贴上……残疾人胡高楼忘不了，那年春节胡支书上门检讨：因外出，胡高楼的救济金漏给了。“是胡支书用工资买来年货，包了500元红包补发给我的！这样大公无私的人当村支书，村里面貌肯定能改变！”胡高楼激动地说。

老胡的“约法三章”中，有“不拿村里一分报酬”。但有次一位村民背地里说，老胡没有完全做到，这引起老胡的警觉。之后，老胡从会计胡绍德那里，发现家里人曾帮他代领150元误工费，为此，他马上掏钱还掉，并说：“我说过不拿村里一分报酬，必须说到做到。”上任两年，胡冬生为村里节省开支，还掉债务近10万元。

为改变穷村面貌，胡冬生天天劳动在山坡、田间。在他的带领下，马坞村宽敞道路铺进来了，漂亮路灯亮起来了，村口公园建起来了，顺利通过了永康市级村庄整治验收，偿还了多年遗留的债务，还被评为永康市“森林村庄”和“生态村”、金华市和浙江省绿化示范村，原生态观光旅游村现已初见雏形。对此，他深情地说：“我是马坞村的儿子，这一方水土养育了我，回乡做点事是我的本分。”

66、诸葛建武的清廉故事

诸葛建武（1974-2013），浙江瑞安人。199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年，年仅28岁的诸葛建武，成为瑞安市湖岭镇最年轻的村支书。直至2013年3月因突发脑溢血去世，诸葛建武连续4届担任湖岭镇贾岙村党支部书记。他担任村支书11年，给家人留下的珍贵遗产是11本工作日记。2013年6月，瑞安市委追授诸葛建武为“市级优秀共产党员”。

“如果水不清，再好的米，也煮不出好吃的饭”

“书记，来跟你道个别，我下个月要去俄罗斯做生意了。你放心，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我会托人照顾好的。”夜幕中，在瑞安市湖岭镇贾岙村党支部书记诸葛建武的坟前，村民诸葛泽烜一边细心清理周围的杂草，一边不时用手背擦拭眼睛。

2013年3月26日，39岁的诸葛建武突发脑溢血被急送医院，有村民为他请来上海的专家会诊，有村民恳求“一定要救活书记，花多少钱我都出”，还有很多村民每天坐1个半小时的城乡公交车到医院守候，希望能盼到书记康复的好消息。然而，奇迹没有出现。出殡当日，村里700多名乡亲，自发送他最后一程。

一位村支书，为什么能够和村民结下如此深厚的情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清清白白做人，实实在在干事。”也许诸葛建武这句写在2002年日记本扉页上的话，能给我们一个并不完整的答案。

村民诸葛泽烜从小和诸葛建武一起长大，看到他家的房子实在太过破旧，就多次劝他重新盖幢房子，至少装修一下门面，谁知诸葛建武总是说：“万一钱借来了，还不上怎么办？”

但诸葛泽烜始终想不明白的是，当村民需要诸葛建武担保时，他的胆子一下变得那么大，“他总傻傻的，做担保从不考虑后果。”

诸葛林松以前做的是散工。两年前，他想办养殖场，但本钱不够，便找诸葛建武帮忙，想贷款18万元。诸葛建武二话没说，便陪着他去银行。回来后，诸葛林松准备了两条香烟送过去，却被一口回绝。又提了两篮鸡蛋过去，还是吃了闭门羹。

据粗略统计，诸葛建武为村民担保贷款约四百来万元。当村民有些贷款到期还不上，他还想办法筹钱垫资150多万元。

诸葛建武曾经为了一件60元的衣服，讨价还价后依然舍不得买，却能掏出一两千元捐给困难村民；他曾入股村里的卧龙峡风景区开发，在项目刚扭亏为盈时，为了避嫌又主动要求退出股份……

在一幢幢簇新的粉墙黛瓦之中，诸葛建武的家显得尤为破旧，墙面一半刷了水泥，一半红砖裸露；卧室内，席梦思床已经裂开几个口子，棉絮露在外面。这个同学眼中的能人，却在别人创业致富的时候，选择留在村里为村民服务。

“这些年村里家家户户都变好了，只有我们家还是老样子。”诸葛建武妻子黄建双说，“其实他有很多机会到外面挣钱，但他就是放不下村里的事情。”

诸葛建武的好朋友诸葛小江在上海经商，曾允诺给他20%股份邀他一起干，他婉拒了；在温州办企业的诸葛强弟几次发出邀请，他却总说“放不下村里的事”；村里养殖、种植户有财政补贴，诸葛建武的父母够得上标准，村民也没什么意见，但他总说“需要补助的村民还有很多”，一次次让出名额……与诸葛建武共事10年的驻村干部黄少林感叹：“他太不为自己、太不为家里考虑了。”

最懂诸葛建武的，是他母亲薛之英。2002年，他告诉母亲想竞选村支书时，薛之英舀了一瓢水倒进锅里说：“你一定要做一个清水官，如果水不清，再好的米，也煮不出好吃的饭。”这句话，诸葛建武一直记在心头，践行到生命中的最后一刻。

67、尤学军的清廉故事

尤学军（1962-），浙江临海人。199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临海市公安局大洋派出所“老尤警务站”民警。尤学军几十年如一日，骑着那辆岳父于1995年送给他的老式凤凰牌自行车走街串巷，倾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2017年5月荣获“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一名老民警与一辆老凤凰牌自行车

高高的三角杠，老式的车把手，一位身高1米80临近退休的老民警，骑着一辆明显上了年纪的凤凰牌自行车，“嘎吱嘎吱”，不疾不徐地前行……

这一幕，对于临海市大洋街道的居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就是临海市公安局大洋派出所“老尤警务站”民警尤学军。

老远听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村民李大嫂就知道是尤学军来了。她丈夫的弟弟患有精神疾病，有暴力倾向。

“我们一直很想把小叔子从精神病院接回来，但又怕他发病伤人。”李大嫂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尤警官知道我们生活困难，经常过来帮忙，还给小叔子办了低保。

饭桌上谈感情，是民间习俗。尤学军这个20多年来天天骑着老凤凰进村的社区民警，却没有接受过村民一次吃请。

山峰村有两个村民为新居门窗的朝向闹得不可开交。小小一件事，老尤跑了好多趟，终于协调成功。两个村民都把尤学军当成了朋友，可是他们觉得奇怪，不管每次调解到多晚，还是调解成功后双方一起请吃饭，都被尤学军婉拒了。

捡了一辈子废旧物的周桂乡（化名）阿婆，一直惦记着要送尤学军一篮鸡蛋。多年前，因自家的狗咬了别人，周阿婆得给人赔钱，而当时身上仅有180元钱的周桂乡被对方拉住不放，硬是要她赔几百元。

正是窘迫时刻，尤学军骑车路过。他热心地上前协调，为周阿婆谈妥赔偿条件，得知她钱不够时，毫不犹豫地掏了几百元钱为她填补不足。

这位命运多舛的周阿婆，尤学军一直记在心里。知道她一直为两个女儿的户口发愁，尤学军多番走动，为她们补足证明，解决这个拖了几十年的问题。

周阿婆从此记住了尤学军。有一次在捡到的报纸上看到尤学军的报道，从报道中得知他生病的消息，周阿婆就辛辛苦苦攒了一篮子鸡蛋，寻思着要给尤学军送去补营养。

鸡蛋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她又遇见麻烦了。因为青苗补偿款未能好好解决，周阿婆和开发公司杠上了。又气又急的周阿婆只得寻找尤学军帮忙，尤学军找了几个村干部，一起为她讨说法。但是开发公司也有自己的难处，尤学军思前想后，还是从自己口袋里掏出几千元钱给周阿婆当补偿。最后，这家开发公司的负责人也感动了，悄悄地汇回了这些钱。

二十多年，这辆自行车陪伴着尤学军一起慢慢变老。经常有人问他：现在条件好了，也不是没有驾照，为什么不换辆小车开开？老尤总是笑呵呵地说：自行车不仅环保、省钱，最主要是不管多窄的路，骑车都进得去，没有距离感，大家不会把我当外人看。即使在2011年确诊患甲状腺癌，尤学军仍坚持骑车穿行在辖区12个村的田陌小路上，也骑进了当地老百姓的心坎里。

68、杭兰英的清廉故事

杭兰英（1949-），女，浙江上虞人。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浙江省上虞区祝温村党总支书记。杭兰英自1986年开始一直任村支书，把一个集体经济薄弱、班子软弱涣散、村庄管理无序的落后村，建成了享有“创业乐园、生态花园、文化公园、人和家园”美誉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201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倒贴书记”

上世纪80年代，祝马村还是个经济薄弱的小村子，村容村貌“脏乱差”，村民间常出现磕磕碰碰、拌嘴斗气的事。大家都期盼着能有一个人，真正带领村子和村民致富。

当时，曾就读绍兴卫校的杭兰英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她细心负责的态度，赢得了不少村民的信任。在时任村支书的推荐下,1986年，杭兰英高票当选为祝马村党支部书记。

上任的那天晚上，杭兰英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她，琢磨着该从哪里入手。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杭兰英有了自己的初步设想：要把工作做好，得先让老百姓真正信任我们村干部。

回到村里，杭兰英立下规矩，所有项目资金直接打进公账，项目建设时再按程序做账领取，所有村委班子成员及亲戚都不得插手本村的工程建设，避免发生腐败现象。

杭兰英许多亲戚都是做工程建设的，开始有人有些想法，觉得她不近人情，但杭兰英坚守住了关口。“干部清廉了，账目清楚了，村民才会放心。我做书记的，更加不能偏私了！”

这些年，村里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不下50个，总投资超过1780万元，但杭兰英和村干部及亲戚从未承包、承建和插手过，账目清清楚楚。

任村支书这么多年，杭兰英早把村子当成了自己的家。村里的钱要花在老百姓身上，她自家的钱也花在了村子里。

几年前，村里要全面整治河道，急需资金，但村里的账户钱不够。杭兰英心想，河道是必须整治的，村里暂时拿不出钱，作为村支书理应带起头来。她一咬牙，从家里的积蓄中拿出2.5万元，作为整治河道的启动资金。杭兰英远在宁波的弟弟也在姐姐的感召下，捐了5万元。

冲在前面的事情，还远不止这些：村里修路，杭兰英先捐钱；老人生病没人照顾，她又捐钱；村民家中遭变故，她也捐钱；就连镇里给她发奖了，她也把奖金捐出去做河道砌石……

杭兰英当这个村支书，收入实在不高，每年的工资还不到1万元。可杭兰英不但分文没拿，还从家里的积蓄中，陆续拿出50多万元，用于村里的建设和对村民的帮扶。

与此同时，她从未向村里报销过一分钱。平时村里接待吃饭，她都自掏腰包，就连村办公招待的茶叶，也是从家里拿来的；当村办公室由石板屋改成平屋时，她竟把自家准备造楼房的一大车木头，“挪用”到村办公室的建造工地中……

正当一些人为竞选村干部削尖脑袋“捞一把”时，杭兰英依然做的是“赔本”买卖，因此，当地很多人都亲切地称她为“倒贴书记”。

69、陈刚的清廉故事

陈刚（1963-2018），浙江义乌人。198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嘉兴市委常委、嘉兴市纪委书记，嘉兴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历任省监察厅研究室副主任科员，省纪委纪检监察三室副主任、正处级副主任、申诉复查室主任，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党委委员、派驻纪检组组长、监察专员等职。2018年7月1日，陈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嘉兴逝世。

“打铁还需自身硬”

“谢绝探望”，这四个字，一直贴在陈刚所住病房门上的醒目处。

从2014年查出癌症到病重住院，陈刚一直谢绝一切来访，还专门“封锁”他生病住院的消息，以至于连他的哥哥姐姐和亲家都是在他临终前几天才得知情况。

“想来看望书记的人很多，但书记说谈工作的欢迎，其他的探望就不必了。实在拦不住的，也让我嘱咐对方千万不要带礼物。”嘉兴市纪委监委办公室主任崔加晶说。

有一次，一个县里的纪检干部不知从哪里得知陈刚生病的消息，在市里办完事之后便顺道去医院探望。结果人一走，陈刚就噌地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对崔加晶和司机陈滨发火：“怎么回事啊？你俩谁说出去的？”

熟悉陈刚的人都知道，工作不忙时，他都是回家吃饭，饭后有时间就和妻子出去散步，闲时喜欢下下围棋、练练书法。生活过得简单宁静，在外人眼里甚至有些“无趣”。

“没见过他参加什么酒局、饭局。”陈滨说。一些纪检干部还告诉记者，曾在晚饭时间接到陈刚的电话，“没谈什么工作，就是问人在哪里，在干什么。后来，我们才知道，陈书记这是在‘抽查’饭局酒局。”

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朱林森和陈刚是十年前省委党校培训班的同学，谈起对陈刚的印象，朱林森首先提到的就是“对自己要求严格”。

“从他身上能感受到一股正气。当时我和他一个宿舍，他经常叮嘱我：‘我办过很多案子，深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道理，侥幸心理是千万不能有的。’”朱林森说，自己那时刚走上领导岗位两三年，陈刚的这些话对他影响非常大。

2017年底，陈刚女儿结婚，朱林森是证婚人。“婚礼简简单单的，都是双方的亲戚，好友也就四五个。作为这么多年的朋友，我包了一个红包给他，他说‘你搞这些做什么’，最后硬是没有收。”朱林森回忆道。

而陈刚单位的同事，则是直到他去世后才知道他女儿出嫁的消息。“我跟他搭班子这几年关系很好，没想到这个事他竟连我也没说。”向记者谈及此事时，徐春华红了眼眶。

在医院打针时，陈刚脱下外套，护士都惊讶了——陈刚的毛衣上有好几处补丁。护士们都忍不住对他说：“陈书记，您这衣服该换换了！”陈刚则报之一笑：“我都这把年纪了，讲究那些做什么，穿着舒服就行。”

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人陈刚也绝不“开口子”。

曾有亲戚打电话找他帮忙在嘉兴牵个线、介绍点生意。陈刚在电话里就吼了回去：“我在嘉兴当纪委书记，你们就不要在这里赚一分钱！”

陈刚姐夫的一个朋友知道他和陈刚的关系后，想托他找陈刚“帮帮忙”。姐夫在电话里话还没说完，陈刚就一点也不客气地打断了：“你不要来，来了门也不给进！”

陈刚倾注心血的嘉兴市纪委监委留置场所完工后比预算结余几百万元。负责这个项目的市纪委原副书记姜锁楼告诉记者，工程造价能减少几百万元，离不开陈刚的严格要求。“建设工程里最怕‘变更单’，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头。而我们整个工程只有一张‘变更单’，还是因为地基打下去之后是石头，才不得不变更。”

陈刚弥留之际，得知消息的人们都赶来医院见他最后一面，有人想给他爱人送些慰问金以表达心意。

“请你们一定收回去，陈刚一辈子没收过人一分钱，我怎么可以坏了他这个规矩，他知道了绝对不会原谅我的……”这个一贯坚强，在外人面前从不掉泪的女人，再也没能忍住，失声痛哭。

“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纪检监察干部，要比别人有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陈刚用生命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追悼会上，有人按照当地习俗送上“白包”。然而，他们的“白包”当场就被装进一个信封里退回，还多了一封以陈刚女儿、女婿的名义所写的答谢信：“慈父患病期间一直得到组织和您的关心和关爱……您的心意我们已领，请予理解。”

嘉兴南湖，天朗气清，风景依旧。英魂已逝，唯余徐徐清风、浩浩正气。

70、谢高华的清廉故事

谢高华（1931-），浙江衢州人。195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浙江省义乌县委书记，衢州市常务副市长，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现任衢州计生协会名誉会长。谢高华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创始人，1982年他领导的义乌县委作出了正式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决定并制定了“四个允许”的政策，首创了“兴商建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2017年4月16日，荣获“全国商品交易市场终身贡献奖”。

“我是农民的儿子”

对于老书记谢高华，义乌人一直怀有一种特殊的情结。

2017年10月19日，当得知谢老受邀来参加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时，数百名义乌商人自发组织了车队候在高速路口，欢迎老人“回家”。从1995年义乌第一年举办小商品博览会算起，群众这样自发的迎接已持续整整23年。

一位已经离开义乌工作33年、当年任职也仅有2年零8个月的领导干部，为何能让当地群众如此深深感激、久久牵挂？

义乌商人何海美至今仍记得，在当年举行的一次全县大会上，谢高华明确表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对农民经商表示坚决支持。在四周雷鸣般的掌声中，原本已经打算放弃经商的何海美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忆起曾经曲折，谢高华坦言，当时一心干事，“只想着对老百姓有益就好，要打破条条框框，我们干部自己的得失又有什么关系？” 谢高华曾在多个公开场合强调：“做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封建官吏尚能如此，何况我们共产党的干部！”

在以谢高华为代表的一批义乌干部的勇敢坚持和积极作为下，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摊位从1982年底的700余个增加到1984年的1800余个，为义乌市场后来的辉煌打下了重要基础。

义乌人铭记谢高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感念他那种一心为民、冲破层层藩篱、敢于改革创新的勇气和魄力。

1985年，谢高华担任了衢州市常务副市长，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乌溪江引水工程建设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在工程建设中，许多建设者吃在田头、住在工棚，工地上时有万人会战的壮观场面，谢高华更是身先士卒，几乎把家安在工地，“他白天经常和干部群众一起坐在泥地里，边吃饭边商谈工作，晚上和我们开会开到12点是常事。”时任衢州市水利局副局长、乌溪江引水工程副总指挥的佘治平说。

在谢高华当时的秘书张龙生的记忆中，一双解放鞋、一顶斗笠、一把雨伞、一双套鞋，是自己在办公室里必备的“四大件”。“因为不管大太阳还是下雨天，谢市长随时都会去下工地，我们跟都跟不及。”

退休后谢高华无事的时候也经常地在马路上闲逛，依然是几十年前的那身土得不能再土的衣装，比农民还农民的模样。因为“土”，当年还闹出过不少笑话。去医院看病，人家医生看他那副样子以为是个农民，就按照一般“农民”的“待遇”来对待他。之后因为医生的怠慢弄得他实在是火了，问这位医生叫什么名字，医生愣住了，心想这位农民居然口气不小，还问自己是谁？于是便“理直气壮”地告诉他，孰知，这位“农民”竟然又开口厉声说道：“把你们院长叫来！”这下把医生给吓住了，知道自己也许碰上了一个有“来路”的主，转而小心翼翼地问，“您叫什么名字？”“农民”回答：“我叫谢高华！”

在浙江，有人称他是“世界超市”义乌的开拓者，是神州第一市的“接生婆”。而谢高华总是谦逊地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